

## 目 录

### 专 论

- 3 И. 孔达科夫 / 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

### 东—西方与俄罗斯文明属性

- 11 何 芳 / 俄罗斯历史中的东西方之惑  
25 爱·萨·库尔平—古拜杜林 / 俄国历史的东  
方节律  
43 杨明天 / 霍米亚科夫论教派对立和俄国与西  
欧的差异  
58 马克·巴莘 / 地缘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斯、  
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  
71 周 力 /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

### 东—西方与古代俄罗斯外交

- 84 国春雷 / 基辅罗斯外交浅析  
98 姚 海 / 在东西方之间——涅夫斯基外交及  
其评价

### 东—西方与冷战史

- 110 左凤荣 /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  
123 郭 洁 / “纳吉案件”之谜——根据原苏东  
国家解密档案的分析  
  
136 龙 腾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0 年 8 月 23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0 年第 4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И. Кондаков*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 (3)

### *Хэ Фан*

Дилемма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 (11)

### *Э. С. Кульпин-Губайдуллин*

Восточный ритм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25)

### *Ян Минтянь*

Меж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теории А.С. Хомякова и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ой ..... (43)

### *Марк Бассин*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Четыре тезиса о России, Европе и Азии ... (58)

### *Чжоу Ли*

Базовый дух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 (71)

### *Го Чуньлэй*

Анализ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 (84)

### *Яо Хай*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 Оценка дипломатии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 (98)

### *Цзо Фэнжун*

Причины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согласия Сталина на войну в Корее ..... (110)

### *Го Цзе*

Загадка «Дела Имре Надя»

— Анализ на основе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х файлов стран бывшего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 (123)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0 年第 4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I. Kondakov***

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 ..... (3)

### ***He Fang***

“East—West” Dilemma in Russian History ..... (11)

### ***E. S. Kulpin-Gubaidullin***

Eastern Rhythm of Russian History ..... (25)

### ***Yang Mingtian***

A. S. Khomyakov’s Perspectives on Transconfessional Opposi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 (43)

### ***Mark Bassin***

Geographical Uncertainties: Four Theses on Russia, Europe and Asia ..... (58)

### ***Zhou Li***

Basic Spirit of Russian Culture and Its Diplomacy ..... (71)

### ***Guo Chunlei***

Analysis on Diplomacy of Kievan Rus ..... (84)

### ***Yao Hai***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Alexander Nevskiy’s Diplomacy and Its Evaluation (98)

### ***Zuo Fengrong***

On the Reasons Why Stalin Finally Agreed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 (110)

### ***Guo Jie***

Mystery of “Imre Nagy’s Case”

— Analysis According to Decrypt Files of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 (123)

专 论

## 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

И.孔达科夫\*

“东—西方”的对立是俄罗斯文化自我意识中极为重要和根本的观念之一，它有着形而上的和地理因素的、神话宗教的和地缘政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涵义。“东—西方”是人为设定的涵义结构，是人类文化思维的历史产物，其目的是说明世界文化的原始类型（宇宙观）。它作为一对概念范畴，表达了整个世界文化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同时，它还表明人类文化这一象征性的整体具有了二元性（由“东方”和“西方”组成），它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两者的文化认同模式在很多方面相悖，双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对立的双方既相互丰富，又相互背反，体现出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的世界文化的辩证统一。

“**东方—西方**”这一对涵义范畴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文化和文明的两分法特征：**或此或彼，二选其一**。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学者、作家、旅行家和文化侵略者进行的对比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一系列涵义上对立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与专制；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科学知识、理性与直觉和体悟世界；变化、发展与静止、停滞；现代化、创新与传统、礼教；个人主义、个性与集体主义、国家；逻各斯与道；积极的改天换地与同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无阶级社会、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东方和西方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千百年来两者既同处共存，又相互斗争，或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在对立的整个历史进程（不断变化形式及其涵义对立关系）中，竟没有能消除语义和结构上的“并性”，即相互之间的不可变通性和象征意义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二律

---

\* И.孔达科夫，哲学博士，语文学副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背反性。东西方的文化涵义体系无论如何相左，但它们之间至少在识别原则或既定标准和原则方面相互关联，故而两者就有了可比性（包括那些相互对立的概念）。东方和西方无论多么接近，总是有一些价值观或者标准相互排斥，它们的语义场极端对立。即使在观察或研究同一个文化客体时，也会发现其具有东方和西方因素的矛盾性。

东西方的价值和规范体系尽管是人为区分的，但它们的二律背反原则本身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的矛盾性因互补原则而相互接近，并归于统一，以缓解相互的排斥和斗争，而恰恰又是这种排斥和斗争，使得二元的统一得以维持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吸引和排斥的双向过程并非统一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两种趋向，而是某种力量的平衡。于是，“作用与反作用相抵”，这种平衡使得双方不可思议地整合在一起，而且双方越排斥这种整合，整合的力量就越强大。虽然内部存在对立，但却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涵义结构，它建立在语义体系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这种文化涵义结构被称为“对撞”。

任何民族文化的自我认识，都或多或少地与其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形成的世界空间结构和涵义区分观念相关联（首先是一种二元的、对立的，源自世界古老的神话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方—西方”的两分法在所有文化中都很普遍且经久不衰，这与亘古以来二律背反的天象有关（日出和日落）。世界大部分文化都不强调东方和西方在涵义上的对立，两种因素相互关联，作为一个整体的涵义背反体存在，体现出二元性（例如普遍存在的二分法，“上一下”、“左一右”、“曲一直”、“前一后”等等）。而俄罗斯文化（它是其他诸多欧亚文化之一）则与众不同。在这里，东方和西方反而独立存在，但又作为各不相同的涵义空间和两个不同的（又不可分割的）观念相互对立。

最终，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涵义二律背反中形成了阶段性相互替代的定式和趋向：相互的民族文化孤立主义、各种文化之间相对的自治化和相互开放性、一体化；扩张主义、侵略或者效仿；斗争、对抗或者相互补充的对话。东方和西方相互关系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的律动性：相互的吸引被相互排斥或者相互淡漠所替代，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常常带有危机性。由于存在**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所以在选择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上，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局面。

东方和西方在世界文化这个整体中是一个“对撞”的涵义结构，而它们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殖民入侵、解放运动、民族文化复兴的高潮）才表现出来。然而，对于某些**处于东西方边缘**的文化（不仅是领土上的，还有涵义上的）领域来说，它们不由自主地接纳了来自东西方的两极涵义和价值观，对于这种文化来说，东西方因素混杂的现象以及“对撞”的结构不仅仅是典型的，而且构成

了整个体系的“骨架”。在边际文化（既处于各种文化边缘的文化，译者注）中，相互排斥的双方：**开放与封闭；“普世的同情心”与民族主义的弥赛亚意识、宇宙主义与分离主义；革命创新与保守怠惰；发展与停滞等等**极端对立，但这并不是为了将双方完全彻底地分离开来。文化不停地徘徊于两种极端的趋向中，对于这种文化类型来说，这种态势不仅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发展因素。在边际文化中，两分法并不是某种危机状态下的表现，而是在文化心态层次上所具有的，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永恒特性。

边际文化既包括西方话语，又包括东方话语，这些话语构成一个体系，其所有层面都在由相互斗争的双方组成的涵义“对撞”中建构。这种体系一方面充斥着“整体的**分裂**”；另一方面，即使在发生分裂的情势中（特别是在分裂的条件下），“对撞”靠两部分（或者两个方面）的力量支撑，双方构成同一个观念的统一涵义场。在这种情况下，被一分为二的统一体中的两个部分都感受到对方的引力和斥力，它们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力的平衡中。

在俄罗斯文化的自我意识中，东方和西方常常作为各不相同的涵义空间单独存在。但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文化（像所有边际文化一样）中常常把“东—西方”的二律背反体现为“矛盾双方的统一”。表面上看，俄罗斯既与东方对立，又与西方对立，而其实，俄罗斯同时既是东方，又是西方，有时还分出世界上的两种“超级文明”，有时又将其合而为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与东方、西方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涵义“**三位一体**”，同时又与东西方组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以此显示出其一元论的“**全人类性**”。

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处于东西方之间、亚欧之间。这种边际性引起了俄罗斯诸多内在的矛盾：诸如民族性格、心态、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社会文化机制、公众心理和意识形态、专门的文化领域（包括科学和艺术、哲学和宗教）的矛盾性，还有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可预知性。上述所有问题成为千百年来意识形态方面冲突和论争的根源：古往今来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多神教信徒和基督教信徒、聚和性和极权主义、个人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宗教改革派和旧教派、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改革的捍卫者和反对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民主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等等的纷争此起彼伏。上述所有（及其他）“成对”的对立派成为难以分解的涵义二律背反，作为俄罗斯文化及其心态特有的结构式及其历史发展的自我复制模式而存在。

别尔嘉耶夫称俄罗斯为世界的单独部分——“东—西方”（《俄罗斯思想》，1946）。他认为，世界历史的两股洪流——东方和西方——在俄罗斯相汇。普列汉诺夫（《俄罗斯社会思想史》，1914-1918）也指出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历史中存在两

种背向而行的趋势，它们“奔向”不同的方向：既奔向西方（欧化的贵族文化），又奔向东方（俄罗斯农民的传统文化）。然而俄罗斯文化的这两种模式（**分别表现为向心模式和离心模式**）尽管鲜明地对立，但绝对没有相互抵消：源自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历史进程在俄罗斯文化中相合且相互排斥；在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民族发展趋向本身时不时地会一分为二，既趋向西方又趋向东方，或者既抵制东方又抵制西方。

俄罗斯文化以及俄罗斯文明处于东西方之间，具有原本的边际性，这不仅产生了俄罗斯文化在终极目的和意愿上的普济主义（常常融合到弥赛亚及末世论的预感和理想中），而且使得俄罗斯道路和俄罗斯命运充满戏剧性。它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灾难性事件和严峻考验层出不穷，这些常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如果把俄罗斯文明看成一个整体的、具有自身发展逻辑和鲜明的民族特性的历史发展现象，就会发现其深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屡试不爽的是，这种文明在历史形成和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似乎都具有双重性，它同时展现出两张完全不同的面孔：欧洲的和亚洲的、定居的和游牧的、有组织的和无纪律的、人为的和自然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政府的和反政府的、个人的和集体的——类似的“双套马车”的矛盾体是俄罗斯文明的特征，它亘古以来一直存在至今。双重信仰、双重思维、双重政权、分化，这些只是理解俄罗斯文明史的一系列重要概念中的几个，这些概念在古罗斯文化发展阶段就已经显现出来。俄罗斯文化中这类恒常的矛盾，一方面提高了文化自我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阶段性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是俄罗斯文明内在的固有特性。矛盾性成为俄罗斯文明机体性特征和类型性特征，就是所谓的“二元性”（或双重性）。

俄罗斯文化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非它的基质和深层涵义两个对立“内核”的机械相加，而是两者的“相生相伴”，不断变化。在这里，似乎“双中心”、“双内核”、“两极”同时“闪烁”，它既体现了内部深层的统一，同时又没有消除绝对的对立，这就是俄罗斯文化及其“双中心”的典型特征。

二元的涵义结构贯穿了整个俄罗斯历史，这绝非偶然。这种结构使得俄罗斯文化和历史贯穿着**两分法**：双重信仰、双重政权、特辖区、邪教、自僭为王、造反、分裂、平民知识分子、俄罗斯共产主义、欧亚派、俄罗斯侨民、后苏联现实，这里每一个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概念都蕴含着涵义的双重性、双重部分和内在的悲剧性。严格地说，俄罗斯文化中这些经典涵义的“双套马车”，如“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民众和民粹派”或者“革命和反革命”，每每并非是两个观念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整体的涵义建构，在这个建构当中，没有对立面，没有两者相互作用和论辩，没有意在博得头筹的争斗，任何一极都不能单独存在。而且，任何一极的“胜

利”又意味着它的“失败”。因为如果没有较量，它的终极目的和积极性就会失去意义及“附着点”。继而就应该承认，构成俄罗斯文化整体（包括历史）的所有观念都是按照“对撞”的原则同存共处的：诸如多神教与基督教、专制与东正教、政权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民众、宗教与科学、艺术与现实、文学与批评、历史与现代、“俄罗斯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国家安全与持不同政见等等。

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每一对二律背反的背后，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原本的东西方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是俄罗斯及其文化与东西方，即全人类以及世界文化和文明息息相关的标示。它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全人类性”、“包罗万象性”和整个宇宙。俄罗斯每一个历史文化范式，俄罗斯历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的律动，都与这种双重性论题相关：罗斯受洗、蒙古—鞑靼的统治、“莫斯科第三罗马说”的出现、宗教分裂和“彼得改革”、废除农奴制和俄国革命、苏维埃极权的破产和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而言，其中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的一次更新，意味着文化历史重新获得了全人类性的涵义。

但是，无论就民族文明涵义还是宇宙政治涵义而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参与世界“大一统”（В.н.索洛维约夫语）文化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俄罗斯文化及其相对于世界的“外位性”（按照 В.н.索洛维约夫的观点，它是与东西方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同时也囊括了整个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普世的同情心”）。著名的俄罗斯侨民思想家 Г.费多托夫把“俄罗斯性”（即俄罗斯民族心态）描绘成椭圆形，具有双中心，这是不无道理的。在心态上，俄罗斯觉得自己既属于西方，又属于东方。它对东西方因素兼容并蓄，它直接“插入”世界人类共同体，尽管它本身具有民族和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矛盾，是“五彩斑斓的复杂性”的范例（К.列昂季耶夫语），展现出各种因素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融合性”（А.勃洛克）。就这样，俄罗斯成为一个无形的完整世界，而这个整体就是由东方和西方，或者说是东西方因素叠加而成的。俄罗斯就是“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啻为“多种矛盾的大一统”，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整体的俄罗斯文化（而且这是一种多民族文化）就其结构和涵义的复杂程度来说，完全可以与世界文化相提并论。一些俄罗斯思想家反思本民族文化的时候，总乐于发现俄罗斯文化中具有世界历史规模和意义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并丰富了全人类的文化经验，而且为全人类开辟了新的道路（如伊拉里昂、费洛菲伊、Н.果戈理、В.别林斯基、А.赫尔岑、Л.托尔斯泰、Ф.陀思妥耶夫斯基、Н.丹尼列夫斯基、В.索洛维约夫、Д.梅列日科夫斯基、Н.别尔嘉耶夫等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经验的独特性在于，俄罗斯出色地摆脱了东西方传统。这不仅使俄罗斯在各种民族文化中脱颖而出，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独树一帜



(如阿瓦库姆、Ю.克里扎尼奇、Н.卡拉姆津、П.恰达耶夫、Н.车尔尼雪夫斯基、К.列昂季耶夫、Д.皮萨列夫、В.克柳切夫斯基、В.罗扎诺夫、В.列宁、Л.舍斯托夫)。

然而，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问题上，这两种观点大体上没有区别：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意识及俄罗斯人的“叛逆”、俄罗斯的“与众不同”及其“外位性”，这些都纯属它对它在世界上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的自我评判。俄罗斯（以及全俄罗斯）文化的自我认知，说明俄罗斯文明具有自我夸张评价的特性——它分明是在世界历史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自我评价，把自己同人类整体进行对比。

俄罗斯文化存在诸多类似独特的自我评判，这说明，俄罗斯文化一直把自己与**全世界文化**（或者至少与**全欧洲文化**）相提并论，把世界文化看成与自己同样伟大的庞然大物；它正是与该“对话者”发生对话关系（与之等同、相似、联合、契合、效仿、隔绝、拒绝、论争、辩驳、疏离、对立、斗争等等），用本民族的语境、事物、比照、对应物和命运去描绘世界文化。俄罗斯文化与世界文化构成一个统一的涵义建构，一个“超文明的交汇点”，并尽最大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对撞”原则。

这样，**俄罗斯的和全世界的、本土的和宇宙的、民族的和全人类**的各种因素之间，构成了宇宙整体的相互关联又相互冲突的因素。比如，俄罗斯的一些文化名人：Л.托尔斯泰与Ф.陀思妥耶夫斯基、В.索洛维约夫与 К.列奥基耶夫、Д.梅列日科夫斯基与 В.罗扎诺夫、И.布宁与 В.马雅可夫斯基等的创作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俄罗斯思想有过一系列的派别：约瑟夫派与“禁欲派”、尼康改革派与旧礼仪派（又名旧教派）、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俄罗斯宇宙派”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俄罗斯的文艺作品亦是如此：经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俄罗斯先锋派（从 В.赫列布尼科夫到 Д.哈尔姆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具特色的苏维埃先锋派），它们自然地“结成一对冤家”，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非常对立，作为民族思想整体的两派从不同的角度对矛盾的俄罗斯文化做出完全相反的评判。

在千余年间，俄罗斯—俄罗斯这个过度谱写了一部风雷激荡的民族、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史，它在世界历史上堪称一部巨卷，意义尤为重大。其中不可避免地同时记载着“**创新**”和“**灾难**”。俄罗斯欧亚大陆是东方和西方的“交汇点”；但这种交汇（以对撞的方式）同时既起着连接作用，又起着分割作用，既使之接近，又使之疏离；这既是冲突，又是联合，既是一体化进程，又有分化趋向——所有这些都世界文化中体现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别尔嘉耶夫首开先河，在文化历史层面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现象，当然还有“俄罗斯侨民”现象进行探索。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是全球范围内**东西方大综合**的必然结果。这种大综合在 20 世纪就已

破产。所谓“东西方大综合”，是一个特别的文化论题，是东西方边界地带的一个大老难问题（试比较与其类似却相对“和缓”的综合方式，如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还有“远东的奇迹”——日本、南韩和中国）。

俄罗斯文化史以及俄罗斯历史集**连续性**和**断裂性**于一身，充满了矛盾。这说明，有一条文化历史传承的主线贯穿着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价值涵义空间；同时，用“突变方式”解决历史遗留的矛盾问题和边际文化带来的难题，这定会导致文化范式的剧烈“断层”，按照东西方因素“对撞”的原则发生从一方到另一方的突变。

多神教和基督教拜占廷传统和蒙古遗风之间不但相互替代，而且常常推翻和取代先前的文化经验。后彼得时期全面欧化的方针打破了莫斯科公国时期的文化封闭和自足。而俄罗斯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都寄希望于聚合性强、热爱村舍生活的俄罗斯人民，希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跳过欧洲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取代了姗姗来迟的、对文化财富持抵制心理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先致力于实现世界革命，之后目标又转向在“个别国家”实现这个主义。最终，在后苏联时期，平均主义的“俄罗斯社会主义”突然间变成了新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强制“私有化”、毫无限制的金字塔形的金融垄断以及原始而又野蛮的市场。俄罗斯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斯托雷平改革”、农场主式的经济以及新兴的农庄被公社、“没收富农土地政策”、集体农庄、国营农庄取代，而且党和国家在全国的农业部门发号施令，推行计划生产。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每一个新的文化范式都有一些标志性进程，这是在上一个阶段（在“旧的”范式框架内）就开始出现，且被反复考量、断然否定或者试图被终止的变化过程。十月革命终结了自由主义的自由，那本是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集体化使农奴制在俄罗斯农村复辟；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使联盟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征象死灰复燃，而这些大抵是曾被列宁和他那些布尔什维克的战友们彻底埋葬过的。

在俄罗斯社会文化史中，“旧事物”是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而是在更加稳定的形态中“蛰伏”着，与正在形成的“新事物”并存；另一方面，“新事物”永远不能把“旧事物”彻底排挤掉，尽管它渴求做到这一点。在俄罗斯历史中，“新事物”和“旧事物”与其说是相互替代的，不如说是兼存并行、相互叠加的，于是这种同存共处就显得很荒唐，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悲剧性（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多层现象建立在这种社会文化机制上）。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断裂性以及“人头马形象”并非某一时段，而是长时段内的特性，它们贯穿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整个形成过程。俄

罗斯精神在探寻本身原则和范畴而经历“不定型”的社会文化发展的漫长阶段的反应，则是俄罗斯文化心态本身的基本特征。由于俄罗斯精神从一开始就具备“漫无边际”的广阔性，因此可以“容纳”各种异端；俄罗斯文化追求绝对的极端，否定所有“中庸之道”、调和矛盾或者模棱两可的妥协术；它随时准备向某一个方向或者与之相反的方向前进——以自发的、本能的“突如其来”的方式，没有任何“循序渐进”的过程。俄罗斯历史闻名遐迩的不可预言性便是由此而来，因此也就产生了极为明显的重复性——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这一特性则不甚鲜明。

（郭小丽译，译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常喆）

## 东—西方与俄罗斯文明属性

# 俄罗斯历史中的东西方之惑\*

何 芳\*\*

**【内容提要】**俄罗斯千余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段西学史。而其每次西学都大体经历“学习模仿—民族自觉—超越—对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的民族自觉意识不断要求历史哲学对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形成的亲缘关系作出反思，要求在相似之中明确差异，以确立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研究俄罗斯西学的过程，剖析俄罗斯东西方问题的实质，不仅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有助于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作出展望。

**【关键词】**俄罗斯 东西方问题 “他我”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11-(14)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指出，东西方问题是俄罗斯思考的永恒问题，是俄罗斯“民族自觉的基本课题”，也是俄罗斯“历史哲学的基本课题”。<sup>①</sup>尽管国际社会倾向于把地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归为西方文化体系，<sup>②</sup>但俄罗斯国内对这个问题却一直意见不一。一代代俄罗斯思想家反复探问“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而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的关系，则构成了俄罗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三相思维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学者对“东方”概念的阐述是颇具

\* 本文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The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State Education Ministry）成果。

\*\* 何芳，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① Бердяев Н. Азиатская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уша //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1990. С. 59.

② 参见李新柳：《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特色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外在于俄罗斯的东方，而是俄罗斯内在的“东方”，甚而有时用来指代俄罗斯，即一个相对于西欧国家来说的“东方国度”。因此，如果说，中华文化圈所在的东方是一个绝对的东方，那么，俄罗斯思想家一再强调的俄罗斯的“东方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反映出相对后起的俄罗斯文明在学习西欧、努力融入西方的过程中，谋求自我确立、同中求异的强烈诉求。纵观俄罗斯思想史上各家各派对东西方问题的阐述，可以鲜明地感觉到他们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确定本民族身分归属的艰难抉择和困惑。而东西方问题之说，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不少迷惑。须知此东方非彼东方，俄罗斯东西方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俄罗斯和西欧、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三相模式，多数情况下本质上是“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二元对立结构。

史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共经历了罗斯受洗、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和统治、彼得大帝改革、十月革命、苏联成立、以及苏联解体六次大的转型。本文尝试以一个新视角，即俄罗斯历史哲学中独特的东西方问题为切入点，将俄罗斯千余年的历史概括为三段西学史，总结概括已经完成的前两次西学的某些规律性特点，即始于自我否定、自我颠覆式地学习西方、融入西方，终于极致地自我确立、自我实现，以“东方”的姿态与曾经的西方老师相区别，甚至相对立。可以说，这种研究视角为预测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

## 一、第一次西学：从罗斯受洗到“莫斯科—第三罗马”说

《俄罗斯哲学史》的作者津科夫斯基将 10—18 世纪称作俄罗斯哲学的准备期，实际上，在这俄罗斯文明的童幼阶段，“西方—俄罗斯—东方”问题已初步形成。

由于多神教时期的俄罗斯文明几近全然消失在历史长河的迷雾中而无从考据，因此，文化学界一般将公元 988 年看作是俄罗斯文明起源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一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拜占庭的东方教会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从而摆脱“蛮夷”地位，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员，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在世界文化学界公认的四大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和中华文化区中，只有基督教文化区是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其余均属东方文化体系，<sup>①</sup>因此我们可以把罗斯受洗事件看作是俄罗斯对西方文化进行的第一次选择，这对其未来的历史文化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俄罗斯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这次融合实际上同中存异，最终甚至是以

---

① 李新柳：《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第 18 页。

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告终的。

这种对立首先与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分立有关。罗斯受洗之时，基督教早已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形成了一东一西两个教会分立的态势。1054年，东西教会正式分裂，分别更名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基辅罗斯属于拜占庭的东正教势力范围，作为所谓“基督教的东方”，自然站到了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对立面。

其次，在东正教世界内部也不无隔膜。罗斯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而在宗教上则从属于拜占庭，只是拜占庭东正教会下的一个都主教区，担任都主教职务的也都是来自拜占庭的神职人员。这种政教地位不平衡的状况，使得罗斯教会很早就谋求在宗教经典上脱离拜占庭教会的控制。罗斯的东正教经典使用的是古斯拉夫语，而不是希腊语，语言上的差异造成了俄罗斯东正教与拜占庭东正教之间的一定疏离，与以拉丁语为基础的天主教文化区之间的隔绝则更是毋庸置疑。15世纪，拜占庭东正教会受到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威胁，主动提议与天主教会合并，企图借此举纵横捭阖抵御土耳其人的进攻。于是，便有了1439年的佛罗伦萨宗教合并协议。但这引起了罗斯东正教会的极大不满，认为拜占庭此举是对东正教信仰的背叛。伊凡四世曾对罗马教皇的使节表明：“我们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信仰，而不是希腊的信仰”。<sup>①</sup>1453年拜占庭灭亡，俄罗斯教会的独立意识愈发强烈。15世纪末，“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念应运而生，即西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拜占庭都因为背叛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衰落了，真正的基督教只在莫斯科公国得以保留，莫斯科公国的东正教就是基督教的唯一正源，莫斯科继而成为“第三罗马”，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意识一拍即合。而政治理念和宗教理念的高度一致，也对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宗教精神的独立和国家实力的增长为俄罗斯傲视西方世界创造了条件。

最后，鉴于俄罗斯“一肘挨着中国，一肘挨着德国”<sup>②</sup>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西欧思想家的观念中，它从未完全属于欧洲文明，从来都是独特的东方。黑格尔就曾指出，俄罗斯很晚成为历史国家又一直与亚洲保持联系。确实，在欧洲国家中，俄罗斯因为与亚洲保持着历史和地理上的密切联系而显得特别与众不同。1237年，蒙古汗拔都率军进入罗斯。在此后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各罗斯公国向金帐汗国纳贡称臣。这既是一段血腥惨烈的民族斗争史，也是凤凰涅槃般的民族交融史。莫斯科公国正是在与金帐汗国斗智斗勇的过程中逐渐积聚实力，发展壮大起来。这段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斗争、交融史，在国家制度和民族性格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为它打开了一条不断向东、向亚洲腹地开拓疆土的道路。16世纪下半叶，在伊凡四世

<sup>①</sup>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Л., 1991. С. 34.

<sup>②</sup> Чаадаев П.Я.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В 2 т. М., 1991. Т. 1. С. 329.

执政时期，俄罗斯先后吞并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俄罗斯的沙皇们继续推行领土扩张政策。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东部疆界已经延伸至远东和中亚，成为地跨欧亚、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帝国。即使是今日的俄罗斯，地理上的欧亚特征也十分鲜明：亚洲部分的领土占其国土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历史地看，俄罗斯当然不是亚洲，但从地理上，她又不完全是欧洲。这是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国家。文化使她和欧洲紧密相连，而自然又对她产生影响，赋予她一些特色，使她总是要么被亚洲吸引，要么吸引亚洲。”<sup>①</sup>这就一语道破了俄罗斯能够以“东方”——甚至“亚洲”——自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把 10 至 17 世纪看作是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它涵盖了俄罗斯整个古代史。这一阶段以基辅罗斯受洗为起点，以俄罗斯东正教世界和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分立告终。俄罗斯通过第一次选择西方，成为西方基督教文化区中的一员，民族文化精神得到塑造。与此同时，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和“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的提出，俄罗斯民族是神选之民的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俄罗斯东正教会大有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气势。

## 二、第二次西学：从彼得大帝改革到“超级大国”苏联

彼得一世推行的狂飙突进式的欧化改革翻开了俄罗斯近代史的重要篇章，也标志着俄罗斯第二次西学的开始。欧式帝都彼得堡的建立成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的物化象征，被普希金称作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事实上，彼得改革打开的这扇窗是进行双向认知的通道：一方面，俄罗斯通过这扇窗近距离接触到欧洲文明，了解到另一种社会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促使有识之士睁开了内省的双眼，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自觉，推动了后来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特质的深入思考，从物质和思想层面为创造 19 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大繁荣做好了准备。

俄国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的代表恰达耶夫首先明确提出了“西方—俄罗斯—东方”的命题。他在《哲学书简》中写道：“我们这个独特文明的一个最突出的可悲特征是，我们从未与其他民族并肩而行，我们不属于现有人类族谱的任何一个家庭，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sup>②</sup>虽然恰达耶夫是西方派的鼻祖，推崇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哲学、历史和科学，主张俄罗斯摆脱宗教孤立状态，走西欧的路，但他在客观上，首创地将俄罗斯独立于东方和

<sup>①</sup>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оч.: В 9 т. М., 1987. Т. 1. С. 65.

<sup>②</sup> Чаадаев П.Я.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В 2 т. М., 1991. Т. 1. С. 323.

西方，在俄国思想史上首先提出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俄罗斯文化特质的课题，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思想中的东西维度，或称东西坐标。此后，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俄罗斯文化的南北向度，如利哈乔夫提出的“斯堪的斯拉夫”的概念，<sup>①</sup>但终究是比较孤独的声音，没有像贯穿于俄罗斯历史哲学史的“东西说”那样，构成各家各派观点交响中的主旋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冷峻批判完全出于拳拳赤子之心。他对于俄罗斯国家民族的未来有着深切的期盼，希望俄罗斯在人类文明版图上成为堪与历史悠久的东西方文明比肩而立的第三极，藉此证明俄罗斯文化和民族历史使命的特殊意义。恰达耶夫一方面全然否定俄国历史，批评其封闭、孤立，另一方面，又对俄国的天赋使命寄予厚望，认为其独特性蕴含着无限潜能。恰达耶夫历史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性被其后来者发扬光大，在趋同与求异、融入与隔绝两个方向上被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们不断演绎和发展。

19世纪40—50年代，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历史、使命和民族性的探讨，就是对恰达耶夫开创的“西方—俄罗斯—东方”课题的延续和发展。关于俄罗斯的历史出路，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西方派对俄国的农奴制予以坚决否定，主张俄国必须走西欧诸国的发展道路。而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不同于西欧，她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是另一种类型的文明。他们认为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生存基础，因此对彼得改革前的罗斯加以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应该回归传统，恢复被彼得改革强行阻断的俄国宗法制传统。显然，在“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三相结构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争论的核心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一方主张学习西欧发展模式，另一方强调保存民族文化特质。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鸣对于俄罗斯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思想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别尔嘉耶夫就曾指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世纪之争”密切地关系到俄罗斯思考的永恒主题——东西方问题。而别尔嘉耶夫所生活的时代距今又相隔了近百年，可以说，“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执至今没有得到平息。刘文飞研究员在《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一书中对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两派争执的前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的信函之战，余脉则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袅袅不绝，在索尔仁尼琴和沃伊诺维奇的作品中产生回响。可见，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思想早已超出了两派现实存在的历史时间，升华为一种象征，概括成一种思维范式。人们已经习惯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来界定在俄罗斯历史上几乎每个阶段都能听到的学习、追随西欧文明和坚持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两种声音。

---

<sup>①</sup> Лихачёв Д.С. 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 СПб., 2001.С. 35-38.



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历史思想中的“西方—俄罗斯—东方”问题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标志着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然而，俄罗斯思想界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争论并没有平息，俄罗斯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反而变得更加尖锐。

代表西方派激进一翼的革命民主派继续猛烈抨击俄国社会的不公，在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革命性变革的理论中寻求出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并未使农民无偿获得土地，一些充满民主主义革命激情的青年人不再寄希望于和平改革，他们开始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组织秘密政治团体，宣扬民粹派思想，企图发动农民革命并以农村村社为基础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

斯拉夫主义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论中得到延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接受革命民主派面对本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主张在俄罗斯民族自身传统的框架中寻找更合理的发展模式。他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并在日记中写道：“亚洲……我们有必要关心我们的自我教育，关心我们的独特性，关心我们自己的出埃及记。是的，独立不仅不会使我们成为亚洲人，反而更加使我们成为欧洲人，赢得欧洲人的尊重……在未来我们将作为欧洲本身的合题展现在欧洲面前，展示并为它唤来它的善灵与恶灵，这就是我们的功用，因为我们毫无疑问会在欧洲拥有最终的发言权……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独立。转向东方将是我们进行精神改造和再生的手段之一、推动力之一。我们会彻底摆脱在欧洲的奴隶地位……亚洲和整个亚洲的俄罗斯是一条干枯之根，不仅需要让其进入我们的意识，而且要让它彻底复苏，彻底再生……应当想起我们不是欧洲，我们是亚洲……我们摒弃了狭隘的欧洲主义，不再巴结奉承以求赢得特别的、完全的欧洲人头衔，仅仅是这样一个念头就能赋予我们独立性。”<sup>①</sup>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东方”和“亚洲”已经不是恰达耶夫笔下外在于俄罗斯的独立存在，而是“俄罗斯内在的东方”和“俄罗斯内在的亚洲”。这表明“西方—俄罗斯—东方”或“欧洲—俄罗斯—亚洲”三点相连构成的并不是等边三角形，重心明显倾向于俄罗斯与欧洲这条边，俄与欧洲的关系、俄在欧洲的地位才是19世纪俄罗斯历史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论述中，东方和亚洲的具体指代并不明确，作家所说的亚洲可能是指俄罗斯帝国的亚洲领土，东方可能是指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的东方属性，也可能是其他意思；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俄罗斯之所以需要这个“亚洲”、“东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成为欧洲人”，不仅如此，还要“在欧洲拥有最终的发言权”。陀思妥

---

<sup>①</sup>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 27. 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 1881.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Дуба. Л., 1984. С. 194-196.

耶夫斯基曾在长篇小说《群魔》中借沙托夫之口表示：“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sup>①</sup>在他看来，俄罗斯作为欧洲文明大家庭中的后来者，只有正视、尊重、发展本民族文化中独特的东方因子，突出自己的个性，才能在欧洲真正赢得平等的地位、独立的尊严和超拔的姿态。这正是“西方—俄罗斯—东方”三分式思维模式的微妙之处。

19世纪80—90年代，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的“西方派”。而一些具有新斯拉夫派倾向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论家则转向宗教，希望在东正教中找到俄国的出路。他们提出“俄罗斯理念”，强调俄罗斯人民负有特殊的宗教使命。索洛维约夫指出：“一个民族的理念不是它自己在时间中关于自己所想的东西，而是上帝在永恒中关于它所想的东西”。<sup>②</sup>他提出基督教会合一的思想，提倡俄罗斯文化向西方文化靠拢。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文明陷入了空前危机，俄国的爱国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于是宗教哲学家们举起了“光明来自东方”的旗帜，宣扬俄罗斯的救世论，相信唯有俄罗斯能够挽救欧洲文明。

高尔基作为坚定的西方派和民主主义者针对这种情况写下了《两种灵魂》(1914)一文。他在文中对比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指出欧洲崇尚理智、研究和行动的力量，而东方重情感胜于理性，爱思辨胜过研究，爱形而上学的教条胜过科学的假设，因而必然导致神秘主义、迷信、悲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盛行，催生禁欲主义、隐居修行等逃避生活、否定生活的现象。在高尔基看来，俄国人同时具备“两种灵魂：一种来自游牧的蒙古人，他是幻想家、神秘主义者、懒汉……在这个软弱无力的灵魂旁边是斯拉夫人的灵魂，它可以发出美丽明亮的光芒，却持续不久，很快黯淡”。<sup>③</sup>高尔基认为俄国民族心理的几乎所有缺陷都来自东方影响：“这种软弱无力，这种轻易失望、迅速疲惫的才能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亚洲的近邻，曾经遭受蒙古人的统治，莫斯科公国按照亚洲专制形式组织国家，以及一系列类似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可能不将东方心理的基本特征移植给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俄国人民在精神成长方面自然会落后于西方，使心灵失去个性的东方特质自然会在他身上生根。”<sup>④</sup>高尔基试图证明，每当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力衰弱的时候，人类就会转向东方，转向神秘主义，而东方对俄罗斯是致命的，只有西方能够拯救俄罗斯，因此，他呼吁

① 张百春：“东正教与俄罗斯理念”，载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在北大听讲座第八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② 同上，第41页。

③ Горький М. Две души //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pro et contra. СПб., 1997. С. 103.

④ Там же. С.103-104.

俄国人要和“心理中的亚洲积淀作斗争”。<sup>①</sup>

高尔基的观点引起了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争鸣。后者在《亚洲和欧洲灵魂》一文中批评高尔基还停留在东西方对立的旧意识里，对作为“所有伟大宗教和文化摇篮”的“亚洲东方古老文化”的评价有失公允，对民族特性、理性、浪漫主义、宗教等哲学和文化学概念进行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处理。别尔嘉耶夫指出，高尔基所说的俄罗斯心灵中的“亚洲积淀”，恰恰在“高尔基式的极端西方派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将其原因解释为俄国传统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悖论，即“否定俄罗斯和崇拜欧洲是十分俄国的、东方的、亚洲的现象，俄罗斯极端的西方派思想恰恰是亚洲心灵现象”；而斯拉夫派却是“俄国最早的西方主义者，因为他们试图按照欧洲的方式进行独立思考”，而不是单纯模仿西方思想。<sup>②</sup>别尔嘉耶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揭示出欧洲自身的矛盾，西方派的偶像已然倾塌，俄罗斯应当具有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对早期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观点加以扬弃，转向“更为成熟的民族自觉形式”，打破“封闭的生存状态”，克服“斯拉夫派的自我满足和西欧派的奴性心态”。<sup>③</sup>

我们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家、尤其是宗教哲学家眼中，东方已不仅仅指外在于俄罗斯的孕育了“所有伟大宗教和文化”的亚洲古国。索洛维约夫在诗作《东方之光》（1890）中写道：

啊，罗斯！在崇高的预感中  
一个骄傲的念头把你萦绕；  
你意欲成为什么样的东方：  
薛西斯的东方，还是基督的东方？

索洛维约夫笔下的东方显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能是异教徒的东方，也可能是基督教的东方。索洛维约夫所希冀的当然是“基督的东方”，呼吁俄罗斯笃信基督，实现其肩负的宗教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一些十月革命后被迫侨居西欧国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自称是“欧亚主义者”，再次发出了“走向东方”的呼吁。作为一个宗教哲学流派，欧亚主义不仅赞美东正教的东方，还大胆接纳异教徒的东方——坦然面对蒙古鞑靼人的桎梏遗留给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东方因素，号召将东正教信仰与苏联的国家架构相结合，建成东正教思想统领下的欧亚俄罗斯世界。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亚洲文化，更不是这两

① Горький М. Две души //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pro et contra. СПб., 1997. С. 105.

② Бердяев Н. Азиатская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уша //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1990. С. 60.

③ Там же. С.64.

种因素的相加或机械组合”，而是“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相抗衡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sup>①</sup>显然，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恰达耶夫关于“第三方向”的构想，对传统的“西方—俄罗斯—东方”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他们所说的“走向东方”即是走向俄罗斯，走向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建立欧亚俄罗斯。为了突出俄罗斯在欧洲大家庭中的独特性，欧亚主义者极力强调俄罗斯的东方特点和东方因素：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东欧平原是俄罗斯国家的地理发祥地；蒙古鞑靼人在罗斯二百余年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和国家组织形式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方分支——东正教则是俄罗斯人民不朽的精神支柱。

在俄国宗教哲学界不断探索俄罗斯弥赛亚精神实质的同时，“西方派”列宁学习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首先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设想。布尔什维克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俄国的十月革命还带动了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的扶持下，一系列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冷战。苏联更是一度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与美国形成对立的两极，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把 18 至 20 世纪看作是俄罗斯学习西方的第二阶段，它涵盖了俄罗斯的近现代史。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学习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那么第二阶段的学习则主要是在世俗层面展开的，体现在军事、经济、艺术、哲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第一次学习，俄罗斯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第二次学习，俄罗斯国家获得了强壮的体魄。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俄罗斯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第二个周期是在第一个周期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这是一种先向西再向东、先向外再向内的螺旋运动模式。前一个周期结束时，其成果并未归零。后一个周期的发展是一种叠加的运动过程。俄罗斯第一次西学的成果——东正教思想在国家第二次西化过程中对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各领域发挥的重要影响就是极为有力的证明。

### 三、第三次西学：从全盘西化改革到未来的再次崛起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改革可谓是俄罗斯对西方的第三次选择。俄罗斯历史上前两次学习西方都大致经历了学习模仿—民族自觉—超越—对立的过程，可以说，均是始于西方，终于东方，最后形成某种独特的东西对峙局面。每一

---

<sup>①</sup>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изложения // Пути Евразии.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М., 1992. С. 375.

次西学之始都伴随着颠覆性的自我否定，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对多神教神殿的倾覆，到彼得一世在旧都莫斯科的平叛，莫不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甚至血雨腥风。而西学的结果则是引向一种极致的自我确立、自我张扬：“第三罗马说”使俄罗斯在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更是曾经成为两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并为原已多义的东西方概念添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

俄罗斯的第三次西学，也像前两次一样，开始于剧烈的社会震荡——苏联解体，而对于这次选择西方的结果，目前下任何断言都为时尚早：俄罗斯的第一次西学差不多持续了 800 年，第二次西学用了 300 年，第三次西学至今只过去了短短的 20 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初期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并未使俄罗斯迅速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反而使它的经济几乎在激进改革中陷于崩溃，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俄罗斯对西方伙伴的幻想很快破灭，国家对外政策也从“过分指望西方”过渡到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温和保守主义”。

即使是在全盘西化成为国家发展大政的时刻，俄罗斯思想界也并未停止过对东西方问题的思考。其中，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义”和脱胎于经典欧亚主义思想的“新欧亚主义”都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和俄罗斯的未来发展道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索尔仁尼琴在大量的演讲、接受采访和《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1990）、《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5）、《倾塌的俄罗斯》（1998）等政论作品中，就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和使命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新斯拉夫主义”立场。“西方”一词在其中高频率地出现，“在谈到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时，索尔仁尼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西方，或是拿西方做比对。”<sup>①</sup>例如，他高度评价米哈伊尔时期的国民会议制度，就因为“这整个俄罗斯国家体制绝对不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也没有模仿任何人”；<sup>②</sup>而批评彼得一世的重大失误在于“没能意识到，个别的文明和文化成果是无法脱离其成熟的心理环境被（从西方）移植过来的”。<sup>③</sup>索尔仁尼琴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更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假思索地仿效西方，只能招致俄罗斯全面倾塌的恶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道路，俄罗斯不能靠简单复制西方道路获得自身发展。索尔仁尼琴提倡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内政外交政策，突出民本思想，把“保全民族”当作 20 世纪末最迫切的俄罗斯

---

① 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71 页。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 М., 1995. С. 5. 转引自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第 361 页。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 М., 1995. С. 8. 转引自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第 372 页。

问题。早在 1990 年，苏联尚未解体之时，他就主张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俄罗斯联盟”，其他 12 个加盟共和国大可独立出去。<sup>①</sup>这鲜明地反映出索尔仁尼琴“新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实质。

同样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当代俄罗斯社会发掘、出版、研究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热潮的兴起，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说——新欧亚主义也应运而生了。可以说，这是欧亚主义思想时隔七十年之后的再次勃兴。自称是“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列夫·古米廖夫在其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古米廖夫从 50 年代末起，与古典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维茨基保持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通信联系，不仅近距离地接触到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的精髓，更是通过创立民族起源元气说和民族互动理论，深化和丰富了欧亚主义思想。根据古米廖夫的理论，罗斯和草原民族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历史上，罗斯和蒙古鞑靼草原游牧民族之间从战争到结盟的互动关系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罗斯和西方之间，由于“元气”所处的阶段不同，彼此之间没有亲和力，反而长期受到排斥力的作用，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缺乏进行良性互动的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融合。古米廖夫发出警告：“俄罗斯和西欧实现一体化的代价将是彻底遗失本国传统，而后被后者完全同化”<sup>②</sup>。他指出，“只有作为欧亚强国，也只有通过欧亚主义，俄罗斯才能得救”<sup>③</sup>。

古米廖夫的民族起源元气说得到“欧亚党”主席亚历山大·杜金的高度评价，称其为欧亚主义世界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新欧亚主义”的说法也正是杜金提出来的，他主张用现代地缘政治学思想丰富古典欧亚主义理念，使其从一种历史哲学观上升为俄罗斯在新世纪的“国家思想”。

迄今为止，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已经走过了近百年。最初，它只是一个梦想建立东正教思想统领下的欧亚俄罗斯世界的宗教哲学流派。经过几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古米廖夫用民族起源理论和民族互动理论再次论证了这一思想，而杜金又用“新欧亚主义”对其加以包装。这样，它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历史哲学思潮，而是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政党实体的一股思想—政治力量，并越来越现实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国内从来不乏反对者，这说明，俄罗斯的东西方问题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无论如何，俄罗斯近年来在内政外交领域实施的新政表明，它正在经历一个从

---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Л., 1990. С. 7-8. 转引自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第 356-357 页。

② Гумилёв Л.Н. От Руси к России. М., 1994. С. 299.

③ «Если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спасена, то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Интервью с Л.Н. Гумилёвым // Начала. 1992. № 4. С. 16.

全面向西到回归自我的过程。可是，随着梅德韦杰夫“现代化”理念的提出，俄罗斯历史取向的钟摆似乎又摆向西方。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三相关系中，西方的概念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述中相对清晰、集中。虽然自18世纪俄罗斯思想启蒙以来，有人注重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人关注西方的社会思想，但除却议论的侧重点不同，这个“西方”基本上没有超出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欧洲文化的范围。俄罗斯的民族自觉意识不断要求历史哲学对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形成的亲缘关系作出反思，要求在相似之中明确差异，确立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根基论、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等等，莫不是这条探索长路上的阶段性产物。我们可以借助索绪尔指出的人类思维和语言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原则，把学习者——俄罗斯和被学习者——西欧也当作一种二元对立结构来考察，正如“语言这个系统是由互相差异中得到确定的各项组成的”，要获得关于某一种文化的任何知识，“都总须通过辨别彼此和他我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由自身和在自身确定，而必须靠区别于自身者来确定。<sup>①</sup>因此，俄罗斯无论是向西方学习，还是与西方对立，西方始终是俄罗斯自我确立之路上的“他我”和主要参照物。这就是我们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西方—俄罗斯—东方”问题核心所在的原因。事实上，该问题的提出即直接与俄罗斯和西欧之间的关系有关，是俄罗斯民族自觉的产物，是一个关系到模仿与超越、学习与创新的问题。

为了突出俄罗斯相对于西欧的独特性，俄罗斯思想家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俄罗斯文化的东方性，在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不同层面的“东方”内涵，不一而足：首先，俄罗斯国家形成于欧洲东部，相对于西方各国，俄罗斯就是地理上的东方；此外，相对于古罗斯还有一个东方，这就是蒙古鞑靼人游牧的草原。俄罗斯一方面与之作战，另一方面又与其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客观上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俄罗斯继承了金帐汗国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传统，并最终征服草原发展成为地跨欧亚的大帝国；除了俄罗斯地理和历史上的东方，还有一个信仰层面的东方，那就是东正教所代表的基督教的东方。罗斯受洗之时正值基督教东西教会正式分裂的前夕，事实上的分立不可能不给俄罗斯的宗教意识留下印记。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东正教作为国教，标志着俄罗斯自觉地走向了基督教的东方。凡

---

<sup>①</sup>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1页。

此种“东方”——无论是地理上的、历史上的、还是信仰上的——其实都是俄罗斯内在的“东方”。如果说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最早提出“西方—俄罗斯—东方”问题时，这个“东方”还是外在于俄罗斯的东方，那么，在其后辈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述中，外在的东方则常常被俄罗斯内在的东方因素悄然代替，“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三相结构也继而演变成“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二元对立关系了。而东方概念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恰恰证明它不是俄罗斯思想家们研究的目标概念，而只是一种论证的辅助手段：还有什么比“东方”更能雄辩有力地与西方相对呢？

西方相对于俄罗斯的这种“他我”关系，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内政和外交。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就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后冷战时代定义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中的‘新对立时代’”。他指出，除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的旧有裂痕，富国和穷国之间弥久的南北矛盾”，新时代的对立还表现为能源之争和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博弈。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而俄罗斯所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则以“国家资本主义和更专制的发展模式”为特点。<sup>①</sup>如果如本文所述，将俄罗斯千余年的历史归结为三次西学史，而其每次西学都大体经历“学习模仿—民族自觉—超越—对立”的过程，那么，俄罗斯的第三次西学将再一次引向其极致地自我实现的结果。这倒是与卡拉加诺夫为俄罗斯在“新对立时代”确立的战略目标——“我们需要在新世界的建设中占据领先地位，而不只是满足于收复失地，或是寻回因为无能而拱手让出的地盘”<sup>②</sup>——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或许超越历史发展东西方维度、彻底打破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秩序的时刻已然来临。俄罗斯目前正经历的第三次西学或许不再以“对立”告终，而是达到某种平衡，实现“和”的境界。

---

**【Abstract】** During a thousand years' history Russia three times was choosing the West as its teacher. And every time Russia's apprenticeships from the West, beginning with imit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was ending with negotiation and confrontation of Russia with its western teach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constantly demanding from the Russ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to reflect its historical affinity with the West, to define their differences among the many similarities

---

① [俄]谢·亚·卡拉加诺夫：“国际关系进入新对立时代及俄罗斯的对策”，《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② 同上，第 4 页。



they possess, and thus establish the identity of Russian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ussia's apprenticeship from the West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the "East-West" dilemma in the Russian idea will help us to identify some patterns of Russian history and will also allow us to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dilemma "East-West", "another 'me'"

**【Аннотация】** В течение тысячелетн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я три раза выбирала Запад своим учителем.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уче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у Запада, начинавшееся с подражани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развит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и заканчивалось преодолением 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м Росс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воему западному учител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ло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рефлексирова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ложившуюся родственность страны с Западом, определить их различие среди множества сходств, и тем самым утвердить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стории уче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у Запада и анализ сущности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в русской идее помогут нам намети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акже позволят нам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ть будуще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проблема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другой 'я'»

---

(责任编辑 郭小丽)

## 俄国历史的东方节律\*

爱·萨·库尔平—古拜杜林\*\*

**【内容提要】**人类生命中的七代更替与自然界生命的变化相吻合。将俄罗斯的历史从蒙古入侵开始按七代周期划分，结果反映的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的演进过程。这同时表明，与正统基督教传统融合的东方遗产，对俄罗斯而言才更具决定性。俄罗斯大规模基督教化的进程正是发生在14—15世纪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因此，东方对俄罗斯历史节律产生过有利的影响。更关键的是，伊凡三世将“权力—财产”原则引入了俄罗斯的生活实践。从此，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财产变成了权力（占有）功能；所有者没有任何特权和保障，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某些历史阶段，俄民众相信权力—财产是社会的自然状态，而另一些阶段则怀疑其自然性。这两种情形的高潮期都非常准确地“切入”从蒙古入侵算起的七代更替周期率中。后苏联时代的事实表明，正在发生的不是权力—财产系统的原则性突变，而是内部调整，目的是使监管机构现代化并以此使该系统得到加强。这种趋势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方模式则被俄民众无意识地否定。

**【关键词】**七代更替 历史节律 东方影响 权利—财产

**【中图分类号】**K512.3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25-(18)

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中，在地球的生物圈历史和通用历史<sup>①</sup>（或者是社会自然历史）中，只有从界定自然和社会这两个相互影响的子系统出发，才能解答

\*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社会科学与现代性》杂志（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8年第6期。经作者本人和原出版单位同意后授权本刊独家中文发表。

\*\* 爱·萨·库尔平—古拜杜林（Э. С. Кульпин-Губайдуллин），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① 关于通史参见：Назаретян А. П.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кризисы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М., 2001.

时空问题。在自然界，对过程而言，最小的时间单位<sup>①</sup>是一个世纪，所以，社会中的过程通常应在这一时间间隔内得到归纳综合，而这又使得总结这些过程成为可能<sup>②</sup>。把世纪作为衡量自然与社会相连过程的最小单位，对研究文明史而言总体上是可行而有效的。但是，继续深入研究则要求衡量单位更加准确。

在社会自然历史中，论及人民生活的历史时，人民是作为生物与社会的机体，因此，只有代际的更替才能成为被利用的时间单位。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段中，人的生命里发生着遗传上和心理上的变化（不妨回忆一下“父与子”相互关系这一永恒的命题）。可以像人类学家所做的那样，把社会自然历史中代际更替的时间单位与**父亲与其头生子、母亲与其头生女出生时间的间隔**等量齐观。目前，这一时间间隔是20年，而在古代和中世纪则短一点：16—18年。

但是这一时间间隔有别于自然界中的最小时间段——一个世纪，而且并非总是构成倍比关系。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人类生命中的几次代际更替与自然界生命的变化是相吻合的吗？由于这一问题是在具体研究金帐汗国历史时出现的，所以，自然地也出现了对这一问题源自突厥传统的回答：自古以来，每一个突厥人至少应该知道自己**七代**祖先。

自然社会历史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人类大的族群的心理、意识和公共无意识。从社会自然历史的角度来看，七代更替这一期限意味着什么呢？七代与信息传递的极限相符合。有关这一信息，曾祖父会对曾孙说：“我的曾祖父对我讲述过他亲眼目睹的东西”。超过七代的话，就不可能传递关于前辈们的生活、他们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的直接信息。

对于社会自然研究而言，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七代更替这一时段与自然界中时间最短的变化过程相吻合。其次，七代作为时间单位不像天文单位那样是恒常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第三，通过人类七代更替**这一棱镜**考察历史进程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研究注定是会有结果的，至少是因为通过代际更替来考察金帐汗国的历史，已经使我们对那些用传统研究无法解答的问题得到了一系列

---

① 这一时间单位属于自然界中最快速流逝的变化——气候变化。此外，由于地球生物圈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变化，从一种气候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气候状态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短。

② 社会自然历史的理论及其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的运用在库尔平的博士论文 *Социо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понятие и проблемы* (1992) 中得到论证并发表在 1988 年、1993 年、1995 年和 1999 年出版的文献中：Кульпин Э. С. Концепция социо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88. № 6. Кульпин Э. С. Основные понятия социо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ая термол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ып. 1. М., 1993. Кульпин Э. С. *Путь России*. М., 1995. Кульпин Э. С. *Восток.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М., 1999.

的回答<sup>①</sup>。

将俄罗斯的历史从蒙古入侵开始，按七代周期来划分，结果是很有意思的<sup>②</sup>。蒙古入侵后东欧人民生活的**第一个**七代周期是以金帐汗国国内的纷争和内战而结束的（1360年）。此后，每个七代周期结束的标志分别是：**第二个**——蒙古鞑靼在罗斯统治的终结和莫斯科公国的建立（1483年）；**第三个**——罗斯大地上变乱迭起的“混乱时代”（1606年）；**第四个**——彼得大帝改革的完成（1732年）和俄罗斯帝国的建立；**第五个**——农民对农奴制改革不满（1862年）；与“混乱时代”有些类似；**第六个**——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其特征尚未完全确定（2002年）。

有一系列发生在20世纪初的重要过程和事件从上述周期模式中“脱落”，如1905—1907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革命、斯托雷平改革、国内战争等。让我们从这一奇怪现象中暂时抽象出来，并且试着思考一下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只是一些与俄罗斯历史的转折时期碰巧相符的数字堆砌，还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演进的外在反映？<sup>③</sup>

显然，社会自然的机体——居民及其居住的土地每隔七代就会经历两种状态：要么是重大转变（产生分化），要么是社会—生态的相对稳定。而稳定每次都是通过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达到的，并与先前的有原则的区别。这样的序列是否能证明：上述的机体在心理层面上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发展中的**斯拉夫—突厥超人种**<sup>④</sup>？为了检验这一点，需要改变计数的起点，采用与以突厥入侵为始完全无关的起点。例如，从邀请留里克、特鲁沃尔和希涅乌斯到诺夫哥罗德执掌政权（862年）或者奥列格占领基辅（882年）开始计算。

从882年开始的七代周期率给出这样一组年份：882—1005—1128—1251—1374—1497—1620—1746—1876—2016。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是在这一序列里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的。但是，很明显，与以拔都进攻为起始相比，所有的年份，

---

① Кульпин Э.С.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судьбы поколений (статьи первая и вторая) // Восток. 2006. N 6; 2007. N 1

② 代际更替，9—17世纪平均17.5年，18世纪是18年，19世纪为18—19年，20世纪是20年。

③ 自组织系统的特点在于能够从一个无组织的系统转向有组织的系统并且接下去“从不好的系统转向好的系统”。“如果系统的变化是自动发生的，那该系统就是‘自组织系统’”（Бергаланфи Л. фон.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систем -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систем. М., 1969. С.35）

④ 按社会自然历史的一条原理，俄罗斯居民不是俄罗斯人种，不是斯拉夫人种，而是斯拉夫—突厥超人种（见 Кульпин Э. С. Путь России. М., 1995.）

除了 1497 年以外，都极其缺乏事件上的表现力<sup>①</sup>。那么，基辅罗斯是作为统一的、可以期待看到自组织系统明显特征的社会自然机体一下子产生的吗？

皈依基督教之前，在贵族看来，普通民众是外人，是**被征服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们施以暴力。而普通民众则以牙还牙，只要有机会就在肉体上消灭贵族，并把这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伊戈尔大公的故事就是例子（946 年）。即使在瓦良格人“被邀请”来掌管公国 100 年之后，对于大公而言，国家的中心并非是自己臣民居住的中心，而是出口商品的源地。商品包括毛皮、蜂蜜、蜡和奴隶，罗斯被征服的居民则是奴隶的提供者。例如，斯维亚塔斯拉夫大公（10 世纪）就把多瑙河上的佩列亚斯拉维茨城视为自己疆土的中心<sup>②</sup>。只是在正式建国一个世纪之后，贵族才觉得有必要与民众拥有相同的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并通过强迫基辅人受洗使之得以实现。只是从这一刻起，东斯拉夫社会作为**统一的机体**，其形成过程才可以被认为开始。

如果从接受基督教开始计算，会出现一系列年份，它们与以基辅罗斯建立为起始的模式有明显的区别：989—1112—1235—1358—1481—1604—1730—1860—2000。从 13 世纪开始的年份与以蒙古入侵开始计算得出的年份如此符合，而且如此准确地对应历史上的主要转折时期，以至于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对俄罗斯而言什么才是决定性的：是体现在基督教中的欧洲身份遗产，还是与正统基督教传统融合的东方遗产？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基督教的世界观在俄罗斯社会确立过程的历史中已经为我们所了解的东西。我们把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僧侣们的人数增长作为量指数。由于缺少僧侣人数的统计数据，我们就利用间接的指数：**修道院数量的增长和修道院的位置**。

B·克留切夫斯基曾写道：

---

① 第一个七代周期，就像以后各个周期一样，是以一个毫无表现力的年份（1005 年）结束的，落后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正式皈依基督教——很长一段时间。此后每个七代周期的结束年份为：第二个——1128 年，当时正值各公国内讧频繁，弗拉基米尔·莫纳马赫的公国曾试图制止内乱，但未能成功（1113—1125）；第三个——1251 年，尚未完成罗斯的统一（反对占领者的起义还在继续）。罗斯的统一并不是在内在过程、而是在外在过程的进程中，作为蒙古帝国征服的结果实现的；第四个——1374 年：同样更多地与外部过程、而不是内部过程有关（如果把金帐汗国——罗斯是其附庸部分——看成是一个外在因素的话）；第五个——1497 年：与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事件相吻合：伊凡三世法典通过，只是这一例外再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第六个——1620 年：消除俄罗斯内乱后果的阶段，是一个困难的、在某些方面因循守旧的时期；第七个——1746 年：伊丽莎白·彼得洛芙娜执政开始，与彼得时代相比，也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时期。第八个周期结束时，正值农奴制改革发展时期（一切都已决定）和征服中亚时期（1876 年浩罕汗国并入俄罗斯）。

②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91. с.23

“我们可以看到，在罗斯接受基督教后的最初两个世纪里，修道院主要集中在当时罗斯的中央地带：第聂伯河中游和上游、罗瓦提河和沃尔霍夫河两岸，俄罗斯人都集中居住在那里。在已知晓的建于12世纪末之前的70座修道院中，有50座位于此地。几乎所有这些修道院都局促地挤在城市里或者紧靠城墙，而不是坐落于草原或者森林的深处。城内和城边的修道院一般都是由教堂的高级主教，还有大公、贵族和富裕的城里人怀着对上帝的虔诚建造起来的。13世纪，城内和城边修道院的范围继续扩大。东北罗斯封地的裂变促进了这一进程的发展。新封地的首位大公设法用修道院来装点自己的府邸，哪怕造一个也好。但从14世纪开始，正是在北方，修道院普及的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此前，正如笔者曾描述过的那样，无论在俄罗斯的南方还是北方，所有的修道院都是建在城内或者在紧靠城市的周围地区。很少有苦行僧隐居的小修道院出现在远离城市、荒无人烟（通常是密林深处）的地方。在接受基督教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隐居修行十分罕见；在城内和城边的各种修道院中，苦行修士的小修道院如凤毛麟角。在已知的13世纪末之前建造的100所修道院中，这样的隐居修道院还不到10所，而且，大多数还正是在13世纪建起来的。然而，从14世纪开始，进入森林的运动在北方僧侣中发展得很快，力度很强：在这一世纪里建起的隐居修道院，其数量与城内修道院相同（都是42所），到15世纪，则是后者的一倍（分别为57所和27所），16世纪时，是1.5倍（51所和35所）”<sup>①</sup>。

“隐居修道院在修士们的心中，至少在那些最敏感修士的心中，培养了一种特别的心情；对修士使命的独特看法逐渐形成。修道院的创建人某一天来到森林里，为的是在寂静的独处中拯救灵魂，他深信，这在充满‘人的议论’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的‘寂静的寻找者’不断聚集到他身边，‘建起了隐居修道院’。严峻的生活、虔诚而舍身忘我的声誉吸引着人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这些人中，不仅有虔诚的祈祷者和捐助人，还有落户在日渐富裕的修道院周边的农民。他们将修道院视为宗教上和经济上的支柱，砍伐周围的树林，修建村屯，开垦田地，并且，用圣—谢尔基·拉多涅日斯基修士的话来说，‘使冷清之地变了相’。在这里，修道院垦殖遭遇了农民垦殖，并且成了后者不自觉的引路人。于是，在原来隐士茅屋的所在地，出现了人数众多、富裕而热闹的修道院。而在僧侣当中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是修道院创建者的学生，对这种与僧侣生活格格不入的喧闹和富裕感到苦恼，于是带着老师的祝福离开，来到未开垦的地区，并在那里又以相同的方式建造起了一座新的森林修道院。有时创建者本人也这样做，甚至是多次这样

<sup>①</sup>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Соч. В 9 т. Т. 2. М., 1988. СС. 231-233.

做。他离开原先的修道院，在新的树林里重复自己先前的经验。这样，一些单独的、分散的地方现象逐渐演变成了广阔的垦殖运动。这一运动从几个中心出发，延续四百年，渗透到最人迹罕至、唯有狗熊出没的角落，将修道院播撒到俄罗斯中部和北部广阔的密林地带”<sup>①</sup>。

从上面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出，蒙古鞑靼入侵之前，基督教化的进程只是略微触及了俄罗斯民众的生活，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城市居民，仅占罗斯全体居民的 0.5%。神甫和僧侣在 13 世纪之前主要或者仅仅服务于有权势的上层人士和城市居民。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在蒙古鞑靼桎梏时期——14—15 世纪，修道院“走出”城墙，走向“荒僻之地”，“走向大众”。或者换言之：人民走向修道院、走向僧侣。由于这一切发生在由金帐汗国统治者建立并支持的对教会极其优惠的制度条件下（当时，建起的修道院都得到保护名誉、生命和财产的达尔罕证书<sup>②</sup>），所以可以说，东方对俄罗斯历史节律产生过有利的影响。但是，也不要**过高评价**基督教本身对俄罗斯生活的影响。

“对死者的崇拜在皈依基督教前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崇拜被原封不动地一直保留到 16 世纪下半叶前。在夏至圣约翰节之夜，人们像先前一样快乐地在河里举行美人鱼狂欢，伴着神秘的洗涤仪式和青年男女间的滥交。相信死者与生者的结合、相信崇拜死者具有的巨大实际意义，皆因僧侣们而变得根深蒂固并得以维持。在农民们的生活中，巫师、魔法师与教士相互竞争。而为了取胜，僧侣们不得不从巫师那儿借鉴‘各种占卜算卦、施展魔法的手段’。舍此别无他法。僧侣们要了解掌握具有魔法的、能对神产生最大影响的习俗和表述”。甚至“在 17 世纪，不仅还存在着万物皆有灵的观念，对白桦树、家神、水神的崇拜都被鲜活地保留着，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对多神教时代的雷神和太阳神的崇拜，‘向他们献上祭品’，司祭只有研习过术士的全部学问，才能靠自己的职业生活”。与这一作为生活必需的“学问”不同，每天诵读圣经、恪守基督教伦理规范甚至对僧侣来说都不是必须的，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低级僧侣识字不多或者根本就目不识丁，他们是通过口耳相传学习祈祷的”，而高级僧侣则以“极度放纵”而闻名<sup>③</sup>。如果说占卜算命时普通祭司必须全神贯注、严肃认真的话，举行基督教仪式时却并不要求祭司们持这种态度。其结果是：“因笃信虔诚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喧闹：因为祈祷漫长而乏味，又不能

---

①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Указ. соч. С. 234.

② 达尔罕是古代蒙古社会里的一种称号，达尔罕不但被免除对主人的人身隶属关系和赋税、徭役负担，并可享受各种特权。达尔罕证书是授予达尔罕各种特权的证书——译者注。

③ Никольский Н. М. Реформы Никона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аскола // Три века. Россия от смуты до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 В 6 т. Т. 2. XVII век.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Репринтное издание. М., 1991. СС. 7-11.

遗漏，于是，为了尽快唱完、读完由章程规定的全部内容，教堂的几个下级服务人员同时吟唱、诵读祈文和赞美诗。各人唱读各人的。祈祷者们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表达上，在教堂里的举止就像在市场上一样，戴着衬帽和棉皮帽站在教堂里，大声交谈，脏字粗话不绝于耳；祭司们醉醺醺地做祈祷，互相对骂，甚至斗殴流血”<sup>①</sup>。

祈祷者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与西欧不同，教会在俄罗斯并不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调解人——仲裁员。俄罗斯国家形成伊始，其领导者就是一个极具天赋、目标明确的政治家，军事战略家，理性的主人，对于那个残酷的时代而言非常人道的人<sup>②</sup>。显然，全俄罗斯的首位君主伊凡三世，即使不是无神论者，也没有显示过对宗教和教会的任何尊崇，至少是因为他试图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就个人素质而言，伊凡三世最适合俄罗斯教会政治主权掘墓人的角色。这位莫斯科大公意志坚强、充满智慧而又野心勃勃，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待宗教和教会等级……他确信，与福音书上讲的相反，上帝不是存在于真理中，而是存在于力量里。‘全俄罗斯君主’愿意一视同仁地向所有的人伸出手去：‘罗马人’、抢劫基辅东正教教堂的‘异教徒’、崇拜‘大地和天空’的诺夫哥罗德的异端者、甚至是撒旦本人——尽管不是真的魔王，而是有此称号的立陶宛的都主教”<sup>③</sup>。

“虽然教会势力的先锋队——都主教——一直没有对大公的中央集权政策给予有效的支持”<sup>④</sup>，但伊凡三世积极利用教会来征收土地，介入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在主教中寻找临时的盟友。尽管有来自大公的压力，尽管大公对待失宠的教士粗暴无礼，但教会在一件事情上始终坚持己见：不同意征用他们的土地。即使是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根纳季，尽管他对大公心存感念，因为多亏了后者他才得以从修道院的“冰”牢中重获自由并得到提升，但是在1503年的会议上，当开始谈论他的财产时，用编年史家的话来说，他对着大公“咆哮”。

大公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有时他的教主盟友们也被处以严厉的惩罚，为解救他们，他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惩罚往往包括毒打。为了抗议世俗当局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压，都主教两次愤而出走。有一次他甚至迫使伊凡三世以俄罗斯的方式重现“卡诺萨”认输场景<sup>⑤</sup>。第二次没有奏效。

根据大公的行为判断，他的主要论据是：他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实力远远超过有封地的公的军队或者大贵族的军队，而教会缺乏对主权的坚实法律保障。伊凡三

---

① Никольский Н. М. Реформы Никона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аскола. С.10.

② 参见：Алексеев Ю. Г. Государь Всея Рус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9.

③ Борисов Н. С. Рус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XIV-XV вв. М., 1986. С.162.

④ Борисов Н. С. Указ. Соч., С.188.

⑤ 1077年1月德皇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卡诺萨（Canossa）这一地方卑躬屈膝地哀求罗马教皇格雷高利七世赎罪——译者注。



世还曾恐吓过主教们。包括大主教在内，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免遭暴力。大主教几次试图逃离修道院这座监狱，但每一次都被大公“捕获”。

有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伊凡三世能够实现自己的全部设想。尤里·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伊凡三世一生中只经历过一次政治上的失败：这件事发生在1503年的教会会议上，当时教会应该“自愿”放弃自己的财产，将其奉献给国家，然而，这并未成为现实<sup>①</sup>。不过，伊凡三世没能做成的事，两个世纪后在彼得大帝那里获得了成功。

彼得一世在事实上取消了东正教的最高教职——大牧首，留下一个虚构的王位维护者取而代之。主教会议成为国家机构之一。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二十世纪，俄罗斯千年基督教史遭遇悲剧。苏联时期，几千座教堂（在民众的激情中！）被毁，这在有着相似的斯拉夫文化的邻国，例如波兰，是无法想象的，该国的基督教传统依然根植在民众当中。

波兰共产党执政的1981年，在经过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和天主教大主教协商并得到后者的原则同意后，紧急状态法才得以实施。而我们既不能想象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就实施紧急状态会与大牧首进行协商，也不能想象在发布解散合法议会的法令前俄罗斯联邦总统会与大牧首协商。在俄罗斯，不仅国家位于教会之上，而且历史表明，人民对此是默许的。所以，在探索俄罗斯历史节律的斯拉夫或东方源头时，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教会的历史。

15至17世纪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生活中主要过程的起动机，源于14—15世纪开始的俄罗斯东北部的人口增长，刺激因素则是从按人头（按户）计的金帐汗国税转为14世纪实际上实行的土地税——如同在17世纪的中国那样<sup>②</sup>、蒙古—鞑靼时期稳定的国内外政策<sup>③</sup>和存在着给人以无边无际感觉的原始森林。

在蒙古鞑靼统治时期，14—15世纪人口的快速增长（相对于中世纪社会时间流动的节奏而言）和原始森林的快速开垦<sup>④</sup>，导致了独立的莫斯科公国时期在自然、

---

① 参见：Алексеев Ю. Г. Государь Всея Рус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9. СС. 216-220.

② 中国相关情况参见：Кульпин Э. С.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в Китае. М., 1990. СС.160-161.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е Китая. Серия «Основные сведения о Китае». Пекин, 2004. С.10. 在古罗斯，最初的人口（户）普查之后，为了征税而设定固定税值实际上意味着从人头税过渡到按土地征税。自14世纪起，稳定的内外政策使得东北罗斯的绝大多数人口得以安全地生活在农庄里（一个、二个或三个院落），不断拓垦森林处女地。只是从15世纪末开始，由于土地稀缺，农村地区的人口才开始集中（Дегтярев А. А. Рус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в XV-XVII веках.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расселения. Л., 1980. С.8, С.15.）。

③ 参见：Горский А. А. Москва и Орда. М., 2000.

④ 人口的增长、原始森林的存在、没有中世纪的失业者——无田地的贫苦农民和在田里耕作的奴隶、没有为了养活家庭而向地主卖身为奴的农民，这一切都客观地表明当时人民生活的富足安康，当然，不是丧失了专制机会的精英们生活的富足安康。

社会结构、政治、公共关系等各个方面一系列根本性的、负面的变化的产生。这些公共关系最终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生态危机，其高潮出现在 17 世纪初的混乱时期<sup>①</sup>。种薄了的土地丧失了肥力，被大量弃置（1685 年莫斯科公国 95% 的土地荒芜<sup>②</sup>），低地变成沼泽或者湖泊<sup>③</sup>。

“农民耕作的历史开始于耕地逐渐减少这一事实的出现。直至 16 世纪末，这种减少始终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sup>④</sup>。15 世纪末，在罗斯首次出现无地的农民和农村雇佣劳动力（15 世纪中叶时还没有）——无田地的贫苦农民和在田里耕作的奴隶。从 16 世纪初至 17 世纪中叶的一个半世纪里，无地的贫苦农民在所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当中的比例从零升至 25%，在某些地方达到 40%—50%<sup>⑤</sup>。15 世纪，先是作为一个重要现象，然后是一个普遍现象：俄罗斯出现了雇佣劳动，16 世纪出现了行乞—赤贫<sup>⑥</sup>。14—15 世纪时，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而自 16 世纪末起，由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人口开始减少。

在东北罗斯传统上最好的土地上，“17 世纪最初的两个十年，大牧首的世袭领地处在严重的经济混乱状况之中”。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许多空无一人的赤贫的农舍，原本的耕地长满树草，一片荒芜<sup>⑦</sup>。根据现有数据，人口下降导致了土地稀缺现象的完全消失。1630 年代，苏兹达利附近修道院世袭领地中，基本上没有无地贫民的农舍，即使有，也很少，占家庭农舍总数的 3%—6%。由于苏兹达利地区糟糕的状况，在 17 世纪最初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修道院没有做过通常的报告统计，在这段时间里，税册从未更新过<sup>⑧</sup>。

这些负面现象都存在于莫斯科公国，而不是金帐汗国，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莫斯科公国从金帐汗国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在谈到这一遗产时，

---

① 参见：Кульпин Э. С. Путь России. М., 1995. Кульпин Э. С. Исток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 Кульпин Э. С., Клименко В. В., Пантин В. И., Смирнов Л. М. Э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М., 2005.

② 参见：Каримов А. Э. Роль Москвы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культуры природо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 (XVI - начало XX вв.) //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 охраны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Москвы 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М., 1997. С. 69, рис. 1.

③ 在 16-17 世纪，“除了东北罗斯传统上的一些良田外，到处都是死水，沼泽和无处不在的湖泊”（Готье Ю. В. Замосковский край в XVII веке.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ыт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Руси. М., 1937. С.91.）。

④ Готье Ю. В. Замосковский край в XVII веке. С.333, СС.340-342.

⑤ Дегтярев А. А. Рус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в XV-XVII веках.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расселения. Л., 1980. С.170.

⑥ Готье Ю. В. Замосковский край в XVII веке. С.347.

⑦ Кичигин М. М., Иванов А. Л. Владимирское ополье. Истори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очерк. Владимир, 1993. С.68.

⑧ Горская Н. А. Монастырские крестья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 в XVII в. М., 1977. С. 254, 256 - 257, табл. 44.

最经常被提到的有贵族家庭的鞑靼出身，俄罗斯帝国的国徽（上面有三个王冠，象征着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语言、文化和习俗方面的借鉴等。事实上，任何中央集权政府共有的一些特点也时常被列入这一遗产，而这些特点的来源不总是基于原则的，或者，其所谓“金帐汗国的来源”本身令人怀疑。例如，乔·吉拉伍德写道：“可汗及其官员们在罗斯的行政惯例对正在建立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汗按自己的意志选择继任者，伊凡三世也将这一原则纳入莫斯科统治者的政治中；可汗亚萨的职能与贵族杜马的职能相似；一个可汗自己可以铸币，莫斯科君主也一样；当伊凡三世建立个人领地制度的时候，他显然是在模仿突厥的苏尤尔加尔制度；伊凡·卡利达（钱袋）从全国各地收集的贡品、税收和关税都进入可汗统一的国库；卡利达的接班人建立了莫斯科君主的统一金库”<sup>①</sup>，而统一的国库是每一个统治者都希望拥有的。可汗确实按自己的意志挑选接班人，但常常是另一个人成为继任者，他在肉体上消灭钦定的继承者以及其他觊觎权力的成吉思汗的亲属后代们。例如，乌兹别克汗杀害了 20 名亲戚和他们最得力的手下<sup>②</sup>。不光是可汗一个人在金帐汗国铸造硬币<sup>③</sup>，伊凡三世建立个人领地制度，是因为没有其他方式来支付国家职员的薪俸（关于这点下面还要谈及）。“遗产”清单的内容经常得到补充，但缺乏必要的依据，例如：“俄罗斯从金帐汗国那里继承了对‘帝国秩序’的渴望。它学会了驿务、普查，得到了税收，即‘联邦预算’……和‘共同的经济空间’……进入这一空间的人民保持种族和宗教的自治。若将其比喻成景观，那这一景观容纳接受的正是应该容纳接受的东西，至于用什么名称和标志——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且取决于人的因素了”<sup>④</sup>。让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一解释是否与现实一致。

除了由大自然打造的景观外，上述的一切，不是作为事实、也不是作为已调节好的系统由俄罗斯直接接手的，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想法**被俄罗斯继承。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事例表明，即使在权力陡变的情况下，成熟的管理系统仍能得以传承。但这不适用于金帐汗国和莫斯科公国。例如，拿破仑垮台后，重返政权的王室惊奇地发现，法国国库并不空虚，金融体系运转正常。当时的法国，无论胜败，

---

① Джераудо Дж. Тюркские модел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московское чувство цар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 Языки,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история тюрков: традиц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Казань, 1997. С.29.

② Сафаргалиев М. Г. Распад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 На стыке веков, континентов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з опыта образований и распада империй X-XVI вв.). М., 1996. СС. 331-332.

③ Пономарев А. Л. Деньг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и Трапезунд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вантитативная нумизматика и процессы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М., 2002.

④ Аннинский С. А. Известия венгерских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в XIII и XIV вв. о татарах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40. Т. 3. С.124.

都是一个统一的、有生命的和健康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机体。至于十五世纪末的俄罗斯，没有从金帐汗国那里继承一分钱的国库资金，同样也没有获得成熟的国家管理机制。驿务和普查进入俄罗斯的生活是在俄罗斯国家建立以后很久的事情。俄罗斯的税收制度与金帐汗国完全不同，而预算的收入和支出更是无从谈起。只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铁路开始运作时，共同经济空间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新帝国几乎是从零开始，是在恶劣的气候变化和一系列不良现象发生前夕起步的。金帐汗国是在非常有利的自然条件——中世纪早期适宜的气候中开始自己的存在的<sup>①</sup>。而 1480 年金帐汗国正式解体前，东北罗斯正处在社会生态危机的前夜<sup>②</sup>。15 世纪时，良好的时段——千年最佳气候期结束了。在此之后是所谓的小冰河时代。热和冷之间是一个过渡阶段，总是具有极端的天气波动和自然灾害频发的特点。莫斯科公国在自然、经济、信息和文化等方面所拥有的建立帝国的潜力，远远低于从攻城掠地开始到内讧结束这一历史阶段的金帐汗国。术赤<sup>③</sup>部族面对的自然条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妨碍过草原居民的人口增长<sup>④</sup>。而在罗斯，莫斯科公国形成时，已经存在着因农业人口过剩而引发的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消极趋势：缺少土地和森林，树林里动物和蜂蜜稀少，河里鲜见游鱼。而毛皮和蜂蜜、蜡一样，传统上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

莫斯科的大公们缺乏必要的管理技能，没有曾在大蒙古帝国兴起时发挥过作用的中国和其他地方的顾问。没有任何从战败国民众那里没收来的资产。没有从这些民众中强行征集来的熟练工匠，可以用来建设帝国的中心，发展工业，服务于国家机器。没有游牧民族这一社会阶层：通过先前的发展，他们适应了居无定所的生活，愿意成为信息和物质财富传输的一个连接环节。没有自然形成的状况良好的道路。还有许多东西没有：没有能力“支配”外国商人——外国商人支付的海关费，曾使可汗的国库充满叮当作响的“金币”；国内贸易带给国库的收益微不足道（贸易不发达，路途遥远，道路状况差）；没有发达的生产和交换，能够集中起资金这一对于国家发展必需的一般等价物；缺乏监管制造商的能力。此外，不能不看到，对很重要的、但在无情地萎缩的那部分人口的监管困难重重：那是到处流浪的森林居民，顺带从事伐林耕作<sup>⑤</sup>。

---

① Клименко В. В. История климата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 Кульпин Э. С., Клименко В. В., Пантин В. К., Смирнов Л. М. Э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М., 2005.

② Кульпин Э. С. Путь России. М., 1995.

③ 术赤（? —— 约 1227），蒙古军事统帅，成吉思汗的长子。1224 年起术赤乌卢斯部族的可汗——译者注。

④ Кульпин Э. С.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судьбы поколений (статьи первая и вторая) // Восток. 2006. №6; 2007. №1.

⑤ Кульпин Э. С.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Проблемы генезис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2007.

摆脱可汗的枷锁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附庸状态下，没有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维持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和拥有大量军队。B·克留切夫斯基写道：“通过成功统一罗斯，莫斯科大公获得了一个资本：那就是广袤的土地，或空寂无人或有农民居住。只有这一资本他可以投入流通，用来保障自己属下的生活”<sup>①</sup>。使用这一“资本”并不需要极高的生产力，也不需要成熟的税制，但必须要有大量的国家土地储备，有空置的土地——它们不被世袭地主占用，不是私有的，受使用这些土地的人掌控。15世纪最后25年政治历史的特点是重心转移：由在莫斯科庇护下的俄罗斯土地合并过程向为国家公职人员分封土地的过程逐步转移。

森林里自由农民们（所谓“黑户”）的土地，被伊凡三世宣布为国有财产。不过，对于安排日益壮大的军队而言，这些土地是不够的。封建领主和世袭领地主们的土地作为“储备”。领主们因继承权而拥有土地，世袭领地主有世俗的和宗教的分。伊凡三世在统治期间对宗教和世俗领主的土地实行缓慢的国有化。在将边远的公国统一到莫斯科周围时，他把地方领主们安排到中部地区，为他们提供田庄，首先是他自己领地里的田庄。而在领主们原先的地方则“安顿”莫斯科大贵族和“大贵族的孩子”。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资源并将其作为国家预算来利用的做法逐步变成了莫斯科公国的主要功能之一。君主对土地的个人所有权（这在当时是财产所有权的主要形式）成为君主专制的经济基础。

解决问题的第一阶段是法律阶段。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及其继承者之后，过了400多年，到1497年时，法典诞生了。法典规定，所有的土地为大公的财产，也就是国家财产<sup>②</sup>。换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法律上的国有化**现象。这还不是在事实上，而只是在法律上剥夺全体人民、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这一任何时候都是最主要的财产形式的所有权。从那时起，大公的所有臣民在法律上都不是土地的拥有者，而只是临时的“持有人”，即使是世袭领地也一样，尽管这样的土地自古以来就属于领主的祖先。就像当时所说的，**所有的土地都应该为国家“服务”**。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对金帐汗国主要遗产的继承。按照蒙古的传统，可汗是所有土地的拥有者。俄罗斯原本没有这样的传统。12至13世纪，大公们把农民从第聂伯河流域迁移到东北罗斯“自己的”土地上<sup>③</sup>。那是一些北方密林中为数不

①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Соч. В 9 т. Т. 2. М., 1988. С.202.

② 不光是土地表层，还包括地下资源，尽管法典对地下资源未置一词，但是，在西欧国家，地下资源不属于领主，而属于整个社会，这在罗斯几乎众人皆知。

③ 关于在波洛维茨部落的压力下斯拉夫移民的三个方向见 Кульпин Э. С. Исток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 Кульпин Э. С., Клименко В. В., Пантин В. И., Смирнов Л. М. Э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М., 2005.

多的没有森林的地段。此后，不断增长的人口开垦着森林处女地。在东北罗斯，森林处女地不是大公的财产，直到十六世纪，还不“上犁”（意为课税）。到15世纪末，东北罗斯超过90%的耕地是经过开垦的森林处女地。换句话说，按照俄罗斯传统，不可能要求**所有土地**为国家“服务”。所以，伊凡三世为了实行个人封地制，首先利用自己的土地，随后再征用诺夫哥罗德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就并非偶然了。首次征用的复杂性在于：虽然这是被征服的土地，但却不是外人的土地——作为胜利者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而无视当地居民的传统。伊凡三世不得不实施一个复杂的、多路径的计谋，以使没收、分配和重新分配商业共和国的土地财产合法化<sup>①</sup>。

伊凡三世以此将被瓦西里耶夫称为**权力—财产**原则的东西<sup>②</sup>引入了俄罗斯生活的理论和实践。权利—财产原则指的是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财产变成权力（占有）的功能<sup>③</sup>。按照这位学者的观点，古代和资产阶级的西方与传统的东方的差别意义在于：“在东方，国家和发达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形成要早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因此，这一被权力有意识阉割的财产形态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市场—私人财产关系在这里成为某种次要的和受制于权力和行政机构关系的东西。这种制约性还表现在统治者及其建立的管理机构严格控制所有的属下，不管他们的财产状况如何。此外，与政权机构没有关系的臣民（私人财产拥有者）越富裕，他所处的生存状态就越不理想。他既没有特权和保障，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管理机构把国有资产当作自己的私产，不加掩饰地为所欲为。用由我提出的‘**权力—财产**’概念来表述的现象的本质就在于此。”<sup>④</sup>。

上面所提到的、被瓦西里耶夫归入东方的现象也都适用于俄罗斯公国—帝国历史的大部分。莫斯科公国对私人拥有土地的确认，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很短：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大规模土地诉讼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成了该现象的标示<sup>⑤</sup>。随着个人领地制度的推广普及，土地诉讼迅速消失。个人领地制度是另一种带竞争性

---

① 首先，他先是因诺夫哥罗德大贵族们的“背叛”——手持武器抵抗“自己的”的君主、全俄罗斯皇帝——而没收他们的土地，然后，他把没收的土地分给莫斯科大贵族作为征服诺夫哥罗德的奖励。接着，他处决了一些新的莫斯科地主，并按那时的惯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此后，他使诺夫哥罗德脱离莫斯科公国杜马管辖，把它交给自己的儿子治理，而儿子又宣布“独立”于父亲。儿子——伊万·马洛谢（小伊万）得到受他控制的新的诺夫哥罗德杜马的赞同，征用了诺夫哥罗德地区的教会土地。父亲本人做不到这点，因为他无法获得莫斯科杜马的同意。再后来，儿子对“背叛”表示“忏悔”，把权柄又交还给父亲，而父亲则将被征用土地纳入领地。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刻起，个人领地制度才成为**制度**。

② Васильев Л. С. Феномен власти-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 Тип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Востоке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М., 1982.

③ Васильев Л. С. 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ка. В 2 т. Т. 1. М., 1993. СС. 66-70.

④ Васильев Л. С. Феномен феодализ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тарую проблему)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7. №6. С.152.

⑤ Алексеев Ю. Г. Государь Всяя Рус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9.

的、得到政权批准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的表达方式。

从那时起，在俄国历史上，所有者没有任何特权和保障，也不受法律的保护。有些人一直反对这种情况，但持不同政见者从来没能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普及，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鼓动广大民众来改变现状。一代又一代，不满的情绪不断上涨，而在达到顶点之后，又跌落至几乎为零。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历史阶段，群众在意识里几乎普遍相信，**权力—财产是社会的自然状态**，而在另外一些阶段，很多人则**怀疑**其自然性。这两种情形的高潮期都非常准确地“切入”从蒙古入侵算起的七代人周期率中。怀疑的每一个高潮期都有自己的经过史。

怀疑的浪潮来自外部，而且来自西方，不是东方。因此，在与欧洲立陶宛大公国问题权威专家K·彼特凯维奇就西方和东方对立陶宛大公国发展的影响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之后，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主要的一点在于：利沃尼亚战争<sup>①</sup>是俄罗斯人民为选择发展道路所进行的首次国内战争中的首个行动。“这场国内战争，时断时续，长达一个多世纪，成了人民中分属不同种族和文明的两部分人运动的出发点”<sup>②</sup>。

把波兰人驱逐出莫斯科——现经国家杜马倡议已被定为祖国日——是一个关键时刻：当时，历史之秤摆动的指针转向了**肯定权力—财产**的一方。而这一转变在公共意识中具有坚实的基础：取得胜利的人民在罗曼诺夫王朝初期，每年都在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坚定地主张专制，换言之，也就是恢复和完善**权力—财产系统**。

权力—财产在彼得改革进程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表达。改革在彼得去世之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正是在那个时候，在人们的认识当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公共的无意识中，形成了为精英和民众都能接受的执政理想，因为普遍的奴隶地位由垂直的社会流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能人统治和国家家长作风得到补偿<sup>③</sup>。

随后，精英们开始不断怀疑权力—财产的有效性，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抵御来自日益强大的欧洲的影响。疑问的高潮出现在19世纪改革的前夜。转向欧洲价值体系的尝试导致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个社会生态危机、同时也是自然和社会危机的产

---

① 利沃尼亚战争（1558-83），俄罗斯为取得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而与利沃尼亚骑士团、瑞典、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1569年起为共和国）进行的战争，最后以签订不利于俄罗斯的和约而告结束——译者注。

② Кульпин Э. С., Петкевич К.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мутами: феномен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Литовского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4. №2.

③ 分析过程、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公式”和俄罗斯文明的文化密码——基本价值体系，参见：Кульпин Э. С. Исток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 Кульпин Э. С., Клименко В. В., Пантин В. И., Смирнов Л. М. *Э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М., 2005.

生<sup>①</sup>。当然，可以分析一下权力—财产系统转型过程中的错误，而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者根据自己所能进行了改革。重要的是另一点：在转变的时候，其困难和成本一代又一代地、不知不觉地促使情绪的向量从积极转向消极。按照笔者所说的历史节律，普遍确信“权力—财产系统对我国而言是自然的”，其峰值正好发生在当今。这可以被证明吗？

对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的认识。要知道，在本质不变的情况下，权力—财产的表现形式总是多种多样的。其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的“外衣”掩盖着其本质。这特别直观地体现在研究者“自己高兴被骗”的时候。许多人都曾非常希望、至今还是希望把俄罗斯看作欧洲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彼得和彼得后的俄罗斯欧化的（直义和转义）“外衣”塑造了一个欧洲国家的形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制度支持了这种幻想。形式被当作实质。瓦西里耶夫的基本概念没有立即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也从来没有利用它来对俄罗斯历史的苏联时期进行过思考。而当人们开始从权力—财产的角度考察俄罗斯现象时，就弄不明白：权力—财产具体以怎样的形式、披着怎样的“外衣”“隐藏”在哪里？实际体现在哪里？Н·普利斯凯维奇不久前的研究揭开了俄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sup>②</sup>，他证明，第一，党的权力—财产是权力—财产的现实体现<sup>③</sup>，第二，权力—财产的无效不是自然特点，而是技术特点，与反馈的减弱、监管机构功能丧失有关<sup>④</sup>。

任何系统，就像一个活的机体，只有在直接联系和反馈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是有活力的。在俄罗斯的权力—财产体系中，苏联时期的反馈是通过监管机构——党的国家监督委员会、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来实现的。普利斯凯维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机构的退化导致系统—财产的党的化身的崩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党的化身的崩溃投影到系统本身的危机上。按照普利斯凯维奇

---

① 这场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黑土中心和伏尔加河流域国家最佳土壤的肥力急剧下降、1890年代开始的饥荒、日俄战争中的军事失利、1905年至1907年的革命、斯托雷平改革的负面社会后果，参见：Кульпин Э. С. Конфликт ментальностей в реформах Столыпина //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и гармония. М., 2007。

② 泛泛而谈，难免挂一漏万，研究普利斯凯维奇的观点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只是想建议读者们阅读一下普利斯凯维奇这篇全面深入的研究论文。

③ “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委婉说法的背后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实质上的党的专政——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布），联共（布），苏共。该党使党—国一体，成为**国家全部生产性资产的事实上的所有者**……承认对所有者——不仅是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的所有者，而且是一般社会成员的所有者——负有责任，是全社会承认所有权合法性的证明……苏联社会对党的责任的领导地位的实际承认，证明在其眼中党—国作为最高所有者的合法性”（Плискевич Н. М. "Власть-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утации // Мир России. Т. XV. 2006. С. 75）。

④ 控制功能减少到几乎为零会导致效率降低并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见 Плискевич Н. М. Указ. Соч., С. 79.）。



的逻辑可以正确地得出如下结论：假如具备有效的反馈，就不会出现崩溃。但是，什么是反馈的有效性？反馈不一定要通过野蛮的、反人道的方法来实现。东方历史表明，社会能够接受具有人道面孔的专制主义。

因此，在赞同基本事实和科学证明方法的同时，笔者不能同意普利斯凯维奇的最终结论。普利斯凯维奇写道：“这一切都表明，所有权新突变的条件在苏联体制的内部成熟。同时，这一过程触及到的，不仅是高层领导，而且是所有的民众”。结论是：“……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障碍——由民族文化的传统主义者部分给我们的发展带来的障碍——不像今天看来这样绝对…… 尽管‘权力—财产’系统一如既往地显示其稳定性，但可以说，它突变的先决条件在国内已完全成熟了。我们的‘过渡期’极有可能将继续到这种突变成为事实那一刻。”<sup>①</sup>

任何系统，就像一个活的机体，在应对环境的挑战时，会利用所有的机遇进行自我保护，进行不改变其本质的内部调整。后苏联时代的事件表明，正在发生的不是权力—财产系统的**原则性突变**，以将其移变为另一个权力与财产分离的系统，而是**内部调整**，目的是使监管机构现代化并以此使系统得到加强。财经事务局介入到所有或多或少有点影响的财政、经济和工业组织中，并不是偶然的。同时，垂直权力在加强。这一调整效果如何，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方向的运动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找到足够有效的方法用以在不改变制度本质的同时监督社会及其生产活动。最重要的是，这种趋势得到民众的支持，不管人们如何看待21世纪的总统和国家杜马选举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排名评级。

要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仅从系统的内部趋势出发作出预测，是不可能的：由各种完全不同的系统的遗传密码“编程”的内外影响将合成怎样的系统，也难以预料。但是，如果外部的影响较弱（或人工减弱）的话，那基于以前的历史发展规律，可以设想，需要通过几代人，才能在社会上形成对权力—财产系统自然性和社会对其接受性的怀疑。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到现在，正好是一代人更替的阶段。健康的、有工作能力的居民中的主要部分得到了充实更新。在改革后的俄罗斯，公共无意识不接受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欧文明的生活条件。所有不能接受权力—财产系统的人，已经离开或不久将离开俄罗斯。留下来的人则在参与权力—财产现代化的进程。

（贝文力译，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

<sup>①</sup> Плискевич Н. М. Указ. Соч., С. 79, 111.

---

**【Abstract】** Seven alternations of generations in humans' life are consistent with changes in the nature's life.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Russia into seven generations cycles, beginning with the Mongol invasion,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self-organizing system, bu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heritage of East, merged with the traditions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played a more determinate role for Russia. Wide Christianization of Russia occurred precisely in the era of Mongol rule in XIV-XV centuries, which indicates a favorable impact of the East on the rhythms of Russian history. More importantly, Ivan III introduced the principle of power-property into Russian life. Since that time, the power was identified with the property and the property became a function of power. The owner did not have any privileges, or guarantees,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s. In certain periods of Russian history in the public mind there was almost universal conviction that the power-property is the natural state of society, at other times many people tended to doubt that. The peaks of one and the other states exactly "fall" on the completion of seven generations demographic cycles, leading the readout from the tim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Events of post-Soviet era show that what is going on now is not a complete mutation in the power-property system, but the internal restructuring, designed to modernize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and thereby strengthen the system. This trend is supported by the population, while the Western European model of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ownership is denied by public unconscious.

**【Key Words】** Seven alternations of generations, rhythm of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the East, power-property

**【 Аннотация 】** Семь смен поколений в жизни людей совместимы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жизни природы. Дел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на семипоколенные циклы, начиная со времен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отражает эволюцию самоорганизующейся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более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 явилось наследие Востока, слившееся с традициями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Широкая христиа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произошла именно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ига XIV-XV вв., ч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м восточном влиянии на ритмы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оле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 то, что Иван III ввел в практику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 принцип власти-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ачиная с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власть отождествлялась с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ю, 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становилась функцией вла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ик не обладал ни привилегиями, ни гарантиями, ни

защитой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конов. В отдельные период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очти всеобщая убежденность в том, что власть-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 э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в другое время проявляются сомнения в этом у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Пики одного и другого состояний точно "приходятся" на этапы завершения семипоколенных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циклов, ведущих свой отсчет со времен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Событ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эпохи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не полная мутация системы власти-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а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призванная модернизировать контролирующи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и тем самым укрепить систему. Эта тенденция пользуется поддержкой населения,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модель раз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отрицает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ы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емь смен поколений, ритм истории, влияние Востока, власть—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

(责任编辑 常喆)

## 霍米亚科夫论教派对立和俄国与西欧的差异

杨明天\*

**【内容提要】**霍米亚科夫提出“聚和性”学说，把东正教理想化，东正教是他极力肯定的一面。霍米亚科夫一直把理想的东正教和现实的天主教、新教进行对比。他在西方信仰中看到的，差不多都是缺点；而在东方的俄国的信仰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缺陷。西方信仰是他极力否定的一面。霍米亚科夫期待，东正教通过俄国，可以导致所有文化体系的改革。这是他的使命论。在俄罗斯哲学中，霍米亚科夫最早把西方基督教和整个唯理论体系等同起来。他试图从教会思想引伸出哲学和所有文化的基础，但他偏离了教会。霍米亚科夫的思想模式有助于我们认识俄罗斯的心智特点。

**【关键词】**霍米亚科夫 聚和性 教派对立 俄罗斯 心智

**【中图分类号】**D512.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43-(15)

### 一、前言

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罗斯著名的东正教神学家、哲学家、作家、诗人、政论家、彼得堡科学院的通讯院士(1856)，斯拉夫派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思想中，东方教父学的倾向与哲学浪漫主义的成分结合在一起。<sup>①</sup>霍米亚科夫曾指出，“在我们这儿，对于宗教的兴趣超越了一切”。<sup>②</sup>

\* 杨明天，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文学博士。

① Прохоров А. М.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1. С. 1730.

②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34. <http://rusology.narod.ru/thought/khomiakovas/khomiakovas>

别尔嘉耶夫高度评价霍米亚科夫，他指出：

第一，霍米亚科夫是东正教的第一位世俗宗教思想家，他能够独立思考，批判地对待西方思想。他的作品没有繁琐哲学的影子，没有官僚主义的东西，反映了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的宗教经验，不是学院式的形式主义那种死气沉沉的东西。他给东正教带来了新鲜气息。

第二，在神学中，霍米亚科夫表现得比俄国的许多高级僧侣和神学院的教授更东正教化，更像俄国人。

第三，包括霍米亚科夫在内的整个斯拉夫派的功绩是，指出了俄国思想主要是宗教性质的，应该在这个方面寻找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实质。斯拉夫派第一次明确表述，俄国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宗教性质的，俄国的不安和追求实质上也是宗教性质的。时至今日，所有那些在俄罗斯文化、文学、哲学和自我意识中曾经存在，至今还是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意味深长的东西，就主题、追求和范围而言，都是宗教性质的。<sup>①</sup>

霍米亚科夫思想的上述特点，对于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国内目前有关霍米亚科夫思想的介绍，比较简洁，对其宗教思想的评价，主要是正面的，尚未深究其思想存在的不足。

俄罗斯一些具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哲学家，曾对霍米亚科夫的思想进行过仔细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为后人留下了进一步研究霍米亚科夫思想的宝贵线索。<sup>②</sup>霍米亚科夫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主要哲学和神学文章中。<sup>③</sup>我们现在重读霍米亚科夫的著作，<sup>④</sup>当然不是为了宣扬斯拉夫派的某些观点，也不是为了重弹基督教教派对立的老调，<sup>⑤</sup>而是为了通过他的学说，结合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的解读，了解俄罗斯思想的一些特点，发现其中的一些思维定势，归纳俄罗斯的一些心智特点。以下我们就来说明霍米亚科夫关于教派对立和俄国与西方差异的思想，并由此说明他的思维特点。本文的主要线索是这样的：霍米亚科夫的宗教（东正教）理想，这是他关于教派对立和俄国与西欧差异的思想基础。正是深刻认识到俄国和西欧在宗教和社

---

①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 [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 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Константин Леонтьев.] Париж: YMCA-Press, 1997// www. lib.ru

②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Указ. соч.;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Раритет, 2001. С. 183; Лос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ер. с англ.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1// www. lib.ru;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4; 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吴安迪等译：《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3-347页。

③ Н. О. Лосский, 贾泽林等译：《俄国哲学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④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М., Медиум, 1994.

⑤ 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15页。

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霍米亚科夫发展出有关俄国使命论的思想。这些内容之后，我们谈到霍米亚科夫的表达特点，并对其思想作出评价。

## 二、霍米亚科夫的宗教（东正教）理想

### （一）霍米亚科夫哲学分析的先决条件

欧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启蒙时期唯理论的反动。<sup>①</sup>霍米亚科夫就生活在这种背景下，他的思想恰恰具备以浪漫主义成分反对他自己理解的“唯理论”的特点，只是这种浪漫主义表现在他的东正教理想中。

在霍米亚科夫那里，我们虽然找不到一篇能够系统说明其哲学思想的文章，但还是需要展现其思想的内在联系。津科夫斯基指出，霍米亚科夫是真正的“基督教哲学家”，他从教会意识出发构造哲学体系，他认为完整的真理只存在于（东正教）教会之中，这是霍米亚科夫哲学分析的先决条件。<sup>②</sup>

### （二）霍米亚科夫所理解的教会及有关概念

教会（Церковь）这个概念，在霍米亚科夫那里，是指理想的基督教，以俄国东正教为代表。霍米亚科夫只是指出了教会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以此为基础，更容易理解其教会学说的实质，把握其神学和哲学思想中最具价值的内容。<sup>③</sup>

霍米亚科夫对教会的认识，在我们无神论者看来，是“隐喻”性质的。<sup>④</sup>他认为，教会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有机整体，是身体。这个身体的首领（主要部分）就是基督耶稣。热爱基督和宗教真理的人都属于基督，成为基督身体的组成部分。

教会这个有机整体，被上帝所鼓舞。信徒之间、信徒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沙粒和沙堆之间的松散关系，而是有机的统一：

“被活的身体所掌握的物质任何微粒，都成为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微粒本身从肌体获得新的涵义和生命：教会中的人，处于基督身体中的人也是这样的，其有机基础就是爱”。<sup>⑤</sup>

真理、个人自由、统一、信仰等概念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信徒都热爱基督，基督是最完善的真理和公正的体现者。教会不仅是众人的统一，还是个体保留自身自由的一种统一。这种统一建立在无私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的基础之上。

① Прохоров А. М. Указ. соч. С. 1341, 1304;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Указ. соч.

②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 187.

③ Н. О. 洛斯基，贾泽林等译：《俄国哲学史》，第 33 页。

④ 杨明天：《俄语的认知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38-40 页。

⑤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ум, 1994. С. 88.

热爱基督及其教会的人，拒绝任何虚伪、自满，他们具有明智敏锐的信仰。

真理是这样被掌握的：在爱的基础上与教会团结一致，这是掌握所信仰真理的必需条件，因为完全的真理属于教会整体，“……无知是每个孤立个人的必然归宿，就像罪孽一样……（完全的）理解，就像无可非难的神圣，属于教会所有成员的统一体”。<sup>①</sup>信徒应当通过心灵之爱，追求基督，追求教会的完全真理和公正，那时，信徒就会觉得豁然开朗，获得完整的理性，理解超理性的原则和它们与存在的理性层面的联系。

霍米亚科夫学说的基础在于，“教会不是权威……因为权威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外部的东西；教会不是权威，而是真理”<sup>②</sup>……“认为东正教所要求的是强迫的统一或者强迫的顺从，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教会厌恶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在信仰的事业中，强迫的统一乃是谎言，而强迫的服从乃是死亡”。<sup>③</sup>霍米亚科夫否认教会中的“权威”，反对基督以外的所有“教会首领”。教会的自由属于教会整体，而不属于单个成员。“如果信徒的自由不意味着对自己而言还存在任何外部权威，那么，对这一自由的证实，就是和教会志同道合”。<sup>④</sup>

### （三）霍米亚科夫对教会的态度和对“唯理论”的理解

霍米亚科夫对教会的态度，从他对教会的戒律、首领、自由、真理的认识等方面表现出来：

“我们（教会）的律法（戒律）不是奴役或者为报酬而劳动的雇工的律法，而是领养（孤儿）或者自由之爱的律法”。“教会的任何首领，不管是精神的，还是世俗的，我们都不承认。基督是教会的首领，其他首领教会是不承认的”。<sup>⑤</sup>

“但是，使徒允许人们自由研究，甚至把它作为训喻；教父用自由的研究来保卫所信仰的真理；自由的研究，可以被这样或那样理解，构成真正信仰的唯一基础……所有的信仰，所有可以思考的信仰，都是自由行为，一定来自预先的自由研究……”。<sup>⑥</sup>“教会的统一是自由的；确切地说，统一就是自由本身，严整地表达自由的内部的协调。当这个活的统一被拒绝以后，不得不牺牲教会的自由，以便达到人工的和任意的统一”。<sup>⑦</sup>“我们信仰统一的自由的教会”。<sup>⑧</sup>“认识宗教的真理，只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47.

② Там же. С. 44, 150.

③ Там же. С. 150.

④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 188.

⑤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29.

⑥ Там же. С. 35.

⑦ Там же. С. 57.

⑧ Там же. С. 88.

有基督徒的相互之爱才能达到，除了这个爱，没有别的维护者”。<sup>①</sup>

霍米亚科夫对“唯理论”的理解是这样的：

“谁在希望和信仰之外为爱的精神寻找某些其他保证，此人就是唯理论者”。“除了用言辞表达的逻辑训诫，不承认其他训诫，唯理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它在天主教中比在新教中表现得更加明显”。<sup>②</sup>

萨马林在为霍米亚科夫的神学作品所写的序言中，明确说明，“唯理论，就是逻辑知识，与道德因素相分离”。<sup>③</sup>这是霍米亚科夫对“唯理论”的理解，是他批判西方天主教和新教的重要依据。实际上存在把知性和作为普遍思潮的“唯理论”<sup>④</sup>混为一谈的问题。

#### （四）教会的基本原则在于“聚和性”

霍米亚科夫的以上思想说明，教会的基本原则不在于服从外部权力，而在于“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sup>⑤</sup>聚和性——这是教会的基础，在信徒共同理解的真理和共同寻找拯救道路的事业中，形成自由的统一，这种统一建立在对基督和宗教公正（公平）的一致之爱的基础上。<sup>⑥</sup>聚和性原则意味着，具有最高权力的牧首，甚至普世会议，都不是真理的绝对体现者，只有教会的整体才是真理的体现者。<sup>⑦</sup>

霍米亚科夫总是把“教会”理解为东正教的教会。教会如同基督的身体，它趋向统一。天主教和新教偏离了教会的基本原则。霍米亚科夫把聚和性看作东正教传统的独特的精神财富，是教会民众的普遍理性，不同于新教的宗教个人主义和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独裁。<sup>⑧</sup>天主教，建立在外部权威的基础之上；新教，使个性具有理智的抽象荒漠中的自由。聚合性没有形式的特点，没有唯理论的特点。在聚和性中，没有任何律法的东西，没有任何使人想到国家权力、任何外部的和强迫的东西。<sup>⑨</sup>

霍米亚科夫确认聚和性的，也就是教会的认识论。<sup>⑩</sup>只有聚和性的教会意识才能理解存在，个人意识是无法了解真理的。个人意识的自我确认，总是伴有精神完整生活的割裂，主客体的分割。只有完整的精神才能获得最高的理性，它总是与聚和

---

① Там же. С. 124.

②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47, 49.

③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 193.

④ 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第 843 页。

⑤ Н. О. 洛斯基，贾泽林等译：《俄国哲学史》，第 35-36 页；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第 53-57 页；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9 页。

⑥ Лос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Указ. соч.

⑦ Там же.

⑧ Прохоров А. М. Указ. соч. С. 1461.

⑨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Указ. соч.

⑩ Там же.



性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霍米亚科夫是一位宗教激进分子，他使得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都感到害怕。聚和性是整个斯拉夫派的基本思想，斯拉夫派在其中看到了东正教的实质。<sup>②</sup>霍米亚科夫所勾勒的东正教，以聚合性为实质，它并非现实的东正教，可以看作他的宗教思考和理想。霍米亚科夫认识到，东正教虽然在深层保存着真正的理想，但实际上，世界还从未完全实现基督教的原则。霍米亚科夫把东正教看作唯一正确的教会，这在我们看来，是极端的表现。但他不是狂热分子，并没有把“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理解为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和佛教徒等等都应受到诅咒。

### 三、教派对立和俄国与西欧的差异

#### （一）霍米亚科夫对天主教和新教的批判

霍米亚科夫从聚和性原则出发，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进行了批判。聚和性原则把统一和自由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建立在热爱上帝及其真理的基础上，建立在所有热爱上帝者互爱的基础之上。在天主教中，霍米亚科夫看到的是没有自由的统一，而在新教中看到的是没有统一的自由。在这些宗教信仰中得到实现的，只是外部的统一和外部的自由。<sup>③</sup>

霍米亚科夫认为，罗马天主教会具有类似法律的形式主义和逻辑唯理论的特点，其根基在于罗马的国家制度。这些特点的明显表现，就是西方教会在没有征得东方教会同意的情况下，任意改变了信经，“在圣灵来自圣父”之后，增加了一个词(filioque——“和子说”，即圣灵从圣父“和圣子”来)。任意改变信经，就是骄傲和缺乏“齐心协力”的表现。为了使教会不把这种改变看作异教，天主教被迫认为罗马教皇是绝对正确的。这样，天主教就脱离了完整的教会，成为一个依靠外部权力的组织。它的统一类似国家的统一：这个统一不是超越理性的，而是理性的，具有行政特点和形式特点。霍米亚科夫所理解的西方“唯理论”产生了这样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可以称量罪孽和祈祷，过失以及赎罪，使得两者相抵。一个人的义务或者信贷，可以转移给他人，人们所承认的尊严可以合法交换。简言之，“唯理论”给信仰的圣地带来银行锱铢必较的机制，<sup>④</sup>等等。

在霍米亚科夫看来，天主教的唯理论，确立了一个没有自由的统一，但它却引出了唯理论的另外一种形式，即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反抗的新教。新教实现了没有统

---

① Там же.

②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Указ. соч.

③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С.183.

④ Там же. С. 43, 91-96.

一的自由。新教徒认为，圣经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书籍，由每个信徒主观解释，它是新教徒宗教生活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新教徒没有那一份平静，没有掌握了上帝话语（德音）的毫无疑义的自信，而这份自信只有信仰才能赋予人们”。<sup>①</sup>新教徒把圣经看作绝对正确的权威，但是，对信徒而言，这个权威是外部的权威。新教徒拒绝为逝者祈祷，否定圣物崇拜，鄙视教堂的精美结构。<sup>②</sup>霍米亚科夫认为，这是实用唯理论的表现，不懂得可见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至于东正教，霍米亚科夫认为，在东正教中，耶稣是各个成分的主宰，他的力量在于，使得“诸物丝毫不改变自己的物理实质”，成为他的身体的有机组成。<sup>③</sup>东正教会对圣经的态度是另外一种情况。“圣经对于人而言，就像所有其他事物对于主观理解的关系一样。对于教会，它作为有机的和具有理性的单位，这种关系是内在的关系，换言之，客体对于主体的关系，客体对主体而言是表达，话语对于其说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客体可以不受任何怀疑”。<sup>④</sup>意思是，圣经是教会整体的一种表达，其正确性不受怀疑。<sup>⑤</sup>

根据霍米亚科夫的意见，罗马教会和新教的缺点，具有同一根源——恐惧。一个害怕失去教会的统一，另外一个害怕失去自由。二者都以世俗的方式考虑上帝的事业。天主教徒认为，如果缺少解决教条问题的中央权力，异教就会占上风。新教徒持有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被迫同意他人的观点，就会出现精神被奴役的情况。<sup>⑥</sup>霍米亚科夫这样描写三种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差别：

“在欧洲，三种声音比其他声音更为响亮：/ ‘服从并信仰我的律令’，罗马如是说。/ ‘成为自由的人，并努力为自己创造某种信仰吧’，新教如是说。/ 而东正教会则呼吁自己的信徒：‘让我们彼此相爱，志同道合地信奉圣父、圣子和圣灵吧’”。<sup>⑦</sup>

在他看来，天主教倾向强迫、奴役人的精神；新教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完全自由，以至个人任意胡为；只有东正教会保持了基督、圣徒和教父的遗训。他还进一步写道：

“天主教是与人的本性相抵触的暴政。新教是无法无天的反叛。二者都不能予以承认。独裁之外的统一何处找寻？反叛之外的自由在于何处？二者都存在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古老的、连绵不断的、一成不变的传统中。那里的统一，被赋予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154.

② Там же. С.88-89.

③ Лос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Указ. соч.;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102.

④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154.

⑤ Там же. С.179.

⑥ Там же. С.85.

⑦ Там же. С.195.

了比梵蒂冈的独裁统治更多的权力，因为它就建立在火热的爱的力量之上。那里的自由比新教的毫无领导更加独立，因为它被互爱的恭顺所控制。这就是砥柱和避难之所！”<sup>①</sup>

霍米亚科夫强调爱与自由持续统一的重要性。他认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因此，基督教以自由为前提。虽然教会的教条不可变更，但霍米亚科夫没有放弃独立思考，而且自由地寻求新的道路。“我允许自己在许多情形下不同意所谓的（东正教）教会的意见”。<sup>②</sup>他的理论不是官方或神学院的理论。

以上讨论了霍米亚科夫的基本宗教哲学观点，以及他对教派对立的基本认识。他的宗教哲学影响到他的历史哲学，形成了他关于俄国和西欧对立的认识。

## （二）霍米亚科夫对俄国与西欧对立的认识

洛斯基归纳了霍米亚科夫对俄国与西欧对立的认识。<sup>③</sup>霍米亚科夫的宗教哲学，影响到他有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观点。他对俄国和西欧对立的认识，是其宗教哲学观点的延伸和具体化，与他的东正教理想和基督教教派对立的认识一脉相承。“每个政治问题都具有社会意义；而如果对它很好地加以领会，就会在其中发现它的宗教的一面。”<sup>④</sup>霍米亚科夫没有脱离宗教哲学的核心内容去谈论俄国和西欧的外在差别<sup>⑤</sup>。他说，“欧洲文明的现状，被它信仰中的极端精神界线所决定”。<sup>⑥</sup>“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于它的最初萌芽；思想发展的规律，在于民众的信仰，即在于民众精神概念的最高规范之中”。<sup>⑦</sup>这些话概括地体现了他的这一认识。

霍米亚科夫把人类精神历史的进程归结为两种原则的斗争——“伊朗原则”（与农耕的自发力量相关）和“库希特原则”（与征服的最初因素相关）。<sup>⑧</sup>“伊朗原则”意味着在精神上服从“自由创造的精神”，“库希特原则”则意味着服从物质，服从“通过必不可少的逻辑规则，以确定自己结论的有机的必需性”。宗教中的“伊朗原则”，就是一神教，其最高体现，就是基督教。宗教中的“库希特原则”，就是泛神论。这两个原则在历史中的斗争，就是自由和必需之间的斗争。从心理角度而言，“伊朗原则”倾向于综合地感知世界，而“库希特原则”倾向于分析和唯理论。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285.

② Лос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Указ. соч.

③ Н. О. Лосский, 贾泽林等译：《俄国哲学史》，第40-41页。

④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306.

⑤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305, 454, 463-464, 468, 516;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42, 277-279, 304.

⑥ Хомяков А. С.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школы// [http://az.lib.ru/h/homyakow\\_a\\_s/text\\_0230.shtml](http://az.lib.ru/h/homyakow_a_s/text_0230.shtml)

⑦ Хомяков А.С.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е// <http://www.voskres.ru/idea/homyakv.htm>

⑧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 М., Медиум, 1994. С. 9.

论及俄国与西欧的不同，霍米亚科夫认为，俄国从拜占廷接受的基督教是“纯洁的、完整的”，没有片面的“唯理论”。他并认为，俄国人谦恭、虔诚，热爱神圣的理想，倾向形成农村村社，或者建立在互助责任之上的劳动组合形式一类的社会组织。这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俄国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要比欧洲具有前途，俄国会找到调和资本和劳动利益的道路。霍米亚科夫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召开村社成员大会的米尔（мир），具有重大意义。米尔根据习俗、良心和内心真理的要求，通过传统的公平作出一致决定。在工业方面，合作社（артель）与村社类似。霍米亚科夫说，斯拉夫人没有好战民族的那种贵族体制，斯拉夫人是农耕民族。这个民族是民主派，坚持人道理想，让每个民族和平地生活，具有自己特色地进行发展。霍米亚科夫仇恨奴役。根据他的说法，缺乏道德是奴隶制的主要罪恶。奴隶主总是比奴隶更缺乏道德：基督徒可以成为奴隶，但不应当成为奴隶主。根据道德原则，俄国人看重的是真正的法纪，而不是外在的法纪。<sup>①</sup>（如果涉及俄国的落后，他认为那也只是具体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落后。<sup>②</sup>）

而在西欧历史发展中，基督教理想的实现被迟滞，原因是“唯理论”对它的歪曲（引起民众生活和精神概念中出现二重性的原则<sup>③</sup>），还有西欧人的骄傲自大。西欧无力实现基督教的完整理想，因为它过高评价了认识的逻辑方法和理性。俄国至今无法实现这个理想的原因是，完全的和无所不包的真理，就其实质而言，发展缓慢；另一个原因是，俄国人很少注意研究认识的逻辑方法，这个方法应该和对于现实的超逻辑的理解结合起来。霍米亚科夫相信，俄国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那么，霍米亚科夫批判西方的思想根源何在呢？

津科夫斯基分析了霍米亚科夫批判西方的思想根源，<sup>④</sup>这对我们理解霍米亚科夫，理解俄罗斯哲学批判西方抽象因素的倾向是有帮助的。

津科夫斯基指出，认为在西方文化中“唯理论”占据上风，并以此指责整个西方，这种观点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是所谓的“前浪漫主义”鼎盛时期（如法国、德国）<sup>⑤</sup>的一个观点，俄国思想家把它作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加以接受。问题的核心是认识论中的知性和理性（рассудок и разум）的区分：

“在康德的理论中，知性是形成概念、判断和规则的能力；理性是形成形而上

---

① Хомяков 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Мн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об иностранцах// [http://az.lib.ru/h/homjakow\\_a\\_s/text\\_0220.shtml](http://az.lib.ru/h/homjakow_a_s/text_0220.shtml)

② Хомяков А.С.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е// <http://www.voskres.ru/idea/homyakv.htm>

③ Хомяков А. С.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школы// [http://az.lib.ru/h/homjakow\\_a\\_s/text\\_0230.shtml](http://az.lib.ru/h/homjakow_a_s/text_0230.shtml)

④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 192-198.

⑤ Прохоров А. М. Указ. соч. С. 1341; Грицанов А. А. Новейш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инск, Интерпрессервис, 2001. С. 851.

学思想的能力。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这组概念的辩证对立：知性，作为一种抽象的分析切分，是低级能力，它是高级的‘理性的’具体辩证理解的前提条件。知性经常被理解为使用现成知识的能力，理性则是创造新的知识的能力”。<sup>①</sup>

津科夫斯基认为，俄国思想家把作为普遍文化现象的唯理论和知性认识等同起来，这和德国哲学家雅可比（1743-1819，请参阅本页脚注②）的“情感和信仰的哲学”，“反对启蒙时期的‘知性唯理论’”的思想具有接近之处。<sup>②</sup>在霍米亚科夫那里，知性认识和“完整理性”的对立、知性认识与“信仰”的对立结合在一起，他批评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的一面。津科夫斯基认为，霍米亚科夫最早把西方基督教和整个唯理论体系等同起来，而且这个观点一旦形成，就影响到他的全部哲学思想。<sup>③</sup>

此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霍米亚科夫批判天主教和新教的理由。

根据霍米亚科夫的认识，只有在教会中，最高真理才能被理性掌握。条件是，在教会中要有自由，这个自由没有被权威所替代。这就意味着，教会中的真理，如同太阳一样照耀信徒，而不是教会强加给信徒的。霍米亚科夫确认这一观点，意思是要克服天主教的影响。天主教要求个人意识顺从、听从教会，它不认为个体能够认识真理，甚至压制个体的这种认识。

而在肯定所有自由研究的同时，霍米亚科夫又不遗余力地批判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新教所倾向的一个方面。新教认为，个人理性完全有权利、有能力认识真理。霍米亚科夫却认为，为了获得真理，需要“众人的共同努力”，需要普遍的，被爱所温暖、所照亮的认识工作。对霍米亚科夫而言，问题不在于他要把认识的集体特点置于个人主义（个体认识）之上，他强调的是，需要具备“爱的交往”，以证明灵魂的道德力量共同参与认识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霍米亚科夫对天主教的主要批判，和 11 世纪的教会分裂相联系，要点在于，西方教会在没有征得东方教会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一个新的教条（“和子说”），破坏了认识的道德条件，因此，与真理分离了，臣服于“唯理论”。天主教和新教都是唯理论的表现，都是片面的。天主教是唯物的唯理论，新教是唯灵的唯一理论。<sup>④</sup>

在论述俄国与西方的思想差异时，霍米亚科夫还谈到了精神的完整性可以克服知性认识的片面性的问题。根据霍米亚科夫的观点，精神的完整性不仅是为了克服知性认识的片面性，在最初的认识阶段中也是需要的。存在第一性的行为，认识的

---

① Прохоров А. М. Указ. соч. С. 1301.

② Там же. С.1874.

③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192.

④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II. М., Медимум, 1994.С. 59-60, 124-125.

过程以这些第一性的行为开始。霍米亚科夫把这些第一性的行为叫作“信仰”。作为认识的最初阶段的信仰，在霍米亚科夫那里是广义的，不只表示宗教信仰，而是表示完全地“直接地”了解现实。

正好在雅可比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和知性认识进行了尖锐斗争，可以看到生活和理性之间尖锐的二律背反。霍米亚科夫就是把“信仰和知性认识”对立起来。根据他的意见，信仰本身就是（完整的）理性的功能。“我把理性的那个能力叫作信仰，这个能力感知由它所传递而来的、由知性进行整理和意识的现实的材料”。<sup>①</sup>信仰的材料是第一性的材料，人们的知识从这些材料构造而成；这些第一性的材料“先于逻辑意识”，它们构成“生活的意识，不需要证明和理由”。

霍米亚科夫还对先验论框架内的知性和理性进行了分析。

津科夫斯基认为，在俄罗斯哲学中，霍米亚科夫第一个表达了认识论中的本体论的观点，开始通过信仰的行为（“活的知识”）进行认识，在信仰的行为中，认识和被认识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为了揭示西方唯理论在认识论方面的基本错误（其根源来自宗教，也就是天主教的特点），霍米亚科夫过度强调知性的缺点，他认为，通过知性，人们从信仰材料得到的仅是“现象”。

霍米亚科夫对知性功能的评价囿于先验论。因为把知性和理性对立起来，不仅历史上在先验论中获得了繁荣，而且只在先验论中，获得了严肃含义。霍米亚科夫试图说明东正教在神学和文化哲学方面的精神优势，他想展示先验论在哲学上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唯理论的极点。霍米亚科夫对唯理论的批判来自聚和性学说。<sup>②</sup>

根据津科夫斯基的看法，唯理论是西方精神生活的一个危险产品，与之联系的实际上不是知性占上风，也不是脱离完整的精神，而是完整精神的疾病。西方也多次意识到唯理论的缺陷。霍米亚科夫把知识的第一性行为（“活的知识”）评述为“信仰”行为，肯定认识的聚和性特点，这在俄国哲学的认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霍米亚科夫对先验论的依赖，使他过多地批判知性认识。<sup>③</sup>

#### 四、霍米亚科夫的使命论

别尔嘉耶夫、津科夫斯基和洛斯基都谈到霍米亚科夫的使命论。津科夫斯基指出，霍米亚科夫批判西方，把西方与俄国对立起来，这是整个斯拉夫派创作的重要

---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193.

② Там же. С.197.

③ Там же. С.198.

主题，但从哲学上看，主要的不是具体批评西方的内容，而是一种期待，紧张地、甚至热切地等待：东正教通过俄国，可以导致所有文化体系的改革：

“历史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发展，要求我们的神圣罗斯表达那些全面的因素，它（正是）从这些因素中成长出来”。“历史号召俄国站到世界启蒙的前列，历史赋予它这方面的权利，因为它的起始因素是全面和完满的”。<sup>①</sup>

霍米亚科夫并不仇视西方，但他深刻意识到俄国的特殊道路，还有俄国具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任务就是，把人类从片面的、错误的发展中解放出来。片面发展是西方影响的历史结果：

“西欧不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天主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被片面理解的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sup>②</sup>

## 五、霍米亚科夫的表达特点

津科夫斯基指出，在研究霍米亚科夫学说的发展脉络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思想，是在分析和批评他人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明霍米亚科夫的智力特点：他倾向辩证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他把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辩证对立。霍米亚科夫的几乎所有的哲学（包括神学）文章、随笔，都是因为他人文章和书籍的原因而写成的。就哲学气质而言，他有点萎靡不振，因此，他需要外部刺激，才能坐下来写一些哲学文章。<sup>③</sup>

与古罗斯时期和启蒙时期的前辈相比，霍米亚科夫的作品虽然也表现出政论性、对历史和道德问题的特殊兴趣以及与文学作品紧密交织等特点，但少了那份对俄罗斯哲学非常典型的整体上对生动形象的词语的追求，富有表现力的手段在减少，说理论证的特点有所加强，文采和激情较为欠缺。

对中世纪的俄国思想而言，典型的就理性和非理性（确切地说，超理性）地解释基督教模式之间的冲突，它不像西方那样以明确的逻辑—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有关神学争论的形式表现出来。霍米亚科夫继承了这个论争善辩的传统。

## 六、对霍米亚科夫思想的评价

霍米亚科夫最具价值的思想，就是聚和性学说。这个思想可以用来解决社会生

---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202.

② Там же. С.202.

③ Там же. С.186.

活的许多难题。<sup>①</sup>霍米亚科夫竭力构造“基督教哲学”。对教会的鲜活感觉，对于理解他的学说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虽然是从教会立场出发解决问题，但是，他的宗教意识还是充满了自由精神。正是这种不需要教会权威的内部自由，决定了霍米亚科夫的精神类型和思维方式。

霍米亚科夫从教会意识出发，认识到不可能停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于是，他第一个研究“聚和性”关于人的学说。“聚和性”原则克服了认识论、道德和创作中的个人主义。聚和性，就其实质而言是本体论性质的。霍米亚科夫的“聚和性”不是“集体”，而是教会，是第一现实，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绝对”。<sup>②</sup>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霍米亚科夫对西方的批判，重点在于西方的“唯理论”，他把唯理论和“知性”认识联系起来，其基本主题在于，从教会（他理解的东正教）思想引伸出哲学和所有文化的基础。但在这条道路上，他不知不觉偏离了教会，走上了他所不熟悉的世俗体系——先验论。<sup>③</sup>

有论者称，“斯拉夫派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西方宗教信仰与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面貌”，<sup>④</sup>这个观点和霍米亚科夫的上述观点恰好相反，应该不是霍米亚科夫的观点。

霍米亚科夫将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所作的对比以及对西方信仰所作的批判，其实是不对称的。他在西方信仰中看到的，差不多都是缺点；而在东方的俄国信仰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缺陷。霍米亚科夫把教会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到东正教，把一切有缺陷的东西都归结到天主教。霍米亚科夫过多指责天主教和新教“唯理论”的一面，他滥用了这一指责。他了解东正教的现实情况，但在西方面前，他做出一种样子，好像俄国的一切都是正常顺利的。实际上，他对俄国教会的罪孽感到不安，他很清楚，现实与他的理想方案并不符合。正如索洛维约夫（Вл. Соловьев）对霍米亚科夫所作的批评：他一直用理想的东正教和现实的天主教进行比较。<sup>⑤</sup>

## 七、结 语

### （一）霍米亚科夫的思想模式

霍米亚科夫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观点，和他在诗歌中所描写的俄国无比黑暗的

---

① Н. О. 洛斯基，贾泽林等译：《俄国哲学史》，第 42 页。

②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Указ. соч. С.203.

③ Там же. С.205.

④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89-90 页。

⑤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Указ. соч.



现实<sup>①</sup>具有天壤之别。历史学家谢梅夫斯基（В. И. Семевский, 1848/49-1916）证实，霍米亚科夫是个贵族地主，他一面高声批判农奴制度，一面更为严苛地盘剥农奴。罗斯托普奇娜（Е. П. Ростопчина, 1811/12-1858）在长诗《1858年莫斯科的疯人院》中，对霍米亚科夫有这样“准确，虽然恶毒”的评述：<sup>②</sup>

他是俄罗斯古风的卫道士， / 他一会是英国人的仇敌， / 一会儿是他们的卖力的吹嘘者， / 为了他们，他能说会道，勤勉卖力…… / ……他是东正教在民间的守护者， / 他坚决持斋， / 洋洋洒洒论述自由， / 反对无谓的忙乱。 / 他大书大吹 / “俄国的卑污”…… / 唾沫星飞溅，但雄辩家对自己的农奴绝不手软!!!

由此可见，霍米亚科夫的思想具有极端性的特点。一面是远离现实，一味地美化、理想化东正教，<sup>③</sup>一面是对现实的西方信仰作出几乎完全否定的评价。他认为，“唯理论”是西方信仰，乃至西方文化的根源，是需要批判的对象，进而对个人主义作出批判。由此自然得出他的使命论：东正教通过俄国，可以导致所有文化体系的改革。这个思想模式又一次复现了人们常常提及的俄罗斯的心智特点：宗教性、极端性、使命论、反对抽象因素，反对个人主义，等等。

## （二）霍米亚科夫思想的历史影响

从俄罗斯哲学史的角度看，霍米亚科夫思想的历史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sup>④</sup>

从18世纪末期的恰达耶夫开始，俄罗斯哲学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哲学倾向，它需要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俄罗斯与西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作为宗教的形而上学问题提出的。霍米亚科夫继续思考这一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是第一点。

西方唯理论哲学的“抽象因素”，此后成为俄罗斯哲学传统的批判对象。在19世纪40—50年代的斯拉夫派，特别是霍米亚科夫等人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俄罗斯文化需要创建自己独特的民族哲学，其背景就是对西方“唯理论”的批判。这是第二点。

“聚和性”成为俄罗斯哲学的一个定势。斯拉夫派哲学的构建原则是精神的完整性学说。精神是存在、认识和伦理的基本原则，借助具有信仰的理性和爱的行为，达到综合的活的知识，这个学说成为个体世界观和社会构造的基础。“聚和性”作为存在的普遍的形而上学原则，还体现在确认内部自由对于外部自由的优先地位，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形成新型个性的要求。这是第三点。

人类集体的宗教伦理，或称“我们的哲学”，是俄罗斯哲学的特点之一。它强调

① Баландин Р. К.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М., АСТ. Астрель. Хранитель, 2006. С.188.

② Там же. С.189.

③ Баландин Р. К. Указ. соч. С.191.

④ Грицанов А. А.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инск, Интерпрессервис, 2002. С. 912-917.

有机整体的思想，认为只有在整体内部，个体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我”，从而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在俄罗斯哲学的大多数学说中，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定势始自霍米亚科夫关于教会和“聚和性”的学说。这是第四点。

---

**【Abstract】** Khomyakov raised Sobornost Doctrines idealizing Eastern Orthodox, which is what he made utmost efforts to ensure. Khomyakov always compared ideal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with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in reality. In western beliefs, Khomyakov just saw almost all weakness, while he hardly found any weakness in eastern Russian beliefs. Western beliefs are just what he extremely wants to deny. Khomyakov hoped that the Eastern Orthodox could lead to reforms in all cultural systems, which are also his theories of mission. In Russian philosophy, it is Khomyakov who equated the western Christianity with the whole doctrines of rationalism. Khomyakov tried to originate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all cultures from the church thought, but he deviated from the church. Khomyakov's thinking pattern helps us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mentality.

**【Key words】** Aleksey Stepanovich Khomyakov, Sobornost, Religious Opposition, Russia, Mentality

**【Аннотация】** Хомяков выдвинул учение о «соборности», идеализировал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уче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было тем аспектом, которой он усиленно утверждал. Хомяков всё время сравнивал идеалистичн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реалистичный католицизм и 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 В западной вере он видел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только нега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вере Росс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замечал никаких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Он усиленно отрицал веру Запада. Хомяков ожидал, что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через Россию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всей системы культуры. Это было его жизненной теорией. В философии России Хомяков стал отождествлять запад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всю систему рационализма. Он пытался извлечь основу философии и всей культуры из церкви, однако он отошёл от церкви. Модель мышления Хомякова помогает нам понять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енталитета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С.Хомяков, соборность, меж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Россия,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

(责任编辑 郭小丽)

## 地理的不确定性： 关于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

马克·巴莘\*

---

**【内容提要】**针对俄罗斯归属于欧洲还是亚洲的问题，传统上公认的解说有：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不同于亚洲；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这些观点各有道理，但需细化。下面几个论题将有助于对俄罗斯属性的进一步认识：1) 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欧洲帝国。2) 激进的欧亚主义者不反对俄罗斯的欧洲性，但反对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帝国。3) 欧亚主义者宣称俄罗斯—欧亚不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欧亚主义者将欧亚理解为与欧洲或者亚洲完全不同的文明。4) 欧亚主义者重新将俄罗斯—欧亚视为一个潜在的殖民地，而俄罗斯的使命是反殖民的领导者。

**【关键词】**俄罗斯 身份 欧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77.512.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58-(13)

---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到底归属于欧洲还是归属于亚洲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俄罗斯，并成为贯穿其长期以来对自身政治、文化和国家认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苏联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影响，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遮掩了。但80年代中期，当戈尔巴乔夫选择以“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为目标来凝聚人心、以便对苏联社会进行重组改革时，这种关于归属的争论又戏剧性地浮现出来了。自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以及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身份和使命这一整套的问题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此外，通过两次大战期间的欧亚主义学说的复兴和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等领导下的欧亚主义分子组成的政党及青年运动的富有活力的发展，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当今的欧亚主义在形式上已被诸如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崇奉为一种虚拟的意识形态，坚持认为它为后苏联空间的再次整合提供了概念框架和合法性。

---

\* 马克·巴莘（Mark Bassin），Center for Baltic and European Studies, Södertörn University, Stockholm.

关于俄罗斯归属问题的研究，著述已颇丰。但大多数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即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的内部讨论中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在 20 世纪 20 及 30 年代是受到激进的欧亚主义新信条的挑战的。作为初步的“一些想法”而非研究结果的展示，作者在本文中重新考察这些假设。作者认为这些假设未必一定是不准确的，但它们的确需要被细化、被阐释，以便可以领会它们的真实意味何在。接着笔者以四个论题的形式展开论述，旨在提出一些新的方式，去思考这些问题在过去对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在未来又会如何被对待。

## 一、传统视角：公认的格言

### （一）俄罗斯自视为欧洲国家

第一个假设是：至少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即使不是完全地、也是主要地将自己视为一个欧洲国家。这个视角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早期彼得大帝倡导的所谓欧洲化改革。彼得大帝相信，俄罗斯真正的伟大及其命运只能通过作为欧洲的一个部分来实现。为了实现对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这对俄罗斯之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改革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给了俄罗斯一个欧洲的外表，并根据欧洲方式来重组俄罗斯。改革的结果令人惊讶，也十分深远和持久，无论是实际层面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均是如此。彼得大帝的新的意识形态含蓄地承认了欧洲大陆的唯一重要性及欧洲文明的无与伦比的卓越性。彼得大帝的一个主要副官将欧洲描述为一个“无论就其物质丰裕程度还是学术氛围，抑或它的力量、荣耀甚或它的适宜的气候，都毫无疑问地主导着地球上所有其他的地方。”<sup>①</sup>到 18 世纪末，这种视角逐渐正式成为国家意识的一个部分。这可以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自信地宣称“俄罗斯是欧洲一大强国”<sup>②</sup>中看出。的确，斯拉夫主义者或泛斯拉夫主义者等民族主义分子在 19 世纪均曾挑战这种身份认同，但即使是其中最喧嚣的分子也依旧十分矛盾，甚至在很深层面上不能将他们自己从彼得的欧洲主义中剥离出来。再也没有比亚历山大·布洛克（Aleksandr Blok）那火药味十足的反西方诗歌大作《斯基泰人》（*The Scythians*）更能证明这一点了：

俄罗斯是个难解的谜。欢乐与忧伤/都充满肮脏的血/她望着、望着、  
望着你/以仇恨和爱恋的目光

即使是对像布洛克这样最为尖锐的民族主义分子来说，俄罗斯文化的伟大遗产——它的美术、文字、科学——均构成了欧洲文化遗产中非常珍贵的一个部分。

<sup>①</sup> Vasilii Nikitich Tatishchev, “Leksikon rossiiskoi istoricheskoi, geograficheskoi, politicheskoi i grazhdanskoi”,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Leningrad: Nauka, 1979, p. 271.

<sup>②</sup> *Instruction de sa majesté impériale Catherine II*, St. Petersburg: Académie des Sciences, 1769, p.3.

## （二）亚洲被看作是与俄罗斯异质的“他者”

第二种假设是，在对欧洲持久的身份认同日益强烈的同时，俄罗斯对东部和南部接壤的那些亚洲国家的疏离感和本质上的对立感也在增强。人们广泛地将这二者的并存视为俄罗斯历史的意识中早已成文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这一现象甚至早在俄罗斯自视为欧洲的一部分的国家想象之前就已出现。这是俄罗斯与来自欧亚草原的怀有敌意的游牧部落长期交往的一个结果，这些部落包括：哈扎尔（Khazar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钦察人（Polovtsy, or Cumans）。当然，最具破坏力的是成吉思汗金帐汗国的骑兵，他们于13世纪入侵并破坏了古俄罗斯的文明。这一痛苦的经历促使他们将亚洲的东方看作为实际存在的敌人——而实际上也是俄罗斯的末世惩罚——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到苏联时期。这种将亚洲视为俄罗斯的“他者”的观点，在18和19世纪固化下来，当时的一个广泛的西方思潮是西方文明优越于世界其他地区。俄罗斯人接受了这种西方思潮，同时，认为自己也是更高文明的承载者，遵从天意，将启蒙和现代性带给蒙昧无知的东方人民，这与其他欧洲霸权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如出一辙，而且这也是俄罗斯人自己在所有问题上不遗余力要强调的一点。“我们可以用西方大国的话语来予以描述”，一位俄罗斯19世纪中期在远东扩张的支持者说，“我们在野蛮的部落和人民中传播基督教和文明”。<sup>①</sup>

## （三）欧亚主义曾是宣称俄罗斯具有一种亚洲身份的唯一学说

最后一种假设相对于前述两种假设是一个例外，这也是俄罗斯民族思想中唯一的一种趋势，即并不认为俄罗斯自然而然地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也不认为俄罗斯天然地就是与亚洲的东方并列的或是不同的。这种例外就是欧亚主义的教义，其对于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及其未来命运持史无前例的全新的观点。欧亚主义是20世纪20和30年代在一群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他们逃离革命，汇聚在中欧和西欧国家的首都，形成了对于受到一战蹂躏和沙俄帝国瓦解影响后转型世界中的俄罗斯及其地位的新视角。欧亚主义者附和19世纪斯拉夫学派的先驱及其当代学者如布洛克对于俄罗斯与欧洲社会天然的友爱的怀疑，但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有力并明确地坚持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不仅彼此没有共同之处，而且还天然相反，且互相持敌对的态度。事实上，他们甚至坚持将俄罗斯与其他那些同化于欧洲文化因素的西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相区别。俄罗斯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斯拉夫社会。<sup>②</sup>

---

① “O parakhodstve na Amure”, *Irkutskie Gubernskie Vedomosti*, 1857, No. 14, otdel ii, p.2; emphasis in original; Mark Bassin,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98.

② 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skoi, “Verkhi I nizy russkoi kul'tury”, *Istoriia. Kul'tura. Iazyk*, Moscow: Progress-Univers, 1995[orig.1921], pp.126-140.; Otto Böss, *Die Lehre der Eurasier. Ein Beitrag zur russischen Ideen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Wiesbaden: Otto Harassowitz, 1961, p.64.

总体而言，人们一致认为，欧亚主义者主要持以下观点：不是欧洲而是亚洲为俄罗斯提供了影响及促进俄罗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动力。这意味着俄罗斯文明真正是一个欧亚的社会——或者像他们更喜欢的——称之为“俄罗斯—欧亚”的社会：一个多面向的，由原始斯拉夫人的最初融合加上芬兰—乌戈尔、鞑靼—突厥以及蒙古等元素构成的社会。欧亚主义者认识到其中大量的密切关系，这些关系标志着将这些多样的东方群落整合为一个单独的整体，从一种共同的历史遗产变为民间文化中共享的模式，大范围的语言学借鉴和影响，以及人种方面的亲缘关系。<sup>①</sup>事实上，追寻当时在德国发展起来的种族学，一些欧亚主义者甚至尝试着界定一支特殊的欧亚种族的个性。<sup>②</sup>

不仅从人种的角度，而且从地缘、历史、社会、经济的角度，欧亚主义者都将俄罗斯视为欧亚的一部分。在否认了与欧洲的亲缘关系之后，俄罗斯现在成了一个完全独立和自治的文化—历史背景的一部分。这是从漫长的与其他居住在这个被称为欧亚“大熔炉”的广阔区域里的其他民族的同化过程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的。<sup>③</sup>这一复合体形成的关键时刻，是古代俄罗斯被金帐汗国的游牧军队征服之时。欧亚主义者并不否认这一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创伤，但他们提供了关于这一经历的肯定的评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民族净化和重生。他们还认为，最终摆脱了蒙古统治的俄罗斯，是这一复杂混合物，即欧亚文明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文明受到了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尤其是地缘政治规则和理念的激励。而这些理念和规则明白无误地来自于东方而非西方。

## 二、四个修正主义的论题

尽管严格意义上以上讨论的几种观点并没有错误，但是，我还是认为以上观点均需要细化，以便更确切地了解他们实际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事实情况到底如何。循着这个思路，我谨提供以下值得考虑的几个论题。

### （一）俄罗斯不仅被认为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欧洲帝国

这一论点看似只有细微的差异，但实际上非常重要。俄罗斯并不仅仅将自己视为一个欧洲国家。更确切地说，它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欧洲帝国，这毫无疑问是彼得计划的最重要的一个成果。随着俄罗斯 1721 年在北方战争中大败瑞典，莫斯科的古代名称—沙皇国（tsardom）—被正式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被十分隆重地宣

---

① 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skoi, “O turanskom elemente v russkoi kul'ture,” in *Istoriia, Kul'tura Iazyk*, Moscow: Progress-Univers, 1995[orig.1925], pp.141-161.

② V.T., “Poniatie Evrazii po antropologicheskomu priznaku”, *Evraziiskaia khronika*, 1927, No. 8.

③ K.A. Chkheidze, “Iz oblasti russkoi geopolitiki”, *Tridtsatyie gody*, 1931,p.113.

布为帝国，或者说是效仿欧洲模式的、有着一个最高统治者或者说皇帝而不仅仅是一个沙皇的国家。<sup>①</sup>就由一个主要的民族部落（大俄罗斯）领导的领土组成的客观情况而言，俄罗斯是一个 *帝国*，统治这些附属民族。而作为一个 *欧洲帝国*，俄罗斯应该遵从相同的、基本的地缘政治模式，这一模式界定着帝国实体，比如俄罗斯用来比照自己的大英帝国、法国或者伊比利亚。这一模式包含许多内容，但其中最为基本的，是需要对其国内地理空间进行重新认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包含着：一方面是在帝国范围内帝国中心或宗主国的空间的明确的区别，另一方面则是与臣服的殖民地的区别。

然而，在借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彼得大帝的改革立刻就面对着一个地理问题：在西方的欧洲帝国，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认知区别一般对应着一个真实存在的、被大量水体分离的物理—地理的分隔状态。很明显，这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物理—地理上的区隔更具体地对应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大陆的天然并存，到 18 世纪时，他们各自已经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发展。相反，在俄罗斯，情况则大为不同。因为准确地说，俄罗斯的帝国空间是一种相邻的地理空间，因此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特别的地域区别总是模糊不清的。而且，由于俄罗斯的领土是相互连接的，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又分处欧亚大陆，因此，它的领土范围传统上是不清晰的，在 18 世纪早期就是这样了。

据此看来，大陆疆界的地理问题成为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主要关注点。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因为只有它可以建立便于观察隐藏在欧洲化改革中的俄罗斯传统的帝国空间的客观、自然的地理框架。在彼得 1725 年去世之后的十年里，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彼得大帝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瓦西里·塔季谢夫（Vasilii Tatishchev）认为乌拉尔山脉是划分欧洲和亚洲的恰当的天然地理边界<sup>②</sup>。实际上，这一低矮的、并不出众的山脉代替了一个海洋所起的作用。同时，以此山脉为界，在它的两边，用欧洲人的说法，表现出文明的差异，似乎它们处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这一新的地理疆界暗示着俄罗斯躯体中一个基本的一分为二，即：至少在表面上，俄罗斯似乎是西方帝国的复制品，因此这也能成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有着天然关联的进一步的证据。就像西班牙或英格兰、荷兰或葡萄牙，在最大程度上，俄罗斯也能够被划分为两种主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属于欧洲范围内的家园或大都会，另一方面则是广阔的、但却也是异邦的、欧洲之外的殖民地的边缘地区。塔季谢夫的建议迅速得到普遍接受，因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新的地理地

---

① “Emperor, Russian use of the title of”, in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ed. J.L. Wiczyński,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79, v. 10, pp.200-201.

② Mark Bassin, “Russia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Slavic Review*, 1991, Vol.50, No.1.

图，在这一地图上，西欧帝国的模式是可以利用的。在所有方面，相对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而言，乌拉尔以东领土的绝对异域性——无论是地貌、气候、动植物，还是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发展——均得到保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相当精确地与西方帝国所描绘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区别相一致。

就我们而言，有两个关键点值得关注。首先，彼得大帝的将俄罗斯的自我形象进行欧洲化改革的计划——尤其是建立在一个欧洲帝国形象的基础上——包含着、而且实际上也依赖着一个将从乌拉尔向东延伸至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亚洲化”的交互过程。这种非欧洲的地理上的“他者”的建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他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无可争辩的参照，有助于确定乌拉尔以西俄罗斯的欧洲身份。其次，亚洲化进程这一事实意味着：“亚洲”不仅不是一个与俄罗斯相对立的异邦，而且实际上是俄罗斯本身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帝国时，它必然包括很大一部分亚洲地区作为其殖民领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乌拉尔边界一方面在建立“亚洲的俄罗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确定俄罗斯是欧洲的。塔季谢夫本人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并明确指出，乌拉尔是两个地域范围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个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但它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同样重要的边界，即将俄罗斯的国内空间划分为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他所表达的这种区分“欧洲的”俄罗斯和“亚洲的”俄罗斯的新概念，一直沿用至今。

如此人为的界定，使乌拉尔以东的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根本上与“欧洲”俄罗斯截然不同的亚洲疆域，然而却作为俄罗斯国家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存在着。随着俄罗斯这部分空间的亚洲化，欧洲化改革就臻于完美了。至此，贯穿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亚洲俄罗斯被表述和被确定，这与西方的欧洲帝国对它们自己的殖民领地所使用的范畴相同。换言之，它被明确地概念化为与俄罗斯有关的了，正如印度之于大不列颠、东印度之于荷兰、阿尔及利亚之于法国或秘鲁之于西班牙。俄罗斯人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欧洲殖民主义的东方视角来看待他们的殖民领地，这在罗蒙诺索夫热情洋溢地将勒拿河与尼罗河比较可以看出。更为极端的例子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很多人将西伯利亚称为“我们的秘鲁”、“我们的墨西哥”、“俄罗斯的巴西”或甚至是“我们的小印度”。<sup>①</sup>通过人种学 and 文化的对比，被俄罗斯人征服的通古斯人（Tungus）、雅库特人（Yakuts），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族群，被形容为与被西欧征服的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或者北美的“红番”（red men）完全相同。

---

<sup>①</sup> Mikhail V. Lomonosov, “Oda na den’ vosshestviia na vserossiiskii prestol Ee Velichestva Gosudaryni Imperatritsy Elisavety Petrovny 1747 goda”, 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Leningrad: 1950-1983 [orig. 1747], v.8, p.203; M.K.Vyvyan, “Russia in Europe and Asia”,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v.10, p.38; Mark Bassin, “Invention Siberia: Visions of the Russian Eas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1, Vol.96, No.3.



这些殖民地的人口被看作是具有异国情调和完全迥异的民族组成的。正如西方人花费巨大的努力一样，俄罗斯人也竭力学习和整合其帝国的丰富民族多样性。<sup>①</sup>

## （二）欧亚主义所包含的真正的激进思想并不否认俄罗斯属于欧洲，而是否认俄罗斯是一个帝国

这一帝国模型对于俄罗斯的欧洲化改革尤为重要。这一点，通过欧亚主义学说优先考虑的事项得到了生动的证实。实际上，欧亚主义的形成，就是为了反对这一点。第二个论题是，真正革新的激进的欧亚主义并不否认俄罗斯的欧洲性，而是拒绝俄罗斯是一个帝国的假设。欧亚主义者可能被谴责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但他们坚决支持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在这一点上，他们拥护革命。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Trubetskoi）和其他欧亚主义者所坚决维护的作为一个帝国存在的俄罗斯，现已成为往事。正因为俄罗斯的帝国结构是建立在一个欧洲模式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帝国结构始终代表着外国强加的、从未真正回应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两个世纪以来，彼得改革的成功促使了一个不合理的、专制的国家结构的发展，正如西方帝国主义本身，俄罗斯对其子民及领土作威作福。俄罗斯帝国制度的不公平被其民族沙文主义进一步加剧，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是唯一的“系统”或“构成帝国的元素”。这违背了俄罗斯—欧亚民族群体之间古老的互动模式，而这种原始的模式是建立在平等、协作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欧亚主义者认为，今后的当务之急是，俄罗斯得作出决定来打破这种帝国的传统。

为了替代这种西欧帝国模型，欧亚主义学者阐述了一种明确的后帝国视角的俄罗斯—欧亚，它将是一种文化、历史和社会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凝聚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实体，一种“准”种族或“超”种族单元。他们要求所有居住在这一广大区域的族群认识到并且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它们都被一种共同的欧亚精神凝聚在一起。在一篇充满激情的、题为“泛欧亚民族主义”的文章中，特鲁别茨科伊强烈呼吁：所有相关的人民都承认他们在本质上拥有的基本共性。“欧亚地区的每个民族都必须意识到自己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拥有兄弟情谊的成员。属于欧亚兄弟民族的意识必须强于属于任何其他民族的意识。”<sup>②</sup>泛欧亚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整体的主观意识，这对于务实的国家是必须的：它“不仅具有实际的价值，而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认识到自己是单一的、多民族的欧亚国家，才能为俄罗斯—欧亚提供适合的

---

① Yuki Slezkine, “Naturalists versus Nations: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Scholars confront Ethnic Diversity”, in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ed. Daniel R. Brower and Edward J. Lazzerin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7-57.

② N.S. Trubetzkoj, “Pan-Eurasian Nationalism”, in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and Other Essays on Russia's Identity*,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91, p.241.

建国民族基质。没有它，最终国家还是会散架……”。他承认欧亚地区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由民族群体的异质性组成的国家类型，但毋庸讳言，它依然是一个国家。

这种泛欧亚的“国家”新观念，意味着所谓“大俄罗斯人”再也无法将自己视为其他所有欧亚地区人民的领导或“构成系统”的因素。欧亚主义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也使他们明确谴责受到许多本国流亡者支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些侨民梦想能战胜布尔什维克政权，复活某种大俄罗斯帝国的霸权。这种由大俄罗斯人控制俄罗斯欧亚领土的要求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不管从哪个层面说都是不合法的。流亡的民族主义者诸如特鲁别茨科伊解释道：俄罗斯人应该是自己国家唯一的主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国家本身应该属于俄罗斯人。这是俄罗斯人所拥有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属性——目前，这些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必须将自己调整到这样一个“俄罗斯”——它将失去所有的“边远省份”，并有一条与孤傲的大俄罗斯人口居住地大致相对应的、到乌拉尔山脉为止的边界。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目标，现在只能在如此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实现。<sup>①</sup>

换句话说，俄国人再也不能声称拥有其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享有的、视自己为西方帝国的、在欧亚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和地域的霸主地位。相反，他们现在必须认识到他们所代表的只是构成欧亚大陆多文化群体的另一个“民族”群体。对于后帝国欧亚文化区的真正的融合力量不是俄罗斯文化，而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全面的欧亚文化。由于革命，旧的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而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的确，特鲁别茨科伊相信，革命中所出现的震荡，对于充分缓解世界这一部分所发生事情的真实状况是必需的。1917年以后，人们必须承认，俄罗斯人的地位由过去的一度代表“唯一掌握帝国的主人”和整个国家领土的正式拥有者变为“众多他者中的一个”，他们实际上得与新选举形成的集团分享权威。<sup>②</sup>他写道：俄罗斯人是国家领土的唯一拥有者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显然也不会再有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前身为俄罗斯帝国、现在为苏联的这个国家的民族根基，只能是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整体，拥有独特的多民族共存的局面，拥有自身的民族主义。我们呼吁欧亚合众国，其领土是欧亚的，其民族主义则是欧亚主义的。”<sup>③</sup>

### （三）欧亚主义者宣称“俄罗斯—欧亚”不是亚洲的一个部分

欧亚主义者对于俄罗斯帝国身份的否认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这在我们的第三个论题中将有所体现。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的欧洲化改革需要一个将亚洲的重要部分包括在内的俄罗斯版图。当他们拒绝彼得大帝的改革时，欧亚主义者也拒绝

---

① N.S. Trubetzkoy, “Pan-Eurasian Nationalism”, in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and Other Essays on Russia's Identity*, p.243.

② N.S. Trubetzkoy, “Pan-Eurasian Nationalism”, pp.233-234.

③ *Ibid*, p239.

了这一版图构想。这样，矛盾的是，恰恰是欧亚主义者自己认为俄罗斯和亚洲事实上是完全独立的实体。的确，关于这一点，欧亚主义者尽可能地强调并坚持，结果使得大量的欧亚主义学说将这两个地区相脱离并区分开来。他们对这个特殊问题的关切，在他们对如下命题的延伸和激烈谴责中立刻就表露无遗了。这一命题是，乌拉尔山脉的“自然”边界将俄罗斯国家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实体。相反，欧亚主义者坚持认为，从波罗的海直至太平洋的整个陆地应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紧密而有内聚力的领土实体。这个实体——大约相当于俄罗斯帝国或苏联——构成了一个实际的大陆，从地理上说与其邻近的大陆分离开来，这种分离从它独特的生态区安排也可见一斑。

实际上，欧亚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地理空间，是一个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第三个或者说中间的世界。诚然，“欧亚”的名称表明该地区吸收了亚洲和欧洲的影响，但这却是一个完全的误导，因为他们（欧亚主义者）将欧亚理解为一种与欧洲或者亚洲完全不同的文明。这一更大区域的不可分割性在于，它与欧亚作为一个“整体”的真实的自然状况是相一致的，是一个“与欧洲和亚洲均有所区别的、自我包容的地理、经济和民族的整体。”<sup>①</sup>正如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彼得·萨维茨基(Petr Savistskii)所断言的：

欧亚大陆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欧洲的”或“亚洲的”俄罗斯，因为通常这样所指的陆地事实上正是欧亚的土地。乌拉尔山脉……只是将这个国家划分为后乌拉尔的俄罗斯和跨乌拉尔的俄罗斯……我们应当听取异见，认识到术语的更换毫无意义。是的，不应该这样：保存欧洲的和亚洲的俄罗斯的说法不利于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特殊的、不可分隔的地理世界的理解。<sup>②</sup>

俄罗斯的这种形象，是一个地理性的，不仅仅是在自我之内的村社，而是如苏维埃所反复强调的“封闭”的社会。

欧亚主义者对于俄罗斯欧亚文明起源的理解，强调欧亚与“一般意义上的亚洲”(Asia proper)相区别的物理、地理概念。这一文明的形成，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是由于俄罗斯—斯拉夫人与来自东方的其他人群进行原始的交融混合。然而，它并不被理解为是来自亚洲的，而是来自那辽阔的草原、针叶林和苔原覆盖的特殊的、非亚洲的世界，即欧亚大陆。特鲁别茨科伊声称：纵观历史，欧亚大陆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和文化在这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域，一个由俄罗斯—斯拉夫、芬兰—乌戈尔、塔塔尔—突厥、蒙古等元素构成的高度复杂的集合体。“俄罗斯人、乌戈尔—芬

---

① N.S.Trubetzkoy, "The Legacy of Ghengis Khan: A Perspective on Russian History not from the West but from the East", *The Legacy*, p.220.

② P.N.Savitski, "Geograficheskii obzor Rossii-Evrazii", in *Rossia. Osobyi geograficheskii mir*, Prague:Evraziiskoe Knigoizdatel'stvo, 1927, pp.25-26.

兰人和伏尔加土耳其人，”他写道，“形成了一个文化区，这个文化区与斯拉夫人、东部图兰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说其中哪些更为重要”。此外，特鲁别茨科伊认为，俄罗斯是欧亚而不是欧洲（斯拉夫），这不仅是因为其文化模式，而且也是出于人类学方面的思考。“突厥血液与乌戈尔—芬兰的以及斯拉夫的血液一起在俄罗斯的静脉中交融”，他指出：“人们通常会忘记我们的‘兄弟’（如果不是在语言或信仰上的兄弟，那么也是血液上的、性格上和文化上的兄弟）不仅是斯拉夫人，而且是图兰人……<sup>①</sup>。准确地说，俄罗斯—欧亚在性质上正是图兰。它并不是亚洲的一部分，而是它的替代。特鲁别茨科伊坚持认为，俄罗斯与本来意义上的亚洲根本就没有特殊的密切关系，甚至与中国、阿富汗、波斯这样的近邻也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所有这些地区正如欧洲西方一样，对于俄罗斯而言都是相当陌生的。

#### （四）欧亚主义者重新将“俄罗斯—欧亚”视为一个潜在的殖民地

否认“俄罗斯—欧亚是一个欧洲帝国”，是整个欧亚主义观点的基石，而且这一观点还渗透到了欧亚主义学说的各个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观点形成了他们关于俄罗斯起源以及俄罗斯—欧亚文明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然而同时，这一观点已对俄罗斯在当前全球事务中的立场的地缘政治分析，以及其为未来的定位和发展所必需履行的政治责任，产生了直接的、实际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两个不同但却相关的方面。

其中第一个观点涉及欧亚主义者对俄罗斯在后凡尔赛世界中基本的新看法。他们的视角是将斯宾格勒（Spengler）的“西方衰落说”的心理学洞察与一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后果相结合。欧亚主义者并不仅仅谴责欧洲帝国政权的残酷的殖民主义。他们走得更远，明确地拥护非殖民化以及全球民族自决运动，而这些运动在1918年以后即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斗争将殖民地国家紧紧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西方殖民帝国的霸权。这包括微妙地重新规划和拓展欧洲和亚洲传统的并列关系，使之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欧洲与整个殖民地世界之间关系的对立面。这也是“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关系的早期版本。这种重新规划在第一个欧亚宣言中有着明确的揭示：不是“俄罗斯与欧洲”，正如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 Danilevskii）在1869年讽刺他自己的“初始欧亚”时所说的，而是“欧洲与全人类”。欧亚主义者将后者明确界定为专门的“亚洲”，但坚持相反的命题，即认为它是由“斯拉夫人、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黑人和其他民族组成的，其中，不分肤色，他们都在沉重的罗马日耳曼枷锁下痛苦地呻吟着，浪费着他们的国家能源，生产着欧洲工厂所需要的原料……”<sup>②</sup>

作为这一新的全球力量调整的一部分，俄罗斯—欧亚被重新界定为不仅不同于

<sup>①</sup> N.S.Trubetzkoy, “The Upper and Lower Stories of Russian Culture”, *The Legacy*, pp.96, 99.

<sup>②</sup> N.S.Trubetzkoy, “Europe and Mankind”, *The Legacy*, p.59.

罗马—日耳曼的西方，而且实际上是属于特鲁别茨科伊所称的“人类”——即殖民地国家。“总体来说，”他写道，“欧洲人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殖民地……俄罗斯仅仅被视为一个有着作物生长、可以提供一些物资的土地。”<sup>①</sup>“从这一角度看，”他继续写道，“俄罗斯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一时代，其独立性丧失。今后，俄罗斯将成为一个类似于印度、埃及和摩洛哥的殖民地。”<sup>②</sup>殖民地世界的其他国家在反对欧洲霸权的共同斗争中，将迅速认识到自身与俄罗斯的亲属关系。事实上，俄罗斯的确是这一全球性斗争的一部分，欧亚主义者就此提出了俄罗斯新的普世使命。俄罗斯—欧亚并非仅仅是西方殖民霸权的受害者，更为积极的是，这种不合理的帝国秩序的灭亡，现在使得俄罗斯—欧亚动员世界其他地区并领导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斗争成为可能。“俄罗斯已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欧洲强国，相反却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地国家，领导着它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姐妹国家共同反对罗马—日尔曼和欧洲文明。这场斗争的成功是俄罗斯得救的唯一希望。”<sup>③</sup>

如果说俄罗斯的新地位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角色，那么它对于俄罗斯—欧亚的内部特点则提供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欧亚视角。1917年革命，包括在政治上推翻俄罗斯的帝国秩序，得到了欧亚主义者的欢迎和大力支持。然而，与此相伴的还有古代地缘政治制度的灭亡。在后革命时期，这一古老帝国的边疆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分离运动：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突厥斯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与刚刚提及的政治变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亚主义者被俄罗斯传统帝国的解体吓坏了，并且坚决反对这一过程。因此，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要恢复俄罗斯失去的领土统一。他们坚持认为欧亚文明代表着一种有凝聚力的、不可分割的实体，其中，他们还争论要重新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更确切地说是俄罗斯—欧亚）重新组合成过去的那个单一的地缘政治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尼古拉·利亚扎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所观察的那样，欧亚主义者否认帝国，是为了挽救它。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他们对于国家将重新整合成何种样子的视角则明显地是后帝国主义的。<sup>④</sup>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欧亚主义者把他们关于俄罗斯—欧亚的政治统一的辩论建立在自然—地理准则的基础之上。这一地区的广大领土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将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凭借其物理—地理布局——某些生态区相互之间以及与主要水系的特殊并列——欧亚大陆由于自身自然状况而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且有凝聚力的地块。特鲁别茨科伊认为，正是这些土地的实际配置，形成并决定着生活在这片

---

① N.S.Trubetzkoy, “The Russian Problem”, *The Legacy*, p.103.

② Ibid.

③ Ibid.

④ Nicholas V. Riasanovsky, “The Emergence of Eurasianism”,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1967, Vol.4.

土地上的人们历史运动，并使人们融合在一起。其最终结果是：首先由成吉思汗实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欧亚国家体系。特鲁别茨科伊十分强调这种自然—地理目的论。“一国领土的地理自然状态”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挑战，而他所说的一种“地缘经济使命”，则是一个国家独立生存所必须掌握的。就欧亚大陆的情况而言，这一使命可以促进其疆界内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统一。这条完全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正如他反复坚持的，是“通过地理本身而注定的”。<sup>①</sup>由于这一地区的统一源自大自然，因此它拥有大自然先验的品质，使其无论在 20 世纪还是在 12 世纪均显得如此重要。“是自然环境本身，”他总结道：“教导着当今的欧亚人民认识到，有必要形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并且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形成自己国家的文化。”<sup>②</sup>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注意到，否认俄罗斯—欧亚作为一个欧洲帝国的身份的最根本的意义所在。作为一个帝国，俄罗斯的政治空间具有异质性和二分性。此外，这也合乎逻辑地成为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地缘政治主题，同样合乎逻辑的是，在原先臣属的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主权时，它要承受领土瓦解的过程。然而，作为一个非帝国的俄罗斯，甚至事实上本身作为一个殖民地，或至少是潜在的殖民空间，俄罗斯—欧亚却可以表现为一个同质的、具有凝聚力的地缘政治实体，一种国家或超国家单元，其众多的民族融为一体，如欧亚主义者所说的单一的交响乐团中的成员或个人共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对俄罗斯的身份进行重新认定的结果，后凡尔赛秩序对于它的意义是，它有效地成了欧洲其他被打败帝国的对立面。俄罗斯—欧亚作为殖民地和准国家空间，它的地缘政治的完整性并没有受到非殖民化势头的挑战，而是奠定了它自己声称的新的合理的民族解放和自决的“权利”，这种权利将允许它保留其地缘政治的完整性和凝聚力。

这导致欧亚主义者在他们自己的疆界内断然否定这些相同原则的合法性的深刻矛盾。而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欧亚主义者作为欧洲殖民主义受害者的代表，是坚定地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原则的。事实上，任何一种站在众多组成俄罗斯—欧亚的民族立场上鼓动民族自主的行动都是倒退的和破坏性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抵制。值得赞扬的是，欧亚主义者在这个观点上是一致的，并认识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是有害的而且是危险的，这一点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一样。主张俄罗斯排他的种族民族成分在欧亚框架内的优先权，将堕落到同样反动的分裂的部族主义。为此，他也严厉批评过其他的民族集团，如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其他一些民族。<sup>③</sup>

---

① N.S.Trubetzkoy, *The Legacy*, pp.161, 204.

② *Ibid.*, pp.220-221.

③ N.S. Trubetzkoy, “Pan-Eurasian Nationalism”, *The Legacy*, pp.161, 204.

正是在这种对俄罗斯—欧亚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坚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最终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驱使欧亚主义者不接受、而且强烈否认“亚洲”在其疆界内的存在。他们关于俄罗斯—欧亚传统的领土完整性的全部论证的论据——地理的、历史的以及文化的——是关于这一空间及其“泛欧亚”居民的原始的天然凝聚力的观点。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包括乌拉尔以东亚洲部分在内的帝国实体的更为古老的观念，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一具有团结和同质性的场景，而且也在原则上使俄罗斯—欧亚面临去殖民化的离心势头的危险。关于一个特殊的欧亚文明的争论，从本质上说是反对俄罗斯的欧洲身份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否认了其亚洲身份。

(张红 译)

---

**【Abstract】** Traditionally accepted explanations of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Russia belongs to Europe or Asia include: Russia is a European country; Russia is different from Asia; Russia is a Eurasian country. Each of these views contains some truth, but all of them need to be further refined. The following theses will contribute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ussia's belonging to Europe or Asia: 1) Russia is not only a European country, but is also a European empire. 2) Radical advocates of Eurasian doctrine do not oppose European nature of Russia, but speak against the view that Russia is an empire. 3) The advocates of Eurasian doctrine claim that Russia is a part of Eurasia and not Asia. Advocates of Eurasian doctrine see Eurasia as a civilization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either Europe or Asia. 4) The advocates of Eurasian doctrine view Russia — Eurasia as a potential colony, and Russia's mission is to be an anti-colonial leader.

**【Key Words】** Russia, identity, Eurasian doctrine

**【Аннотац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принятые объяснения вопроса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к Европе или Азии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траной; Россия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Азии;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страной. Каждое из эт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имеет право на жизнь, 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все они нуждаются в доработках. Следующие тезисы буду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к Европе или Азии: 1)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траной, н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мперией. 2) Радикальные сторонн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не отрицают европейскую сущ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отрицают мн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 империя. 3) Сторонн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Россия — часть Евразии, а не Азии. Сторонн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Евразию как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тличную от Европы либо Аз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ю. 4) Сторонн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Россию — Евразию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й колонии, а миссия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лидера анти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

周力\*

**【内容提要】**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共同性、神本意识、好走极端、忍耐精神和全世界回应能力。它们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因果性力量，还是支撑国家外交政策的社会性基础，更是建构国家外交策略的构成性要素。

**【关键词】**俄罗斯 文化 精神 外交 影响

**【中图分类号】**D80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71-(13)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指的是在俄罗斯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或传统。它们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价值追求，不仅是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因果性力量，还是支撑国家外交政策的社会性基础，更是建构国家外交策略的重要元素。

### 一、对外交往促进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俄罗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条件得天独厚，并且极为特殊。俄罗斯领土辽阔，其广大的地域空间将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也使俄罗斯文化在东方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部态势的制约下产生和发展，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受东方文化的制约，深深地打上了文明结合部的烙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传统基因，从俄罗斯文化的孕育期就进入了俄罗斯文化的肌体并扎下了根，也决定了俄罗斯文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成果之一。

\* 周力，四川外语学院社科系副教授。



化开放包容的特质，正是在对外交往的活动中，在与其他民族进行的“我一他”形式的对话中，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

早在东斯拉夫部落时期，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就受到了来自南方和东南方的突厥文化与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芬兰-乌戈尔文化的强大影响，正是通过与比邻的游牧民族的征战和交流促进了东斯拉夫文化和突厥文化、芬兰-乌戈尔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古罗斯文化民族起源的原生层。

东斯拉夫人与瓦兰吉亚人和希腊人以及古代保加利亚人的交往，又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原生层，与斯基的纳维亚文化和拜占庭文化，还有南部斯拉夫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再生层。

基辅罗斯建立后，俄罗斯文化发展不断受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正是在主动和被动地对外交流中，俄罗斯文化走向成熟。

公元 10 世纪末，罗斯受洗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转型，形成俄罗斯历史上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第一次高潮。东正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俄罗斯文化奠定了精神基础，也为俄罗斯文化的宗教性打下了神本意识的烙印。

公元 13 世纪，蒙古入侵和鞑靼的 240 年统治促成俄罗斯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在与蒙古征服者充满血与火虚与委蛇欺诈逢迎的交往中，俄罗斯文化大规模东方化。蒙古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罗斯的表层生活，更以专制权力的绝对权威和政治军事制度改变俄罗斯的内部秩序，为俄罗斯文化注入影响深远的东方成分。

俄罗斯历史上第三次文化大转型是彼得一世面向西方的改革。这是俄罗斯大规模吸收和引进西方文化的又一次高潮。这次融入西方的文化转型跌宕起伏，曲折折，强化了俄罗斯文化的西方色彩，也把俄罗斯文化精神与西方对立的一面凸显出来。

总之，俄罗斯民族的对外交往活动深刻地影响和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而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一旦形成，反过来又给予俄罗斯的对外交往的理念和行为提供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社会文化的强大支撑或实在的制约。

## 二.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

俄罗斯文化精神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或观念，是诸多要素组成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有：

- 共同性

共同性（*соборность*）<sup>①</sup>是俄罗斯文化在面对群己关系问题时的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是集休生存的方式，人民共同命运的表现；是俄罗斯民族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生活原则。

共同性指的是追求在共同的最高目的和价值的基础上的统一，是在对上帝之爱和相互之爱基础上的个人自愿联合，注重的是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参与基础上，个人对村社集体的认同和服从，强调统一，强调整体，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

共同性的思想源自东斯拉夫人根深蒂固的整体至上的传统观念。在传统观念中，整体的东西无条件地占统治地位，个别只能在服从整体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共同性也与源远流长的村社精神紧密相联，是俄罗斯传统道德——村社集体主义的核心，强调村社的利益高于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小我顺从村社的“我们”。

俄罗斯文化注重共同性还与东正教颇有渊源。共同性原则也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基本原则。东正教追求的共同性意味着宗教生活的一致，注重共同一致的宗教信仰，集体理解和剖析真理，注重集体宗教仪式和集体心理感受，寻求共同的获救和普遍的幸福。<sup>②</sup>东正教对“共同性”的偏重，体现出整体化的精神，在赋予整体意识最高价值的基础上追求一致统一。

总之，共同性的精神被理解为广义的集体精神。共同性是一致性原则，是多样性统一原则，共同性是俄罗斯生活的合唱原则，就像俄罗斯的合唱歌曲，这种共同性的歌，其中单个独立的声音和音调和谐地融合为一个共同的谐音。

### • 神本意识

俄罗斯民族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化的根本特点。神本意识在俄罗斯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

神本意识指的是以神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东正教的方式表述就是，上帝始终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和主宰，人不过是上帝的造物，人只有敬畏上帝，绝对服从上帝的旨意和安排，才能得到神眷，回到上帝的怀抱。

俄罗斯文化的神向意识坚持东正教的正统性，认为俄罗斯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俄罗斯东正教自称为东方正教，也就是惟一“正统的”、“公正的”宗教，以颂扬上帝，包括颂扬来自上帝权力为已任的宗教。

俄罗斯文化以神为本的神向意识偏重共同性，追求共同性一致的宗教信仰，集

<sup>①</sup> 有人将 *соборность* 译为“共聚性”、“聚和性”、“聚合性”、“会同性”、“聚议性”、“团契”等。

<sup>②</sup> Яковенко 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4, № 2, с.50.

体理解和剖析真理，注重集体宗教仪式的氛围和程序的严格和集体的心理感受，寻求共同的获救和普遍的幸福。这种宗教的共同性本质上与村社集体主义的共同性一脉相通，赋予了整体意识以最高价值，体现出整体至上的精神。

俄罗斯文化的以神为本的神向意识极具保守性。与基督教其他分支相比，东正教更为坚持传统，更为坚持实际上不可更改的宗教教义，因为在组织上分散的东正教会只能通过一丝不苟地遵照整个宗教的传统，才能避免分裂，达到统一。对传统和宗教教义的坚持，必然会导致东正教教会思想上和宗教仪式上的保守主义在历史上不断加强，导致在教会中保守倾向占优势。

东正教神本意识有着强烈的受难意识，认为基督是受难的象征。通向上帝的道路，是受苦受难的道路。这是惟一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受苦受难不仅仅是肉体，还包含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的考问和心灵的折磨。通过自觉地忍受苦难而接近上帝，以获得痛苦的满足与自我肯定，这种深切的受难意识，不仅使俄罗斯传统的自我节制和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充满宗教虔敬感，更使俄罗斯文化的神向意识具有与其他宗教文化显著区别的独特意义。

俄罗斯文化的神本意识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道德理想的色彩，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神本意识，一种宗教道德的神本意识。它在肯定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人都必须服从上帝的前提下，也认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充满同情和怜悯弱者、痛苦的人和不幸的人的东正教人道主义精神，推崇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和英雄气节。

俄罗斯文化的神本意识孕育了俄罗斯文化的使命意识，救世精神，强调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和特殊地位。俄罗斯民族将在人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精选出来的民族，肩负着上帝赋予的拯救人类世界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是代表真理的东正教的继承人，有责任有义务解放各个民族，拯救芸芸众生的身体和灵魂，甚至拯救全人类。

俄罗斯文化的神本意识强调君权神授，强化对沙皇绝对服从的皇权主义意识，认为沙皇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权力源于上帝，属于沙皇，沙皇就是人间的上帝；俄罗斯全部土地和整个国家属于沙皇，沙皇是所有臣民的主宰，有权支配臣民的自由、生活和财产；沙皇是农民的保护人，是对穷人关怀备至的父亲。

俄罗斯民众认同和接受的皇权主义不仅强调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更强调为君主效力是全民的义务，这是君权神授理念直接的逻辑指向。既然人间的统治者为宇宙的主宰所立，那么君主的世俗职责就源于宗教职责，即为上帝效劳，其使命就是完成上帝的旨意。因此，君主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即宇宙的主宰假人间统治者之手参与治理国家，沙皇只不过是在履行神职。“也就是说，‘神事’与‘国事’密不可分：人民为上帝的仆人——沙皇服务和通过国事为上帝服务密不可分。由此便生

出了沙皇的仆人及所有臣民应承担的义务，即‘以上帝及沙皇之事为生’，为‘国事’效劳。”<sup>①</sup>

### • 缺乏中庸，好走极端

缺乏中庸，好走极端作为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的内容，指的是思想和观念、立场和行为常常表现出互相矛盾的极端性，重视分别，强调对立，缺少中国文化的中庸精神。

别尔嘉耶夫揭示了俄罗斯文化的矛盾统一性，认为“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可以发现相矛盾的特征：专制、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喜好暴力与善良、人道、宽容；迷信宗教仪式与寻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与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信仰末日论-弥赛亚说与表面的虔诚；寻求上帝与好战的无神论；恭顺谦虚与放肆无礼；奴隶主义与造反行动。”<sup>②</sup>

应该强调的是，俄罗斯文化矛盾统一的双重性的根本特点在于表现的极端性。在国家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在造反性和驯服性之间，在心灵自由和社会奴役之间，在虔诚的宗教意识和彻底的无神论之间，缺乏一个过渡的中间带。或者是这个极端，或者是那个极端。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可能找到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但只有俄罗斯，总是很少甚至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中间阶段，没有任何间接的表示，没有过渡，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国家产生于无政府主义，奴隶主义产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超民族主义。

### • 高度的自我节制和忍耐精神

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节制和忍耐精神举世闻名，这既是俄罗斯文明发祥之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酷的地缘条件的产物，更是东正教不遗余力教化浸润的结果。

俄罗斯文化的发祥之地地处高寒地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人们为生存需要不得不更加忘我地劳动，进行单调乏味的工作。由此产生人们坚韧顽强的意志，团结协作、互相帮助的精神和自我节制的禁欲主义道德。

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之地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四周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的保护，来自东方游牧民族经常性的民族灭绝的威胁和来自西方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威胁，迫使俄罗斯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寻找安全的疆界，不断征战，不断扩张。和平只是极个别的例外，战争则是残酷的法则。这种使不断征战成为常态的地缘政治条件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千百年来使东斯拉夫人把高度自我节制提到首位，也使得俄罗斯

---

① Миронов Б.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 2-е изд., Т.2, СПб, 2000, с.117.

②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 Аст.ФОЛИО, 2000. с 8~9.

民族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不断强化。

随着罗斯的基督教化，俄罗斯民族这种自我节制和坚韧不拔的忍耐精神被东正教强烈的忍耐服从精神和受难意识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对待压迫和专横、对待暴力和苦难，对待个人权力和自由遭践踏就像对待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这种被耶稣的榜样神圣化了的态度深化了俄罗斯人的长久忍耐的哲学，深化了对人无能为力的状况听天由命的服从的哲学。这种忍耐和服从的东正教精神和哲学使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忍耐精神获得坚实的宗教观念的支撑。另一方面，俄罗斯东正教强调通过自觉地忍受苦难而接近上帝，以获得痛苦的满足与自我肯定，这种深切的受难意识，使得俄罗斯传统的自我节制和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充满宗教虔敬感。

#### • 善于学习的全世界回应能力

由于俄罗斯文化生长和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缘条件，使得俄罗斯文化深层的东方-西方的二元结构的对立和统一，冲突和妥协贯穿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始终。世界历史两种不同方向的潮流在俄罗斯地缘政治和精神空间的碰撞，人类文明在俄罗斯的肌体和灵魂中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俄罗斯文化因而获得极大的包容性，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品格。俄罗斯文化不仅能包容其他文化，而且易于接受其他文化，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和精华。在学习、借鉴、吸收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具有所谓的全世界回应能力或者“掌握任何一种民族类型特征的能力”（洛斯基语）。全世界回应能力（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指的是俄罗斯文化获得了万能的普遍的回应能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反映别的文化——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话题和思想、冲突和形象，而同时并不改变自己的民族特点。

### 三、俄罗斯文化精神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动因。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居核心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既深刻地影响俄罗斯民众和社会精英对外的态度，更给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选择和实行提供文化的支撑或造成文化的限制。

第一，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化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加强民族凝聚力，为俄罗斯外交提供可资凭借的精神因素。

民族凝聚力是组成外交凭借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的精神要素的重要方面。民族凝聚力往往源自于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而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主要得益于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潜移默化地塑造。通观俄罗斯历史，特别是外交史，正是

独具特色的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滋养了俄罗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使得俄罗斯从基辅罗斯至今在强敌环视的险恶环境中左冲右突不断扩张而颇有凭借。

首先，俄罗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表现为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随着罗斯基督教化，在共同性和以神为本的文化精神的滋养下，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不断发展，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日益增强。突出表现就是文化精英对俄罗斯民族的优点和长处发掘阐发和交口赞誉，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民族优越感。恰达耶夫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彼得大帝教导过的俄罗斯民族那样不偏袒自己，也从未有一个民族在进步的舞台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sup>①</sup>

正是在这种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基础上成长出俄罗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观念，走过头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别尔嘉耶夫不无激愤地指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是民族主义自大狂甚嚣尘上的国家，是把一切（甚至基督的宇宙教会）都民族化的国家，是自诩具有天赋使命的惟一国家。”<sup>②</sup>

其次，俄罗斯文化精神滋养的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为俄罗斯民族凝聚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罗斯文化的神本意识和宗教精神催生了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意识和救世精神，而它们因为适应了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崛起的精神需要而日益深入人心，在增强俄罗斯人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人民热爱祖国——俄罗斯，热爱俄罗斯大地的爱国主义情怀。

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强调俄罗斯人对俄罗斯大地的从属性。这独特地反映在俄罗斯人的自我称呼上。俄罗斯人对别国人民的称呼用的都是名词，如китаец（中国人）、немец（德国人）、француз（法国人）等，而俄罗斯人称呼自己用的却是形容词русский。这具体地表现了俄罗斯人对自己现有的东西的从属性，与最崇高最宝贵的物质的关联性。这种最崇高的物体，这种现有的东西就是俄罗斯大地。居住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人，保卫它，耕种它，爱护它，享受它的恩赐，得到它的保护，作它的孩子，就成为русский（俄罗斯人）。<sup>③</sup>

俄罗斯人的爱国情怀与圣罗斯的观念密不可分。圣罗斯的观念是俄罗斯式弥赛亚意识——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的直接衍生物。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是上帝选民生活的神圣的国家，是上帝选中的国家，是真正基督教的国家。

爱国主义是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正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俄罗斯人团

---

① П.Я.恰达耶夫：“一个疯子的辩护”，Вл.索洛维约夫著：《俄罗斯思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② Н.别尔嘉耶夫：“俄国魂”，Вл.索洛维约夫著：《俄罗斯思想》，第267页。

③ Кондаков И.В.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9, с.49.

结一致，保家卫国，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条件下，打败拿破仑，战胜希特勒，显示出俄罗斯民族的英勇牺牲精神和强大的国家力量。

再次，与爱国主义情怀紧密相连的是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和服从。俄罗斯民众教徒般虔诚地对待自己的国家，就像对一个必须服从的高高在上的命运主宰。一旦外来危险降临时，消除危险需要多少财富、劳动和鲜血，就准备贡献多少财富、劳动和鲜血。问题不仅仅在于彼得堡冬宫或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有权按自己的意志给各个阶层加上国家赋税和国家徭役的沉重负担，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把这种沉重负担作为不可避免和必需的东西来接受了，承担了。在这里，国家的利益高于地方、阶层、家庭和个人的利益。

从这种对国家的认同中，人们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化所倡导的共同性和整体至上的观念的影响，也不难看到俄罗斯文化中宗教精神所鼓吹的服从权威思想的作用。

## 第二，俄罗斯文化精神深刻影响俄罗斯的外交理念

外交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直接结果。在俄罗斯从古至今的外交史上，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对外交理念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为外交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思想养料；二是为外交理念的具体化添加文化优越感的心理支撑；三是为外交理念的施行提供正义性和正当性的道德依据。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诉求和意识作为外交理念的发展颇能说明问题。

俄罗斯的帝国意识着眼于国家强盛，要求不断进行领土扩张，注重俄罗斯作为大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影响和作用，强调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甚至主宰。这种帝国意识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兴盛而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其主要思想支撑仍然是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莫斯科公国起，不断进行领土扩张是形成俄罗斯帝国的不二法门和内政外交的主要任务。俄罗斯“执政的精英们把俄罗斯看作是基辅罗斯和金帐汗国的合法继承者，并力图在沙皇的统治下，‘归并’11~12世纪进入基辅罗斯版图和13~16世纪进入金帐汗国版图的俄国土地”。<sup>①</sup>从1646年到1914年，俄罗斯的领土从141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180万平方公里。<sup>②</sup>这种肆无忌惮的领土扩张除了获得安全屏障，争取不冻港等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外，俄罗斯文化精神滋养下的使命意识和救世精神对沙皇们的影响不能忽视。俄罗斯的沙皇们从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中获得的不

---

① Миронов Б.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 2-е изд., Т.1, СПб, 2000,с.26.

② Миронов Б.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 2-е изд., Т.1, СПб, 2000,с.20.

仅有俄罗斯是世界基督教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帝国理念，还有充当拯救和更新未来世界的救世主的思想，更有义不容辞地扩张领土的堂而皇之的道德依据。

到了苏联时期，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改头换面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旗帜下超级大国的追求。实际上，苏联时代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追求，除了与列宁等把帝国主义看成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关，还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救世精神一脉相承。只不过莫斯科将第三罗马的弥赛亚意识演变成了共产国际追求世界革命的现实行为，正是对世界革命的追求，强化了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情结，强化了苏联及其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

### 第三. 俄罗斯文化精神制约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俄罗斯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当权者的意图，利益集团的角逐和制度的运作，更受制于民众和文化精英的对外态度。而后者受到文化精神体现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则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为外交决策的权力集中奠定思想基础和民众认同基础。

自基辅罗斯起，俄罗斯外交的决策权就高度集中。在基辅罗斯时对外交涉从构想到实施都由大公亲历亲为。到莫斯科公国时期，尽管建立专门的外交机构，但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决策权则完全集中到沙皇手中。俄罗斯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戈尔恰科夫有一次曾说：“在俄罗斯只有两个人知道俄国政府的政策，皇帝决定政策，而我起草并执行之。”戈尔恰科夫的话不无自我炫耀的成份，但的确道出了俄罗斯从沙俄帝国到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决定权高度集中的实情。这种决策权力集中在当权者个人手中的状况不仅有沙皇专制制度的保障，更有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浸润下传统的皇权主义意识作支撑。

皇权主义意识的发展是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的结果。俄罗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共同性原则和宗教精神，强化了民众对集体乃至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心理，这是皇权主义深入人心的思想基础，而宗教精神浸润下的人们对君权神授观念的普遍认同，则把对沙皇绝对服从的崇拜意识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意识支配下，人们不仅认为沙皇对内对外的专权独裁天经地义，而且颇能自觉自愿地为当权者外交上的恣意妄为作出贡献，承担后果。

其次，文化价值观影响外交方向的选择和偏重。

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俄罗斯为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大国地位，很早就提出了双头鹰外交。“在西方受到挫折向东方寻求安慰；在东方得到同情再返回西方



求爱”。<sup>①</sup>然而在东西外交的取向中，俄罗斯在向东寻求安慰时又与东方格格不入，看不起东方，忍不住要显示强权；而在向西方靠拢时，又与西方对立，难以真正融合。这种摇摆不定的外交取向，既取决于保障国家安全的考量，也为地缘政治利益争夺所决定，更受文化价值观所影响。

由于利益重心在欧洲部分和对欧洲的文化认同，俄罗斯外交政策偏重于西向，与西方国家分分合合，忽近忽远的争斗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可是，面对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的西方，俄罗斯自惭形秽，竭力要融入西方，以赶上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但越是向西方靠近，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反应就越强烈，也越与西方对立。这种对立除了利益的纠葛和争斗，从中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化倡导的共同性原则、集体主义精神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格格不入，不难发现俄罗斯民族文化优越感、道德优越感的顽强显现，更容易找到俄罗斯文化精神熏陶下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西方资本主义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反感和鄙视。

再次，俄罗斯对外政策超出常规的多变善变和极具冒险性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浸润下的民族性格不无联系。

世界上各国的外交政策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不足为奇。但俄罗斯外交政策超出常规的多变、善变，则是颇为突出的。从保罗一世联英反法到联法反英的外交急转弯，到斯大林联合英法反德不成迅速转向备受争议的联盗防贼，俄罗斯外交史中这一次次超出常人想象范围的外交政策突变，让世界难以理解，而像中俄石油管道问题上的一波三折，则令当事国对俄罗斯政策反反复复更有切身体会。更有甚者，俄罗斯外交实践中不时出现的冒险举动，常常让世人目瞪口呆。从斯大林伙同希特勒肢解波兰的以侵略防侵略的果断行为，到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古巴让“美国人尝一尝被导弹瞄准的滋味”的冒险举措，再到叶利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派兵抢占普里什蒂纳机场的大胆举动，俄罗斯外交史中这一次次类似的举动都极具冒险性，大大出人意料，引起世界的震动。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多变善变和外交实践违反常规的冒险性，不仅是国家利益和实际的地缘政治条件的产物，而且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熏陶下俄罗斯人的观念和民族性格有关。俄罗斯文化的宗教精神和缺乏中庸精神的极端性，不仅培养了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使命意识和救世精神，也滋养了俄罗斯民族好走极端的非理性热情，更强化了俄罗斯人思想和行为时常发生的矛盾性。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在大国地位的诉求和现实利益算计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导致对外政策的多变善变，一旦在国际上受到歧视和侮辱，想方设法都要伺机报复回来，外交行动时常带有冒险性也就不足为

---

①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

奇了。

第四，俄罗斯文化精神促进俄罗斯外交艺术的成熟和外交资源的积累。

俄罗斯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品格孕育出俄罗斯文化全世界回应能力的文化精神。这种善于学习别人长处为我所用的文化精神直接滋养了俄罗斯外交艺术的成熟和外交资源的积累。

首先，俄罗斯文化的全世界回应能力表现在善于学习总结别人的外交经验、手段、策略和技巧，为自己所用。

与欧洲大国强国相比，俄罗斯是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但它始终让人不敢小觑，并几度成为欧洲霸主，国际事务的主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出色的外交。俄罗斯人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分化列强，在互相制衡来突显自己的作用，获取利益。特别是在东方，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更显示娴熟的外交技巧和经验积淀，“充分地发挥了外交上的技巧，或趁火打劫，或巧取豪夺，或挟恩索报，甚至使西欧强国的武功在俄国外交成就面前黯然失色”。<sup>①</sup>而这一切得益于俄罗斯善于从他人那里学习总结外交经验、手段和策略。

俄罗斯算不上历史悠久，但它国土辽阔，周边国家众多，又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与东西方有着长期而密切的交往，非常熟悉东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方式，特别是对西方各国的战略目标、外交制度、决策程序和策略方式十分清楚，从中吸取了许多有利于己的因素，因而比许多千年古国更早地形成了大国意识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

俄罗斯人从罗斯时代与拜占庭帝国打交道起，就受到拜占庭帝国分而治之政策下分化瓦解、金钱收买、宗教同化和秘密外交等外交风格的熏陶，面对蒙古鞑靼的残暴统治，罗斯人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学会了在险恶条件下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权谋和才干。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已成气候。从那时起，随着沙俄帝国争雄于国际舞台，俄罗斯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日趋成熟。从外交机构的设置到对外战略的策划，从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到外交策略技巧的运用，都紧跟世界潮流，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其次，一批批杰出的外交人才的涌现也是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俄罗斯文化精神滋养俄罗斯外交艺术走向成熟的表现。

外交作为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途径，能否成功，除了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正确的外交决策之外，还仰仗外交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他们的职业水准直接体现国家的外交水平的高低和外交资源经验积淀的厚薄。

---

<sup>①</sup>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第46页。

善于向他人学习，总结他人的经验为己所用的俄罗斯文化精神造就了俄罗斯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促进俄罗斯资源的不断丰富和经验的积淀，更滋养了以杰出外交家戈尔恰科夫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职业外交人才。他们是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发展者，又是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俄罗斯文化精神的体现者，在国际舞台上翻云覆雨，各显神通，甚至千古留名。难怪恩格斯要感叹俄罗斯外交界的作用超过俄罗斯军队，认为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sup>①</sup>

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历史上敢于任用外裔外交精英担任外交要员也是俄罗斯文化具有全世界回应能力的开放品格的典型表现。彼得一世面向欧洲的西化改革，不仅让西方文明风靡俄罗斯，还从西方引进大量人才，包括外交精英。到 19 世纪，外国血统的外交精英被俄罗斯沙皇们毫无顾忌地任命为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卡波吉斯特利、杰尔斯等长期把持外交部门。敢于屡见不鲜地大胆任用外裔外交精英掌管与国家利益和安全休戚相关的外交部门，这在其他国家中颇为罕见，也吸引国外职业外交家来俄罗斯发展，用自己的才干为俄罗斯外交效力。所以恩格斯要认为一伙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操纵了俄国外交，为虎作伥。<sup>②</sup>

综上所述，对外交往促进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而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的发展又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化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为俄罗斯外交提供可资凭借的精神因素。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刻影响俄罗斯的外交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制约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俄罗斯外交艺术的成熟和外交资源的积累。这既成就了俄罗斯外交的辉煌，也给俄罗斯外交的发展带来了种种制约。

---

**【 Abstract 】** The basic spirit of Russian culture includes sobornost, God-consciousness, proclivity for extremes, tolerance and responsiveness. They have become Russians' basic beliefs and value, not only affecting the country's diplomatic behaviors, but also supporting the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 Key Words 】** Russia, culture, spirit, diplomacy, influence

**【 Аннотация 】** Дух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основном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такие понятия, как соборность, сознания Бога, впадение в крайности, выносливость и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15 页。

② 同上注，第 23~24 页。

оперативность. Это всё уже стало основными убеждениями и жизненными принципам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не только оказало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о также стало своеобразной поддерж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снов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ны, и в ещё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стало формиру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постро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культура, дух,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лияние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 东—西方与古代俄罗斯外交

# 基辅罗斯外交浅析

国春雷\*

**【内容提要】**基辅罗斯(882-1240)外交受空间因素和东正教影响,形成被动性、扩张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决定着基辅罗斯的外交宗旨。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基辅罗斯外交旨在维护和平;反之,其外交宗旨或委曲求全,或以战争转化国内危机。基辅罗斯在各个方向的外交概况为:东方威胁、威胁南方、西方较量、善待北方。

**【关键词】**基辅罗斯 外交 拜占庭

**【中图分类号】**D80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84-(14)

基辅罗斯外交是俄国古代史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俄罗斯学者从19世纪便已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但仅限于分析基辅罗斯的单边外交,且多以论文形式出现。<sup>①</sup>苏联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基辅罗斯外交,其中B.T.帕舒托的专著水准较高。<sup>②</sup>据笔者观察,国内学界除林军先生在《俄罗斯外交史稿》第一章第二节中谈及基辅罗斯外交<sup>③</sup>,尚无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尝试对基辅罗斯外交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探悉其影响因素、总结出基辅罗斯外交的特征及其在各个方向的概况。

\* 国春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① В.Г.Васильевский,Варяго-русская и варяго-английская дружина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е XI и XII веков.//Труды.т.I,СПб:1908,с.176-378.; Ф.И.Успенский,История Визант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ериод Македо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867-1057),М:Мысль,1997,Глава.XIV.XXII.

② В.Т.Пашуто,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М:Наука,1968.

③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5-18页。

## 一、廓清两个基本概念

### 1、基辅罗斯的起始年代

国内学者在描述基辅罗斯起源时，常常从东斯拉夫人、古罗斯讲起，这便很容易使人混淆古罗斯、罗斯贵族于 862 年建立的基辅罗斯与奥列格王公于 882 年所建基辅罗斯这三个概念。<sup>①</sup>

其实，古罗斯、862—882 年间的基辅罗斯、882 年之后的基辅罗斯都是后世学者在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其时代划分在国际学界尚无统一标准。笔者认为，古罗斯存在的时间显然要比基辅罗斯长久，“罗斯”一词早于 839 年便已见于史书。<sup>②</sup>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于 882 年南下，吞并罗斯贵族阿斯科里特、季尔在 862 年创建的基辅罗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基辅罗斯。<sup>③</sup>需要说明，这两个基辅罗斯有本质上的不同。862—882 年间的基辅罗斯由罗斯贵族建立并治理，而从 882 年开始并延续了 3 个半世纪的基辅罗斯则始终由留里克王族统治。奥列格王公占领基辅后，立即宣布这座城市为首都，并将辖下领地居民统一命名为“罗斯人”<sup>④</sup>，这些都是一个崭新国家诞生的标志。所以，基辅罗斯的上限应该划在 882 年。

至于基辅罗斯的下限，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划在基辅大公姆斯季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去世的 1132 年。<sup>⑤</sup>笔者则认为，基辅罗斯虽然从 1132 年开始全面陷入封建割据时期，但所有罗斯公国在蒙古入侵之前都坚守着统一的基辅罗斯国家观念。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 3 方面：

政治层面，基辅大公即使不被认为是诸罗斯王公的现实首领，也享有罗斯地区最高统治者的荣誉地位<sup>⑥</sup>，这也是所有要称霸罗斯地区的王公总是觊觎基辅公位的根本原因。基辅罗斯统治阶层广泛认可同一个权力中心，是国家政治统一的重要标志。

意识形态方面，罗斯都主教在蒙古入侵前始终没有离开过基辅，与罗斯各地教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sup>⑦</sup>东正教会竭力维护基辅罗斯的统一与完整，在 1160 年拒不

---

① 朱寰、马克垚：《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186—188 页；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4—15 页。

② Бертинские анналы, См. Г. Г. Литаврин, Византия, Болгария,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IX—начало XII в.),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0, с. 37-38.

③ 王铎：《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年，第 45、52—53 页。

④ 王铎：《往年纪事译注》，第 53 页。

⑤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ретье издание, том. 12, М.: изд.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3, с. 218.

⑥ 于沛：《斯拉夫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9 页。

⑦ 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99 页。

支持苏兹达利—罗斯托夫王公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增设罗斯都主教区的请求<sup>①</sup>，而罗斯都主教自君士坦丁二世（1167—1169 年在任）以来开始使用“基辅及全罗斯都主教”的称号。罗斯民众坚守同一宗教信仰，为保证共同的国民身份奠定了思想基础。

疆域方面，基辅罗斯分裂后的各公国主权仍牢牢控制在地方王公手中，全罗斯疆域也未曾被外族侵占。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基辅罗斯可能会继续分裂，但也不排除再次整合的可能。<sup>②</sup>罗斯人拥有领土主权，是基辅罗斯依然存在的重要依据。

结合上述分析，蒙古入侵中断了基辅罗斯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各罗斯公国主权丧失，罗斯疆域不断为外族侵占，基辅大公的最高政治地位让位于金帐汗国大汗，唯一体现着基辅罗斯完整性的东正教会也被迫向大汗俯首称臣。因此，基辅罗斯的下限应该划在基辅被蒙古人攻陷的 1240 年。

## 2、中世纪的外交

所谓外交，即“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sup>③</sup>可见，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实施者是外交机关及其代表，显著特征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以今日之外交定义比照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对外关系，显然不能等同视之。

首先，“近代以前的欧洲，民族国家尚处于形成的过程，国家的概念十分淡漠，诸如日尔曼、斯拉夫等不同民族的群体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既无固定明确的疆界，也无稳定的都城。”<sup>④</sup>9—12 世纪的基辅罗斯正处于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并不具备当今世界外交主体的标准。

其次，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外交机关还没有形成，也没有固定的外交官员。“基辅罗斯对外交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是大公。大公与少数近臣或亲宠商定对外决策。”<sup>⑤</sup>基辅大公有时派遣使者出使别国，有时则亲自出马。所以，基辅罗斯并不具有今日外交意义上的外交机关及外交官。

最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外交活动多是军事对抗的补充手段，主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欧洲中世纪的外交“同虚伪、欺骗、阴谋、诡计等联系在一起，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sup>⑥</sup>基辅罗斯外交的主要宗旨是为缓和外敌入侵或与他国建立军事同盟，其实是一种与战争相关的对外交往活动，并非总是和平性质的。

---

① 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 том первый, М: изд.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7,c.351-352.

② 穆立立：《欧洲民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3 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第 366 页。

④ 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91 页。

⑤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第 17 页。

⑥ 杨公素：《外交理论与实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6 页。

## 二、影响基辅罗斯外交的因素

### 1、空间因素对基辅罗斯外交的影响

基辅罗斯的疆域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大体上相当于今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位于欧亚两洲交界地带。广袤的东欧平原地势平坦，与中亚草原连接在一起，以至于“游牧的亚洲人，自古以来把自己的篷车和畜群充斥于现在的南俄罗斯的时候，似乎很少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欧洲。”<sup>①</sup>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空间因素对基辅罗斯政治文化影响甚深：“一方面，广阔的平原使其缺乏防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从而总是觉得缺少安全感；另一方面，没有地理上的障碍又使其对外扩张能够不受限制，从而膨胀了其扩张的欲望。”<sup>②</sup>

上述空间因素对基辅罗斯的影响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便“不是邻人经常去冲击它，就是它紧密团结起来向四面扩张。”<sup>③</sup>相应地，基辅罗斯外交也便具有了以下 3 个特征：

——被动性。基辅罗斯常年遭到周边国家的威胁，基辅大公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只能被动地与这些国家进行各种性质的外交活动。当基辅罗斯实力较弱时，其统治阶层只能被迫接受周边国家的各种要求。

——扩张性。持续受到四邻冲击，缺乏安全感的罗斯人必然会爆发出强烈的应激反应。表现在军事领域，便是基辅罗斯不断向外开疆辟土，其外交活动也常常成为基辅大公军事扩张的辅助手段。

——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辅罗斯邻国众多，基辅大公进行单边或多边外交之前总要深思熟虑，认真分析该外交活动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基辅罗斯地域辽阔，基辅大公不能时刻监督各公国的外交活动，特别是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后，诸罗斯公国自行与外国交往的情况相当普遍。

### 2、东正教与基辅罗斯外交

著名拜占庭学者Д.Д.奥博连斯基指出，拜占庭帝国凭借雄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同一信仰、文化相近的国家间创建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拜占庭国家共同体”（Византий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此体系中各国、各民族皆

---

①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0页。

② 刘雪莲：《地缘政治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③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象征性地由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sup>①</sup>988—989年的“罗斯受洗”标志着基辅罗斯正式加入“拜占庭国家共同体”，东正教为罗斯王公划出了明确的外交阵线，使罗斯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与东方的游牧民族和伊斯兰国家大不相同，而且有别于西方和北方的天主教国家。尽管苏联学者宣称，基辅罗斯在基督教1054年大分裂后仍然与西方天主教国家保持往来，<sup>②</sup>以此证明拜占庭对基辅罗斯的宗教外交政策影响有限，并大力赞扬罗斯王公外交的“聪颖与灵活”。但实际上，东正教深刻地影响了基辅罗斯的外交，它将罗斯人的意识形态牢牢限制在欧亚交界地带，强化了基辅罗斯基于空间因素形成的三大外交特征。

首先，罗斯人固守东正教徒身份，这便在思想上无法融入周边任何一股宗教—政治势力，也给东西方国家攻击、兼并罗斯地区以口实。基辅罗斯外交常因宗教因素而陷于被动。例如，罗斯都主教约翰二世于1089年坚决反对教皇克利门特三世关于教会合并的提议，并被迫以开除教籍的极端方式来阻止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王公女儿与德国皇帝亨利四世联姻<sup>③</sup>；13世纪初，罗马教廷趁基辅罗斯内乱加剧，对其实施贸易封锁，筹划瑞典十字军入侵罗斯，并给圣剑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以经常性的帮助。<sup>④</sup>

其次，基辅罗斯的扩张与东正教的推广相得益彰，强娶拜占庭公主的弗拉基米尔王公及其子孙“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sup>⑤</sup>需要指出，基辅罗斯时期的宗教扩张行动并不十分强烈，主要发生在国内边远地区和非斯拉夫部族中，但罗斯人的宗教活动为日后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的猛烈扩张奠定了所谓“第三罗马”的宗教基础。汤因比曾生动地描述过东正教的传播动向：“它的摇篮或故乡是在拜占庭安那托利亚，几百年来局促于伊斯兰教社会的敌对势力的扩张之下，终于在北方和东方的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土地上得到了广阔的扩张，不但绕过了伊斯兰教世界而且还直抵远东”。<sup>⑥</sup>

最后，东正教加剧了基辅罗斯外交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封建割据时期。罗斯教会在封建割据时期分裂成许多小教会，隶属各罗斯公国，地方主教受到地方王公和

---

① Г.Г.Литаврин,Византия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СПб: Алетейя,1999,с.46.

② [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③ М.В.Левченко,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М: изд.АН.СССР,1956,с.421—422.

④ В.Т.Пашуто,О политике папской курии на Руси (XIII век).//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49,№.5,с.56.

⑤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5页。

⑥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罗斯都主教的双重管辖。<sup>①</sup>这种政教关系使得基辅罗斯与其他国家间的外交愈发复杂。<sup>②</sup>例如，罗马教廷和拜占庭帝国在 12 世纪 60 年代都企图将匈牙利列为自己的附庸<sup>③</sup>，基辅罗斯诸公国纷纷介入这场国际纷争，在东正教、天主教势力间游走谋利<sup>④</sup>；12、13 世纪之交，有些罗斯公国常受罗斯都主教之请清剿骚扰拜占庭边界的保加利亚人和波洛伏齐人<sup>⑤</sup>，而有些罗斯公国却支持保加利亚人反对拜占庭的压迫。<sup>⑥</sup>

### 3、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决定基辅罗斯外交的宗旨

基辅罗斯在自身经济、政治结构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外交宗旨。通常，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时，基辅罗斯的外交旨在维护和平；反之，基辅罗斯的外交宗旨或委曲求全，或以战争转化国内危机。

从奥列格到弗拉基米尔，基辅罗斯经历了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反复变化。其时，基辅罗斯是以基辅公国为政治中心的松散联合体。普通民众与统治阶级的经济来源是不同的：广大人民生活在数量众多的农村公社，以经营农业为生<sup>⑦</sup>；基辅王公则带领卫队定期巡行各罗斯公国收取贡赋，但他们更习惯于征战掳掠和对外贸易。<sup>⑧</sup>这一时期，基辅罗斯统治阶层摇摆于两种发展道路之间。一种是热衷于劫掠远征的军事—奴隶制（Военно-рабовладельчество），另一种是注重发展本国经济的封建—农奴制（Феодално-крепостничество）。<sup>⑨</sup>奥列格、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前期走的是第一条道路。当时，基辅罗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不稳，故其外交旨在挑起战争，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例如，罗斯人曾在 907、941、944、970—971 和 988—989 年连续进攻富庶的拜占庭帝国，掠夺巨额财富之余还通过签订条约为罗斯商人牟取贸易特权，甚至逼迫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将妹妹许配给弗拉基米尔王公。奥莉佳、斯维亚托波尔克和弗拉基米尔后期选择的是另一条发展道路。其时，

①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86 页。

② [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册，王先睿、冯加方、李文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37 页。

③ [匈]温盖尔·马加什、萨博尔奇·奥托：《匈牙利史》，阙思静、龚坤余、李鸿臣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5 页。

④ Иоанн Киннам, Крат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Иоанна и Мануила Комнинов(1118-1180), перевод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ессора В.Н.Карпова, СПб:1859, Книга 5.10.257.12.260.261.262.

⑤ Никита Хониат, История со времен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Иоанна Комнина, пе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 Н.В.Чельцова, СПб:1862, Книга 3.5.245.246.

⑥ А.П.Каждан,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Болгарии из-под византийского иг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73, №.11, с.128.; М.Н.Тихомиро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болгар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ру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48, №.6, с.94.

⑦ [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山东大学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 年，第 92 页。

⑧ 罗爱林：《俄国封建晚期农村公社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8 页。

⑨ М.В.Левченко,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236-237.

基辅罗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比较稳定，因此其外交宗旨转化为寻求和平。奥莉佳在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外交角逐中取得良好成果，更重要的是，她突破了罗斯人必须用刀剑与拜占庭谈判的外交惯例<sup>①</sup>；斯维亚托波尔克执政期间，与东方佩彻涅格人、南方拜占庭帝国、西方罗马教廷都建立了友好联系<sup>②</sup>；弗拉基米尔王公临终下令，让罗斯军队在 1016 年协助拜占庭帝国镇压两国边境爆发的武装骚乱。<sup>③</sup>

沿着封建—农奴制道路前行，基辅罗斯封建制度从雅罗斯拉夫时代开始稳定而快速地发展起来。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罗斯诸王公、贵族、教会占有土地、经营田庄成为普遍现象。<sup>④</sup>雅罗斯拉夫还仿效弗拉基米尔，派遣子嗣管理罗斯各地。在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他积极与欧洲各国展开和平友好的王室联姻，为基辅罗斯博得了广泛声誉。<sup>⑤</sup>但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加速了基辅罗斯的阶层分化与分裂割据。11—12 世纪，农村公社自由农民日益丧失自由，沦为各类封建依附者，农民起义此伏彼起。<sup>⑥</sup>同时，由对外征战转向经营领地经济的罗斯王公们希望取得对领地的永久占有权，不断挑战基辅大公的权威地位。1097 年，罗斯诸王公举行柳别奇会盟，以家庭世袭领地分配原则取代了传统的长子继承制。<sup>⑦</sup>1132 年后，基辅罗斯更是全面陷入封建割据。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渐趋不稳的情形下，基辅罗斯实力大大萎缩，其外交宗旨仅求自保。例如，波洛伏齐人于 1055 年首次侵入罗斯南部，弗谢沃洛德王公只能与之缔结和约。<sup>⑧</sup>有时，罗斯王公们也会为摆脱危机发动反攻。例如，北诺夫哥罗德王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于 1185 年率罗斯联军远征波洛伏齐人。<sup>⑨</sup>更有甚者，部分地方王公为一己私利还勾结外国入侵祖国。例如，基辅大公伊贾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于 1073 年被自己的两个弟弟驱逐，就先后求助于波兰、德国和罗马教皇，并在波兰军队庇护下于 1077 年夺回基辅公位<sup>⑩</sup>；切尔尼戈夫王公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也曾在 11 世纪末三次勾结波洛伏齐人入侵罗斯本土。<sup>11</sup>

① А.Н.Сахаров,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нягини Ольг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81, № 6, с.51.

② Летописный сборник, именуемый Паряишей или Никоновской летописью.//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 том IX, 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0, с.39.

③ Ioannis Scylitzae Synopsis historiarum, ed.J.Thurn.Berlin.New York.1973.P.354. 88-94.См.Г.Г.Литаврин, Византия, Болгария,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IX-начало XII в.), с.215-216.

④ 尹曲、王松亭：《基辅罗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1、34 页。

⑤ 尹曲、王松亭：《基辅罗斯》，第 30 页。

⑥ 王钺：《罗斯法典译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33 页。

⑦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 412—413 页。

⑧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 280 页。

⑨ 孙成木：《俄罗斯文化一千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6 页。

⑩ М.В.Левченко,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405.

11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 357—358 页。

### 三、基辅罗斯在各个方向的外交概况

#### 1、东方威胁

罗斯商人自古便从拉多加城沿伏尔加河前往里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贩卖毛皮和奴隶，这条商路被称为“从瓦里亚基人到波斯人之路”。<sup>①</sup>可是，游牧部落布加尔人、马扎尔人、佩彻涅格人、托尔克人、波洛伏齐人走马灯一般自东方涌入，沿途骚扰该商路直至威胁基辅罗斯国土安全。

为保障商路安全和拓展疆域，基辅罗斯于 10 世纪 60 年代对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伏尔加河下游至第聂伯河之间的哈扎尔汗国予以致命打击。<sup>②</sup>哈扎尔汗国是农耕、牧业、贸易三合一的强国<sup>③</sup>，300 年间有力地拦截东方游牧部落西侵和阿拉伯人北上，为基辅罗斯创造了安全的成长环境。<sup>④</sup>罗斯人夺取东方商路的代价是沉重的，其东部门户从此完全向游牧部落敞开，托尔克人在 11 世纪上半期轻易冲入南俄草原便是哈扎尔汗国崩溃的直接后果。<sup>⑤</sup>

继佩彻涅格人、托尔克人之后，彪悍的波洛伏齐人于 1068 年打败罗斯大军，150 年间成为悬在罗斯人头上挥之不去的巨大威胁。<sup>⑥</sup>一股接一股扑来的游牧部落，除劫掠基辅罗斯外，有时也和罗斯人结成战略同盟。例如，斯维亚托斯拉夫就曾联合佩彻涅格人于 970 年攻打拜占庭。<sup>⑦</sup>但是，游牧部落经常在外交方面背信弃义，斯维亚托斯拉夫就是被盟友佩彻涅格人截杀于归途中的。<sup>⑧</sup>另外，东方游牧部落还对基辅罗斯的外事活动造成干扰。例如，基辅王公之子维亚切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于 1116 年率大军抵达多瑙河畔，意欲夺取当地的拜占庭城市，却因佩彻涅格人、托尔克人

---

① [苏]В.П.波将金等：《外交史》第一卷，吴纪先、郭吴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第 150 页。此外，罗斯人还开通了从布拉格到基辅、越过顿河至伏尔加河流域、再到外高加索和亚洲的陆上商路。

② 尹曲、王松亭：《基辅罗斯》，第 17 页。

③ С.А.Плетнева, Очерки хазар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М: Гешарим, 1999, с. 11.

④ М.И.Артамонов, История Хазар,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1962, с. 37.; А.П.Новосельцев, Хаза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роль в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азии, См. Славяне и их соседи. Славяне и кочевой мир, выпуск 10, отв. ред. Г.Г.Литаврин, М: Наука, 2001, с. 60.

⑤ С.А.Плетнева, Хазары, М: Наука, 1976, с. 70.; [美]艾伦·F·丘：《俄国历史地图解说——一千一百年来俄国疆界的变动》，郭圣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4 页。

⑥ С.А.Плетнева, Половцы, М: Наука, 1990, с. 42.

⑦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27 页。

⑧ Иоанн Скилица, Обзор истории, О войне с Русью императоров Никифора Фоки и Иоанна Цимисхия. // Лев Диакон, История, пер. М.М.Копыленко,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М.Я.Сюзюмов, С.А.Иванов, Москва: 1988, с. 133.; отв. ред. З.В.Удальцова, Культура Визант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VII-XII 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с. 268.

和波洛伏齐人在基辅罗斯边境爆发激战而被迫撤军。<sup>①</sup>总之，东方游牧部落始终对罗斯人构成巨大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240 年，基辅罗斯被来自东方的最大威胁——鞑靼蒙古人摧毁。

## 2、威胁南方

罗斯商人在 9、10 世纪之交开辟了著名的“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商路从波罗的海南岸经涅瓦河到拉多加湖，再经沃尔霍夫河、伊尔门湖、洛瓦特河、西德维纳河到第聂伯河，顺第聂伯河辗转出黑海，最后沿黑海西岸直抵君士坦丁堡。<sup>②</sup>富饶的拜占庭帝国不仅吸引着远方的罗斯商人，也引来了穷兵黩武的罗斯王公们。马克思指出，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把都城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再迁至多瑙河畔的佩列雅斯拉维茨，如果不是拜占庭在 970—971 年顶住了基辅罗斯的进攻，罗斯人还会继续南下。<sup>③</sup>其实，基辅罗斯始终觊觎富庶文明的南方国家，罗斯人在 971 年后并未停止南侵的步伐。

基辅罗斯南侵的军事行动主要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北岸展开。罗斯人对巴尔干半岛最猛烈的进攻发生在 970—971 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识破拜占庭外交骗局后领军侵占巴尔干半岛中北部，祸及保加利亚王国。<sup>④</sup>罗斯人最深入拜占庭领海的军事行动发生在 11 世纪初，弗拉基米尔王公亲信赫里索希尔带领 800 名罗斯战士打败拜占庭海军，穿越马尔马拉海进入爱琴海，由于孤军深入被全数歼灭。<sup>⑤</sup>1043 年，雅罗斯拉夫王公命令罗斯海军攻打君士坦丁堡，因部队号令不一惨遭失败。<sup>⑥</sup>此后基辅罗斯进入封建割据时代，基辅大公很难再集中全罗斯之力南下。基辅罗斯在 1116 年对多瑙河畔发动的毫无成果的远征，大概是罗斯人最后一次谋求巴尔干地域。

如果说基辅罗斯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没有取得太大战绩，那么在邻近的黑海北岸则成就斐然。弗拉基米尔王公在 988—989 年趁拜占庭内乱占领了克里木半岛上的重要城市赫尔松。罗斯人自此大量进驻该半岛，动摇了拜占庭在黑海北岸的牢固统治地位。11—12 世纪期间，拜占庭在克里木半岛的威信不断降低，可能已丧失了对东克里木的控制。<sup>⑦</sup>1066 年，拜占庭皇帝密令赫尔松将军毒死克里木半岛以东的特穆塔拉坎罗斯王公罗斯季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就是担心这位塔曼半岛上的罗斯

---

①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 361 页。

② [苏]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一卷，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北京：三联书店，1977 年，第 38 页。

③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 66 页。

④ [南]伊万·博日奇、西马·契尔科维奇、米洛拉德·埃克梅契奇等：《南斯拉夫史》，赵乃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46 页。

⑤ Г.Г.Литаврин,Византия,Болгария,Древняя Русь (IX-начало XIIв.),с.224.

⑥ Михаил Пселл,Хронография,пер.и прим.Я.Н.Любарский,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8,с.96-97.

⑦ А.Л.Якобсон,Крым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М:Наука,1973,с.78-79.

王公对东克里木施加影响。<sup>①</sup>11—12 世纪之交，刻赤海峡、塔曼半岛又成为拜占庭与基辅罗斯的角力之所。<sup>②</sup>

纵观基辅罗斯的南方外交，罗斯王公始终把掠夺财宝和土地作为第一要务。基辅罗斯的南侵因国内陷入封建割据而有所减弱，但贪婪残暴的罗斯人一直是巴尔干半岛诸族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 3、西方较量

基辅罗斯的西邻由南到北依次是匈牙利、捷克、波兰、普鲁士人、立陶宛人等波罗的海南岸民族，再往西是德意志王国、教皇国等西方天主教国家。与基辅罗斯西部接壤的国家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争夺地带，几乎都经历过从东正教国家向天主教国家的转变。而且，基辅罗斯的西邻与其东部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不同，都是疆域相对稳定的农耕国家。所以，基辅罗斯与这些国家的领土纠纷显得十分复杂。

刚刚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基辅罗斯，迫不及待地要融入先进的基督教世界，积极向西方基督教国家靠拢。奥莉佳在君士坦丁堡受洗后，于 959 年遣使请求德意志国王帮忙创建基辅教会组织。<sup>③</sup>“罗斯受洗”后，基辅罗斯更是频频以王室联姻的外交手段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sup>④</sup>捷克是西斯拉夫国家，前身大摩拉维亚国具有浓厚的东正教传统，基辅罗斯在 10 世纪下半期与其交好，保持着活跃的贸易往来。<sup>⑤</sup>尽管匈牙利王国在 1054 年基督教大分裂中转向天主教，基辅罗斯当时依然与其维持着友好联系，还进行了王室联姻。<sup>⑥</sup>波兰为免于德意志王国的入侵，在 966 年从捷克王国接受了基督教，基辅罗斯也与其保持着睦邻关系。但是，波兰国王在 1018 年出兵干涉基辅内政导致两国一度交恶。<sup>⑦</sup>面对德意志封建主的步步进逼，基辅罗斯与波兰在 11 世纪后半期再次走到一起。<sup>⑧</sup>对于西北方尚未接受基督教的普鲁士人、立陶宛人等波罗的海民族，基辅罗斯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封建殖民政策，常常远征该地区并收取贡赋。<sup>⑨</sup>

---

①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 287 页。

② Г.Г.Литаврин,Византия,Болгария,Древняя Русь (IX-начало XIIв.),с.289.; В.Н.Татищ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т.2,М.-Л,1963,с.138-139.; В.В.Мавродин,Тмутаракан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80,№.11, с.182.

③ Адальберт,Продолжение Хроники Регино из Прюма//Немецкие латиноязыч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IX-XI веков,А.В.Назаренко,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с.107-108.

④ В.Т.Пашуто,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с.419—422.

⑤ [捷]瓦·胡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陈广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29 页。

⑥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第 332 页。

⑦ [波]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马里安·瑞霍夫斯基：《波兰简史：从建国至现在》，史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13—14 页。

⑧ 刘祖熙：《波兰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7 页。

⑨ В.Т.Пашут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Лит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зд-во АН СССР,1959,с.11-12.

随着封建割据的加剧、东正教与天主教分歧的加大，欧洲时局风云变幻，衰落的基辅罗斯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展开纵横捭阖的外交战。在这一时期，德意志王国加紧入侵东方，罗马教皇支持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拓殖。基辅罗斯及其西邻尚未意识到德意志威胁，反而趁乱互相攻伐，拓展领土。基辅罗斯内乱日甚，西部罗斯公国间缺乏战略配合。以上便是中东欧局势在 11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日趋复杂的主要原因。基辅罗斯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与西方国家进行较量。

12 世纪 50、60 年代，基辅罗斯为保障西南边境安全，参与了拜占庭与匈牙利的争霸战争。在基辅公国和加利奇公国的大力支持下，拜占庭取得了 1251、1265 年拜匈大战的胜利。<sup>①</sup>从 11 世纪中叶到 12 世纪末，捷克国内割据势力纷争连连，波兰伺机入侵。捷克被迫向德意志王国求助，不料成为后者的附庸。<sup>②</sup>控制捷克后，德意志封建主进一步威逼波兰，东侵的脚步离基辅罗斯越来越近。然而，波兰却在入侵北方普鲁士地区失败后，向条顿骑士团求助。得到教皇和德意志王国支持的骑士团于 1230 年开始征服普鲁士人，并逐渐将当地日尔曼化。<sup>③</sup>波兰此举不仅使自身在西方、北方陷入德意志的包围，也使基辅罗斯、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受到巨大威胁。<sup>④</sup>在骑士团冲击下诞生的立陶宛公国没有立即认清局势，一面反击西方入侵者，于 1201—1214 年间数次袭击骑士团据点<sup>⑤</sup>；另一面却从 12 世纪 80 年代起持续进攻东南方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地区，于 13 世纪 30—50 年代占据白俄北部一带。<sup>⑥</sup>在基辅罗斯力量薄弱的西北地区，罗马教皇也积极参与进来，贪婪地从德意志封建主东扩成果中分得一杯羹。<sup>⑦</sup>他还在 1237 年将条顿骑士团与圣剑骑士团合并，从而大大加强了攻击立陶宛和基辅罗斯的力量。<sup>⑧</sup>此外，骑士团千方百计离间立陶宛和基辅罗斯，缺乏战略配合的诸罗斯公国对立陶宛的现实威胁只能妥协，分别在 1207、1212、1228 和 1229 年与德意志建立反立陶宛同盟。<sup>⑨</sup>

#### 4、善待北方

---

① М.В.Бибиков,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историк Иоанн Киннам о Руси и народ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Москва:Ладомир,1998,с.62.;Иоанн Киннам,Крат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Иоанна и Мануила Комнинов(1118-1180), Книга.5.15.268.

② [捷]瓦·胡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第 31—32 页。

③ [波]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马里安·瑞霍夫斯基：《波兰简史：从建国至现在》，第 24—26 页。

④ 刘祖熙：《波兰通史简编》，第 34 页。

⑤ В.Т.Пашут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Лит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369.

⑥ В.Т.Пашут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Лит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367.; Л.В.Алексеев,Полоцкая земля.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еверной Белоруссии.в IX-XIII вв,М:Наука,1966,с.288.

⑦ 丁建宏：《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37 页。

⑧ [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第 172—177 页。

⑨ В.Т.Пашут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Лит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372—373.

与基辅罗斯发生外交关系的北方国家主要有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整体上，罗斯人对待这些国家是友善的。究其原因，首先要分析基辅罗斯与北方国家的渊源。

关于基辅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多数学者都承认北欧国家与基辅罗斯存在血缘关系。<sup>①</sup>800—1050年是北欧历史上的“海盗时代”，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上的日尔曼人大举南下的历史阶段。其中瑞典人主要构成“维京人”（时人对北欧海盗的统称）的东支，自今斯德哥尔摩地区驶向波罗的海东南沿岸，沿第聂伯河向黑海、里海挺进，从事贸易和掠夺。<sup>②</sup>东欧平原上的东斯拉夫人称这些“维京人”为“瓦良格人”（又称罗斯人），意即“商人”或“来自北方国家的各种语言的雇佣军”。<sup>③</sup>据《往年纪事》记载，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者正是这些瓦良格人（罗斯人）。<sup>④</sup>基辅罗斯的少量北欧统治者很快被斯拉夫化，而留里克王朝在1240年前不断与北欧国家联姻，大概就是为了保证基辅罗斯王族的北欧血统。<sup>⑤</sup>

至于维京人缘何南侵，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致答案。<sup>⑥</sup>但瓦良格人在基辅罗斯的所作所为却有明确记载，即从事过境贸易、做基辅罗斯的雇佣军。瓦良格人做基辅罗斯雇佣军主要执行两种职能：对外实施抢劫贸易，对内参与诸王公争夺基辅公位的斗争。大概是在北欧海盗的影响下，基辅罗斯王公率领东斯拉夫军队和瓦良格雇佣军频繁进行劫掠远征。据Г.С.列别杰夫分析，基辅王公以允许瓦良格人在海外和沿伏尔加河行动的自由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效忠。<sup>⑦</sup>显然，享有三分之一战利品的惯例，也是促使瓦良格人积极参与基辅罗斯对外战争的重要推动力。<sup>⑧</sup>奥列格、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皆从罗斯北方城市诺夫哥罗德出发夺得基辅王位，在每次内战中都少不了瓦良格人的身影。<sup>⑨</sup>故而，历任基辅王公都十分重视诺夫哥罗德，而诺夫哥罗德与北欧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瓦良格雇佣军是何时退出历史舞台的至今尚无定论，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是在11世纪中期。<sup>⑩</sup>

瓦良格人的过境贸易主要集中在3个地区，即波罗的海沿岸、拜占庭和哈扎尔汗国。繁荣的“瓦—希商路”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亲自

---

① 曹维安：《俄国史学界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第115—128页。

② 孙晓华、玉彪：《北欧各国》，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③ В.Т.Пашу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21.

④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44—45页。

⑤ Г.С.Лебедев, Эпоха викингов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е,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5, с.261-262.

⑥ 敬东：《北欧五国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页。

⑦ Г.С.Лебедев, Эпоха викингов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е, с.256.

⑧ В.Т.Пашу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25.

⑨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52、144、147、248页。

⑩ 穆立立：《欧洲民族概论》，第69页；Г.С.Лебедев, Эпоха викингов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е, с.258.



记述了瓦良格人如何利用这条“大水路”运输货物。<sup>①</sup>阿拉伯作家伊本·霍尔达德别也在《道路与国家》一书中记载了瓦良格人怎样在哈扎尔汗国、东地中海沿岸进行贸易活动。<sup>②</sup>随着哈扎尔汗国的消亡、基辅罗斯转向发展本国农业、英格兰人于1066年后逐渐取代拜占庭的瓦良格雇佣军<sup>③</sup>，波罗的海成为北欧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北欧国家与基辅罗斯的波罗的海贸易不知是否规范<sup>④</sup>，但12世纪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史料证实双方关系良好。<sup>⑤</sup>

北欧国家与基辅罗斯的文化关系也十分紧密，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语义一符号、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4个方面。<sup>⑥</sup>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已故俄罗斯国学大师Д.С.利哈乔夫曾宣称：“斯堪的纳维亚北方的意义对于罗斯国家制度的精神影响远比拜占庭从南方的影响要复杂”、“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纳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他还大力宣扬“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ндославия）这一概念，意即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在地理、文化方面不可分割。<sup>⑦</sup>笔者认为，我国学界应加强关注北欧天主教对基辅罗斯的影响。丹麦和瑞典在9世纪上半期便已从查理曼帝国传教士那里接触到了基督教，此两国与挪威的基督教都在9世纪后半期取得了国教地位。<sup>⑧</sup>可见，基辅罗斯从北方接触天主教的时间并不比从南方接触东正教晚很多。

最后要指出，基辅罗斯与北欧国家的友善关系到12世纪末渐渐终止。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封建化进程在12世纪末发展迅速，纷纷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sup>⑨</sup>，同时基辅罗斯北部公国也积极展开海外拓殖，双方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和商路，必然引发冲突。这场冲突首先在瑞典和诺夫哥罗德之间爆发，诺夫哥罗德于1186年征讨了瑞典在芬兰南部的殖民地，次年又支持卡累利阿人远征瑞典最富有的城市锡格杜纳，结果导致两国关系直到1201年才恢复。<sup>⑩</sup>第二，罗马教皇和德

---

① 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грянородный,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империей, См. Древнейшие источ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Коммен. Е. А. Мельникова, В. Я. Петрухин, А. А. Зализняка, Г. Г. Литаврина, М.: Наука, 1991, глава 9.

② Ибн-хордадбе, Книга путей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м. Сказания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о славянах и русских, абзац 5, А. Я. Гаркави, СПб, 1870.

③ [英]格温·琼斯：《北欧海盗史》，刘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1页。

④ И. М. Кулишер,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Челябинск: Социум, 2003, с. 54-55.; Г. С. Лебедев, Эпоха викингов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е, с. 260.

⑤ В. Т. Пашу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 146.

⑥ Г. С. Лебедев, Эпоха викингов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е, с. 258—259.

⑦ [俄] Д. С. 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⑧ 敬东：《北欧五国简史》，第15—16、71—72、122页。

⑨ 敬东：《北欧五国简史》，第19、75、123页；В. Т. Пашу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 30.

⑩ В. Т. Пашу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 148—149.

意志王国发动十字军东征引发了“波罗的海危机”。例如，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于 1229 年以革除教门威胁瑞典等国对基辅罗斯进行经济封锁，在 1238 年又与骑士团密谋将丹麦拉入反基辅罗斯的军事同盟；瑞典、挪威和芬兰于 1240 年联合攻打诺夫哥罗德，骑士团则辅攻普斯科夫等地。<sup>①</sup>

综上所述，基辅罗斯地处欧亚交界地带，深受周边各种政治力量的威胁，这使得罗斯统治者逐渐习惯于被动地应付外来挑战，并在常年的反击战中养成了强烈的扩张传统。同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剧了基辅罗斯的内外矛盾，导致其外交活动异常复杂。罗斯人选择不同于东西方国家的东正教信仰，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基辅罗斯外交的被动性、扩张性与复杂性。实质上，在基辅罗斯三大外交特征的表象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才是决定其外交宗旨的根本因素。882-1240 年间，基辅罗斯与周边各国展开形形色色的外交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手段，这些传统都深刻地影响了日后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的外交。

---

**【Abstract】** The diplomacy of Kievan Rus ( 882 – 1240 )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ssivity, expandability and complexity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factor of territory and the Orthodox Church. The diplomatic tenet was determined by soci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t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 peace of Kievan Rus when its soci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were in a stable situ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either stooped to compromise or converted the domestic crisis into war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various diplomacies of Kievan Rus was as following: threaten from the East; threatening to the South; contesting in the West and treating friendly to the North.

**【Key Words】** Kievan Rus, diplomacy, Byzantium

**【 Аннотация 】**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882-1240) испытала на себе влияние факторо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религ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та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ак пассивность, расширенность и сложн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определяла цел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целью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было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мира; а в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наоборот,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целями было разрешени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кризиса либо путём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 либо военным путём. Общ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Восточная угроза, угроза Югу, 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хорош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евер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изантия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

① В.Т.Пашу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238—240.292—293.

## 在东西方之间——涅夫斯基外交及其评价\*

姚海\*\*

**【内容提要】**涅夫斯基对西方政策的重点是同瑞典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同时发展同西方的贸易和文化关系，并在这种交往中保持罗斯的独立性。他的东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与鞑靼蒙古结盟，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在罗斯内部的权力地位，以及在同西方的争夺中稳定后方。涅夫斯基的外交是实用主义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在东西方同时开展活跃的外交，甚至不惜让罗斯付出高昂的代价、承受巨大的牺牲。

**【关键词】**涅夫斯基 外交 西方 东方

**【中图分类号】**D80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98-(12)

13世纪初期，处于封建分裂状态的基辅罗斯遭遇到巨大的外部冲击。作为欧亚之间的一个独特的文化世界，罗斯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206年，在亚洲的腹地，发生了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事件。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开始了蒙古人向中国、土耳其斯坦、小亚和欧洲的征伐。在此之后大约20年，1223年，成吉思汗的骑兵在卡尔卡河畔重创罗斯王公的军队。1237—38年的冬天，蒙古人第一次蹂躏了东北罗斯。1240年夏天，拔都征服了罗斯南部各公国。这年12月，蒙古大军占领了基辅。

差不多同时，在欧洲也发生了同样重要的事情。1204年西欧十字军攻陷君士坦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成果。

\*\* 姚海，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丁堡并洗劫了这座城市，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被推翻。罗斯感受到了现实的威胁。也是在 1240 那一年，瑞典人、日耳曼人和立陶宛人进入了罗斯土地。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sup>①</sup>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罗斯历史舞台。通常认为，在当时罗斯遭鞑靼蒙古征服、受西方强敌威胁的局面下，涅夫斯基作出了在西方抵御侵略、在东方寻找盟友的选择。涅夫斯基的对外政策受到俄罗斯东正教会、俄罗斯国家和俄国传统史学的高度评价。在他死后 300 年，俄国东正教会将他纳入圣徒之列。彼得时代，他的外交活动被塑造为俄国外交的典范。1917 年十月革命后，作为俄国外交象征的涅夫斯基一度被淡忘，但 1930 年代开始恢复了对涅夫斯基对外政策的传统理解，即同金帐汗国的结盟是对西方十字军的反击。1980 年代以来，俄国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涅夫斯基的对外政策及其对罗斯和后来的俄罗斯的影响，并出现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继续肯定他的外交对俄罗斯的意义，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并提出要恢复传统，将他作为俄国外交的庇护者；<sup>②</sup>但也有不少人试图揭穿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涅夫斯基外交活动的的神话，称他为民族罪人、“俄国历史上的撒旦”，“背叛和出卖了罗斯的人民和罗斯的自由……残酷地扭曲了他们的历史命运”。<sup>③</sup>

研究涅夫斯基的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外交遗产的实质及其对此后罗斯和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 一、涅夫斯基对西方的政策

在蒙古征服罗斯前夕，1236 年，雅罗斯拉夫从诺夫哥罗德出发远征基辅，行前把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放到了诺夫哥罗德王公的位置上。

在 1237—38 年间，虽然蒙古大军没有到达诺夫哥罗德，但诺夫哥罗德还是被迫臣服于鞑靼政权。同时，诺夫哥罗德还面临西部强邻的挑战。瑞典人早就试图掌握从芬兰湾到诺夫哥罗德的水路，以便控制与东欧的贸易。1240 年 7 月，瑞典人在涅瓦河沿岸登陆后，涅夫斯基“没有等待其他王公的帮助”，率领自己人数不多的卫队出征迎敌，并在 15 日早上开始的战斗中获胜。差不多同时，日耳曼人（立沃尼亚骑

---

①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1221—1263），在 1236—1240、1241—1252、1257—1263 年间三度为诺夫哥罗德王公，1249—1263 年间为基辅王公，1252—1263 年为弗拉基米尔大公。他在 1240 年击败瑞典人的涅瓦河之战后被称为涅夫斯基，但在史籍中使用涅夫斯基这一称呼是从 15 世纪开始的。

② У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может появиться духовный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вятой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http://www.newsru.com/arch/religy/23may2007/alexandr.html>

③ К. Ю. Резников, Миф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От Руси 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X - XVII вв. С. 193. [http://zhurnal.lib.ru/r/reznikow\\_k\\_j/chapter5.shtml](http://zhurnal.lib.ru/r/reznikow_k_j/chapter5.shtml)

士团) 占领了普斯科夫, 随后进入诺夫哥罗德领地, 并在科波里耶建造了堡垒。1241年, 涅夫斯基攻克科波里耶。1242年初收复普斯科夫并进入立沃尼亚骑士团控制的楚德。4月5日在楚德湖冰面上发生了被称为冰湖之战的著名战役, 涅夫斯基率领诺夫哥罗德人击溃了日耳曼骑士团。

当时, 罗斯总主教西里尔把涅夫斯基在西部边境地区取得的对于瑞典人、日耳曼人以及立陶宛人的军事胜利称作为粉碎了教皇组织的对罗斯的十字军征伐、保卫了罗斯西部边界。这一说法成为传统的“西方威胁”论的基础。根据这个理论, 瑞典人、日耳曼人、丹麦人的入侵是根据教皇领导下制定的计划进行的, 即利用罗斯因遭受鞑靼蒙古征服而孱弱的机会, 夺取罗斯的涅瓦河沿岸和拉多加湖周围地区, 然后南下攻占诺夫哥罗德及其领地。<sup>①</sup>

但实际上, 且不说直至1246年决定罗斯对外政策的是涅夫斯基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 即便将这两次战斗作为涅夫斯基西方政策的组成部分, 也存在着如何客观认识其实质的问题。

基本的事实是, 涅夫斯基与其西部强邻的斗争不是简单的抵抗侵略, 而是罗斯积极地参与同瑞典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对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争夺。

13世纪上半期, 罗斯与其西方邻国相互关系的实质是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异教部落居住的、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缓冲地带”的土地。在争夺和冲突过程中, 日耳曼人、瑞典人曾经侵入罗斯人控制的地区, 而罗斯人也曾侵入过别人的土地。当代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萨哈罗夫指出:

“我们忘记了, 诺夫哥罗德的军团也不止一次地进入立陶宛土地, 占领芬兰领土。在涅夫斯基时期以及在此前和此后, 罗斯军队也在日耳曼和立陶宛土地上作战。斗争围绕着争夺波罗的海沿岸进行。诺夫哥罗德竭力要控制芬兰东部, 瑞典人想控制芬兰西部, 起先罗斯占优势, 后来在鞑靼蒙古征服时期罗斯衰落了, 瑞典人转入进攻。……那个时代诺夫哥罗德作为一个庞大国家同邻国的关系很复杂: 涅夫斯基经常挑动立陶宛人和日耳曼人的争斗。而我们只知道涅瓦河之战、楚德湖之战。……”<sup>②</sup>

经常被拿来作为罗斯抗击西方侵略的范例的涅瓦河之战、楚德湖之战, 只是罗斯人与瑞典人、日耳曼人之间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长期争夺和冲突中的两个具体事例。近年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指出, 把立沃尼亚、丹麦、瑞典、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为控制波罗的海沿岸楚德人、爱沙尼亚人、利夫人(居住在拉脱维亚的部落)、苏米人、卡累利阿人的土地而进行的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想象为西方协调一致侵略罗斯

<sup>①</sup> Джон Феннел, Кризис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уси 1200-1304. Москва, 1989, с.27.

<sup>②</sup> А.Н.Сахаров, История – всегда поле непаханое.//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6 Января 2008 года.

的计划、针对罗斯的十字军征讨，是缺乏依据的。<sup>①</sup>

而且，在罗斯与西方争夺波罗的海沿岸的长期斗争中，涅瓦河之战和楚德湖之战都不具有决定性、转折性的影响。

1240年7月的涅瓦河之战的规模，也许并不比13世纪上半期罗斯人与瑞典人之间为争夺芬兰和卡累利阿地区时发生的一些冲突大多少。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说被消灭的敌人“很多很多”，但诺夫哥罗德人却奇迹般地只损失了20人。而苏兹达尔的拉夫连季编年史和瑞典史籍都根本未谈及这次战斗。至于瑞典“王公”和主教亲自率领了入侵军队一事，则是除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之外没有任何史籍记载的。<sup>②</sup>此外，尽管瑞典人在涅瓦河之战中遭受了挫折，但他们在13世纪中叶征服了芬兰，在世纪末兼并了卡累利阿。而在诺夫哥罗德与瑞典之间形成比较稳定的边界，已是在1323年的奥列霍夫和约之后了。<sup>③</sup>

楚德湖之战也是罗斯人同日耳曼人之间为争夺立沃尼亚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斗。1241年，涅夫斯基在占领卡波里耶之后进入普斯科夫，并进一步扩大战果越过边界侵入爱沙尼亚日耳曼领土。在诺夫哥罗德先头部队遭受重创后，涅夫斯基将兵力收缩到楚德湖一带。日耳曼和爱沙尼亚骑士用楔形阵势攻击诺夫哥罗德人，但在1242年4月5日被涅夫斯基击败。最早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说日耳曼骑士死了400人，被俘50人。13世纪末编撰的主要西方史料《立沃尼亚年表》的记载是，日耳曼骑士死了20人，被俘6人。拉甫连基编年史谈到这一战事时并未突出其特殊意义，而且叙述的事件主角不是涅夫斯基，而是他的兄弟安德烈：“雅罗斯拉夫大公派自己的儿子安德烈去大诺夫哥罗德帮助亚历山大对付日耳曼人，在普斯科夫城外的湖上战胜了敌人，抓了很多俘虏，安德烈带着巨大荣耀回到父亲那里”。有人认为，总主教基里尔和14世纪出现的《传记》夸大了涅夫斯基在西方的胜利，其目的也许是为了美化他后来对鞑靼人的卑躬屈膝。<sup>④</sup>

在涅夫斯基于罗斯西北边疆取得军事胜利之时，他的父亲雅罗斯拉夫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周旋。雅罗斯拉夫是最早向金帐汗国称臣纳贡的罗斯王公之一，1239年亲自去金帐汗国都城萨莱向金帐汗表达忠诚。拔都隆重接待了他，并让他成为“罗斯所有王公之首”。1246年他又去到蒙古帝国首都和林，参加了决定窝阔台之子贵由继承大汗之位的蒙古大会。但在向鞑靼蒙古宣誓效忠的同时，雅罗斯拉夫也在与教皇的使者乔万尼·加宾尼就与罗马教廷结盟的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并表示愿意接受教

---

① И.В.Карацуба, И.В.Курукин и Н.П.Соколов, Выбирая свою историю. Развилки на пути России: от Рюриковичей до олигархов. Москва, 2005, с. 60.

② Джон Феннел, с. 144-145.

③ И.В.Карацуба, И.В.Курукин и Н.П.Соколов, с. 60-61.

④ Джон Феннел, с. 146.

皇的庇护。蒙古人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显然不能再容忍他。不久，雅罗斯拉夫死在和林。<sup>①</sup>

雅罗斯拉夫死后，涅夫斯基很快成为罗斯王公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开始直接主导东北罗斯的对外关系。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教皇的结盟建议。

1248年，教皇呼吁涅夫斯基承认罗马教廷，并许诺以立沃尼亚骑士团帮助他对付鞑靼人。教皇在1248年1月22日给涅夫斯基的信中，委婉地希望他追随他的父亲，承认罗马的最高权威，并请他在遇到鞑靼蒙古进攻时通知“住在立沃尼亚的条顿骑士团兄弟，只要我们从兄弟处得到消息，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考虑以何种方式在上帝帮助下勇敢地抵抗鞑靼人”。<sup>②</sup>教皇的这一文书在1251年左右送达涅夫斯基。

对于罗马教皇的建议，涅夫斯基有过一段时间的游移不定。当时，罗斯与西方结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那时整个欧洲被认为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在涅夫斯基之前，一些罗斯王公就认为，罗斯同鞑靼蒙古人的斗争有可能得到外部盟友的帮助，而如果得到强大的西方骑士团的军事支援，将有助于罗斯摆脱鞑靼的压迫。他们采取实际行动与西方接触，希望共同对付鞑靼蒙古。1245年，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斯基成为第一位同罗马教廷进行谈判的罗斯王公。丹尼尔·加利茨基也在那一年与教廷进行联系。涅夫斯基的父亲雅罗斯拉夫也在1246年与教皇的使者就结盟问题进行过秘密谈判。

当时，由于面临蒙古的威胁，也由于一些西南罗斯王公与罗马教廷关系的活跃，基督教不同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弱化，罗斯与西方之间出现了互相接近的可能性。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大会上呼吁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同金帐汗国作斗争，并把罗斯纳入了“基督教国家”之列。

对于1248年1月22日教皇表达的同罗斯结盟的愿望，涅夫斯基曾表现出认可的意思。虽然他给教皇的复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根据教皇1248年9月15日给涅夫斯基的第二封信件的内容判断，涅夫斯基是准备接受“罗马教会的庇护”的。教皇在第二封信中表示，同意涅夫斯基的建议，在普斯科夫建造天主教教堂，并请求涅夫斯基接待他派去的使者。但是，在1248年底教皇的使者与涅夫斯基见面并希望得到其转向天主教的最终答复时，涅夫斯基“与自己的谋臣商量”之后，明确地表示了拒绝。<sup>③</sup>

一般认为，涅夫斯基最终拒绝与天主教西方结盟的原因，是受到了罗斯东正教会的影响。当时罗斯教会上层对于加利奇王公丹尼尔的亲西方政策持否定态度，认

---

① И.В.Карацуба, И.В.Курукин и Н.П.Соколов, с.46.

② И.В.Карацуба, И.В.Курукин и Н.П.Соколов, с.54.

③ И.В.Карацуба, И.В.Курукин и Н.П.Соколов, с. 54-55.

为与西方结盟将使西方能够在罗斯土地上为所欲为，东正教的罗斯将被天主教欧洲所淹没；东正教会不能够从罗斯王公与天主教欧洲的政治联盟中得到什么，而只会失去罗斯教会的独立性。相反，同鞑靼蒙古建立妥协关系将使教会获益。20 世纪初，持欧亚主义立场的格·维尔纳茨基、古米廖夫等夸大了宗教因素对涅夫斯基外交的影响，把对抗天主教、捍卫东正教视为涅夫斯基对外政策的核心。

但是，宗教因素对涅夫斯基西方政策的影响未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虽然涅夫斯基拒绝接受天主教，拒绝与西方结盟，但他并不是以宗教对抗作为自己西方政策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例如他允许来到罗斯的西方人自由地保持自己的信仰，允许他们建造教堂，包括在刚从日耳曼骑士手中解放出来的普斯科夫建造天主教堂。

也许，对于同西方结盟对付鞑靼蒙古可能会引起的问题和风险的现实担忧最终促使涅夫斯基放弃了与西方结盟的想法。从当时罗斯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这种结盟可能意味着罗斯弱化甚至放弃对波罗的海沿岸的争夺，而与西方的同盟能否成功地对抗鞑靼蒙古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罗斯内部政治关系来看，与西方结盟可能会导致西方对罗斯内部政治的影响力加强，当然也包括要承担西方在精神和意识上控制罗斯的风险。

## 二、涅夫斯基对东方的政策

在 1248 年教皇表示愿意与罗斯联合对付鞑靼蒙古的时候，金帐汗拔都也向涅夫斯基传话：

“在罗斯统治者中最声名远扬的当属涅夫斯基王公，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上帝让我征服了很多民族，他们服从于我的国家。难道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不在乎我的力量吗？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如果想保持自己的土地平安无事，那就赶紧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王国的辉煌和荣耀，并让你和你的土地也享有它们。”<sup>①</sup>

拔都此时之所以希望与涅夫斯基结好，是因为窝阔台汗死后，拔都在蒙古帝国中的地位发生大变。早在当年西征期间，拔都就与自己的堂兄弟、窝阔台之子贵由发生过争执，并将其送回和林。窝阔台在儿子与拔都的关系上保持克制，但他死后，贵由在 1246 年登大汗位。拔都面临严重威胁，而他掌握的军事力量远不能抗衡贵由，因此需要盟友的支持。

涅夫斯基在西方与东方之间选择了后者。1249 年，涅夫斯基和兄弟安德烈一起

---

<sup>①</sup> В.Вернадский, Два подвиг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http://a-nevskiy.narod.ru/library/11.html>



去了金帐汗国都城萨莱和蒙古帝国都城和林。安德烈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位子，涅夫斯基则成为基辅大公并保留了诺夫哥罗德，他们的第三个兄弟雅罗斯拉夫统治特维尔。涅夫斯基显然对于只得到荣誉性的基辅大公的位子感到不满。他没有去已被严重破坏的基辅，而是留在了诺夫哥罗德。而安德烈当上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后，不仅试图推行独立于金帐汗国的政策，还与自己的兄弟、特维尔王公雅罗斯拉夫一起，联络当时也打算反对鞑靼人、并正在同罗马教廷谈判的西南罗斯王公丹尼尔·加利茨基，试图建立反对蒙古人的联盟。

在这些反蒙古的活动紧张进行时，涅夫斯基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1252年，涅夫斯基又去了汗国的都城萨莱。在他离开萨莱之前，拔都就派出两支军队分别讨伐谋反的罗斯王公——东北罗斯的安德烈和西南罗斯的丹尼尔。

1252年7月24日，由金帐汗国将领涅乌留伊率领的军队出现在弗拉基米尔城下。这是1237—1239年拔都征服东北罗斯之后，金帐汗国对东北罗斯的第一次大规模讨伐。金帐汗国军队击败了安德烈，抢劫和烧毁了城市和村庄，把“无数”人口、马匹和牲畜赶往汗国。“涅乌留伊讨伐大军”给东北罗斯带来的损失甚至超过了当年拔都的征服。安德烈被迫流亡瑞典，而涅夫斯基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

涅乌留伊讨伐大军的到来，是东北罗斯最强大的王公与金帐汗结盟的体现，或者说是双方达成了协议，金帐汗向涅夫斯基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涅夫斯基同意汗国对罗斯土地的压迫和劫掠制度化。

涅夫斯基最终决定与鞑靼蒙古结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往强调比较多的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罗斯东正教会支持涅夫斯基与金帐汗国结盟；二是在西北部边疆争夺波罗的海沿岸的斗争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东方；三是由于罗斯没有力量抵抗金帐汗国的直接入侵，只能选择对鞑靼蒙古实施灵活外交的道路。

这些因素在涅夫斯基决定与鞑靼蒙古结盟的过程中可能都起了作用，但未必是决定性的。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罗斯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一些学者指出，涅夫斯基与金帐汗国结盟的动机是自私的，“目的是当弗拉基米尔大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把鞑靼压迫加于罗斯，他以出卖自己兄弟的最卑鄙方式来做这件事。”<sup>①</sup>拉甫连基编年史简短地记载了1252年的事件：“诺夫哥罗德王公涅夫斯基去了鞑靼人那里，他回来时带有巨大荣耀，鞑靼人让他成为他所有兄弟之首。”1730年塔吉舍夫在写他的《俄国史》时利用了很多未能进入编年史的资料，他指出，涅夫斯基以告发自己的兄弟的方式巩固了对大公之位的追求。<sup>②</sup>

涅夫斯基为了利用金帐汗国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付出的主要代价是，蒙古

---

① К. Ю. Резников, там же.

② И. В. Карацуба, И. В. Курукин и Н. П. Соколов, с. 48.

人在罗斯土地上建立起定期的征税制度。在拔都的征服之后，从 1240 年到 1252 年，还是由罗斯人“自己决定怎样生活”，但涅夫斯基当了弗拉基米尔大公以后，金帐汗国调整了对罗斯的统治方式，“开始了罗斯从属于鞑靼国家的一个新时期”。<sup>①</sup>

1257 年，金帐汗国派出户口登记官对罗斯各地进行重新登记，把居民按十、百、千、万划分，以便确定税赋数额以及为蒙古军队提供兵员的数量。刚对汗国进行了例行朝觐的涅夫斯基带着卫队陪同征税官一起来到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人起来反抗涅夫斯基和金帐汗国官员，拒不缴纳规定的十一税，还减少了给金帐汗的贡献。涅夫斯基的儿子瓦西里也站到了反抗者一边。涅夫斯基对造反的诺夫哥罗德人进行残酷镇压，把那些挑战他的权威的人“割掉鼻子，挖去眼睛”，瓦西里也被逐出诺夫哥罗德。

没能在诺夫哥罗德重新登记户口，令金帐汗十分不满。1258 年，涅夫斯基前往萨莱，金帐汗同意给予军事帮助以制服诺夫哥罗德人。1259 年，涅夫斯基的卫队与金帐汗国大部队一起到了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人担心遭到大屠杀，同意汗国进行重新登记。但当登记官在涅夫斯基的卫队护卫下开始挨家挨户进行登记时，城里又发生了暴动。诺夫哥罗德人的抵抗很快被击败，他们被迫“交出了那个数目的税”。诺夫哥罗德作为反对金帐汗国压迫的根据地镇压下去了。

但罗斯人民对于金帐汗国建立压迫制度的反抗没有停止。1262 年，几乎整个东北罗斯都发生了反对金帐汗国的起义。在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雅罗斯拉夫尔等大城市召开了维切(veche, 原为公元 6—9 世纪东斯拉夫部落的民众大会，后为 10—14 世纪罗斯一些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市民们驱逐和殴打汗国的官员和包税商。涅夫斯基在起义开始时又去了金帐汗国。他的《传记》和一部编年史提到他此行的原因是金帐汗国的别尔哥汗要求罗斯派出部队参加其远征，而他去汗国则是“为了让人们免受灾难”。他的颂扬者认为，由于他的外交努力，金帐汗决定不惩罚造反者，而且罗斯得以免除派军队参加蒙古远征。但实际上，此时别尔哥汗忙于同波斯的战争，无暇顾及罗斯，因此让罗斯王公自己去对付暴动的城市。至于罗斯参与蒙古军事活动的问题，事实是罗斯军队此后仍不止一次地参加了蒙古的远征。

可以认为，涅夫斯基选择金帐汗国为盟友的首要目的是借金帐汗国之力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涅夫斯基最后十年的基本活动表明，在他心目中，同蒙古人的结盟使他能够驯服罗斯土地上那些桀骜不驯的维切城市，而同西方的结盟将不可避免地会加强这些城市的地位，因为此时西欧的城市已经从封建领主手里解放出来。

当然，罗斯与金帐汗国的关系中除了征税、讨伐，也有相互经济利益：在金帐

---

<sup>①</sup> Джон Феннел, с.136, с.149.

汗国一直有罗斯商人活动，他们通过汗国进入中亚、花刺子模和布哈拉以及里海沿岸国家。在宗教方面，作为征服者的金帐汗对罗斯是宽容的。罗斯东正教会得到了很多权利，从一开始就被免除向汗国缴纳赋税，也是唯一不被重新登记的机构。东正教在金帐汗国内可以自由传播，1261年还在萨莱设立了教区。

### 三、对涅夫斯基外交的评价

涅夫斯基作为俄国历史上危机时期的统治者，在东西方同时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由于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很少，而且有些信息互相矛盾，要复原涅夫斯基外交的决策过程是困难的，而且事实上也很难说涅夫斯基对于罗斯的对外关系有非常明确的系统考虑。美国学者费奈尔指出，无论是他与自己家族成员的关系，还是他对东正教的立场，或是他的军事行动，都不能构成其政治路线的完整图像、也不能完整地反映他对于那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的态度：罗斯在蒙古帝国中应当据有何种地位？罗斯应该如何处理与金帐汗国的关系？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应该作为盟主联合罗斯土地和人民推翻金帐汗国的统治，还是应该听命于金帐汗、避免与鞑靼蒙古的任何冲突以取得在内部事务方面的有限自由？<sup>①</sup>

但涅夫斯基外交的大致内容及其影响是清楚的，因此有可能对他的外交遗产进行原则性的概括和评价。

在罗斯同时面临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威胁的艰难时世，涅夫斯基在两个方向上开展活动，采取了复杂的政策，以谋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在西方加强防御，在东方寻找朋友”被认为是涅夫斯基给自己的后人留下的对外政策遗产，<sup>②</sup>但以此概括涅夫斯基外交并不完整。

涅夫斯基的外交表明，罗斯利益的重心在西方。涅夫斯基西方政策中包含的最重要因素是：

一、**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是罗斯和此后的俄罗斯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历史性任务。彼得大帝并非偶然地尊崇涅夫斯基，1724年指示将他的遗骸从弗拉基米尔移到圣彼得堡，这个行动显然具有巩固俄国对于在北方战争中夺得的土地的权利的意图；在与瑞典签订尼什塔得和约的当天，彼得下令举行纪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活动。1725年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设立了以涅夫斯基命名的最高军功勋章。1753

---

① Джон Фенел, с.157-158.

② Доклад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Ташкентского и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ого Владимира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МГИМО, 4 декабря 2007. [http://halkidon2006.narod.ru/history/705\\_mitropolit\\_vladimir.htm](http://halkidon2006.narod.ru/history/705_mitropolit_vladimir.htm)

年开始，每年举行从喀山大教堂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十字游行。这些都表明，涅夫斯基在西北边疆取得的军事胜利，体现了罗斯人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人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世代努力。

**二、发展与西方的关系。**涅夫斯基在与西方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同时，并没有如欧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为了东正教的纯洁性而断绝与天主教西方的关系。相反，他曾打算让自己的儿子瓦西里娶挪威国王的女儿哈克娜·克丽丝汀，还准备同日耳曼人签订条约。他对于开展同欧洲国家的互惠经济联系持积极态度。13世纪50年代罗斯与挪威的谈判，与其说是边界谈判，不如说是贸易问题谈判，最终以达成互利协议而告结束。1262年涅夫斯基同吕贝克签订的贸易协定，是罗斯与汉萨同盟之间最早的条约。涅夫斯基时期罗斯与瑞典、日耳曼骑士国家和其他邻国的政治条约中，也都包含了发展经济贸易交往的条款。

**三、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保持罗斯的独立性。**拒绝与西方缔结同盟的立场包含了对于丧失独立性的担忧，因为同盟可能会导致西方精神、思想和制度对罗斯的渗透，使罗斯有效抵制西方影响的能力遭到削弱。而在发展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的过程中，涅夫斯基也力图避免西方精神对罗斯的影响，保持罗斯的独立性。他在答复教皇要他接受天主教、缔结同盟的建议时说：“我们懂得一切，不接受你的教训”。<sup>①</sup>

在涅夫斯基的东方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寻求政治盟友。在这方面也可以发现对以后的俄国外交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

**一、与东方结盟是罗斯抗衡西方的有力支撑。**无论结盟的动机如何复杂，但与鞑靼蒙古结盟的客观效果是使得罗斯避免面临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局面。为了实现自己在西方的主要目标，一个稳定的东方是必需的。在同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瑞典人进行争夺的时候，涅夫斯基“与鞑靼蒙古人合作，以此保卫自己的后方”。<sup>②</sup>

**二、影响罗斯外交的不仅是外部因素，还有内部政治因素，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内部因素比外部因素更具有决定意义。**同金帐汗国交好以至结盟，不仅有助于加强罗斯在与西方关系中的地位，更有利于加强涅夫斯基在罗斯内部政治中的地位。

**三、为了实现自己的核心利益，可以让罗斯为结盟付出高昂的代价、承受巨大的牺牲。**

涅夫斯基外交的客观效果，首先是改变了罗斯在国际格局中的处境，稳定了罗斯与金帐汗国的关系、减少了不确定因素，加强了罗斯在同西方邻国关系中的地位；其次是发展了罗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扩大了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再次是促进了斯拉夫民族与鞑靼蒙古民族的接近与融合，奠定了未来俄罗斯统一国

---

<sup>①</sup> Доклад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Ташкентского и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ого Владимира. Там же.

<sup>②</sup> А.Н.Сахаров, там же.

家的基础。

涅夫斯基的外交政策就其实质而言是实用主义的外交。当代俄国历史学家戈尔斯基指出，不应在涅夫斯基的行为中寻找“某种有意识的决定命运的选择。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根据那个时代对周围世界的认识 and 个人的经验行事。涅夫斯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选择了他认为巩固自己的土地和他自己的最有利的的方式。当这意味着决战，他就投入战斗；当这意味着同罗斯的敌人之一达成协议，他就妥协。”<sup>①</sup>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涅夫斯基在东方和西方两个方向上同时开展外交活动。而这种利益，既包括了他统治的罗斯的相对安全和独立，也包括了他个人的权位。

涅夫斯基外交的大背景是罗斯国家面临空前危机，这使后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到他，并逐渐把他神化。“旧俄国外交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作为自己的庇护者”，因为“他提出了旨在保持俄罗斯独特性的外交路线。”<sup>②</sup>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西方和东方的积极活动奠定了我们所说的几个世纪外交的基础。俄罗斯在对外政策方面应该在所有方向上开展工作。”<sup>③</sup>为了实现主要目标而在东西方同时开展活跃的外交，这是涅夫斯基外交的当代意义所在。

---

**【Abstract】** The focus of Alexander Nevskiy's foreign policies with the West is to contend in the Baltic region against the Swedes, Germans, Lithuanians while developing their trade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nd maintaining Rus' independence during such exchanges. His eastern policies mainly focused on alliances with Tartars of Mongolia, aiming to consolidate its position of power within Rus and gain stable status dur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West. Nevskiy's diplomacy is pragmatic. In order to achieve his own core interests, he carried out active diplomacy both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even at a high price and cost of Rus.

**【Key Words】** Alexander Nevskiy, Diplomacy, the West, the East

**【Аннотация】** В центре внимания запа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была политика борьбы за Балт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со шведами, немцами, литовцами, а также развитие торговли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с Западом, и при этом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уси. Его 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в союзе с

---

① А. А.Горский, Всего еси исполнена земля Русская...: Личности 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русског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М., 2001, с. 60-61.

② У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может появиться духовный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вятой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http://www.newsru.com/arch/religy/23may2007/alexandr.html>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кий - образец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http://zero.164500.ru/viewtopic.php>

татаро-монголами, целью да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было укрепление своих позиций в Руси, а также придани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борьбе с Западом.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евского была прагматичной, он в целях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во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осуществлял актив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с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и даже то, что Русь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латить высокую цену, и приносились огромных жертвы,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ло его.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я, Запад, Восток

---

(责任编辑 黄翔)

## 东—西方与冷战史

#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

左凤荣\*\*

**【内容提要】**斯大林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到帮助朝鲜进行战争准备。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明显希望中国参战，不断敦促中国出兵，其战略意图在于扩大苏联对远东的影响，加深中朝对苏联的依赖。朝鲜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使冷战从欧洲扩大到亚洲，加强了中苏朝的结盟关系，也加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恶化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关键词】**斯大林 毛泽东 朝鲜战争

**【中图分类号】**E297.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110-(13)

朝鲜战争一直是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解密了一批档案资料，为弄清一些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是20世纪除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参战国家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涉及当时两个最大国家（苏联和美国）的战略利益，也触及了新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局面，从这一角度看这是一场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却又毫无意义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又不是如此简单的，即使研究了大量档案资料的俄罗斯学者仍把它称为“神秘的战争”。列多夫斯基在研究了苏联一些新的档案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对金日成及其同事在统一朝鲜问题上的行动影响很大。特别是毛泽东的‘亚洲主义’和他提出的按照‘中国模式’重塑亚洲的方针刺激了他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左倾激进派活动家走上战争道路。”<sup>①</sup>“一方面由于金日成及其同事努力让斯大林相信，军事行动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由于毛泽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成果。

\*\* 左凤荣，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导。

①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93.

东答应向‘朝鲜朋友’提供军事帮助，斯大林最终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立场，同意金日成的计划（毛泽东支持）。<sup>①</sup>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中国起着比苏联更大的作用，金日成发动战争直接与中国相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开始都反对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先改变了立场，毛泽东被迫同意，朝鲜战争从爆发到久拖不决，都是斯大林所需要的。

## 一、朝鲜战争是朝鲜半岛分裂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会对朝鲜进行改造和治理，其主要任务是在朝鲜建立统一的临时政府。美苏双方分歧大，各不相容，苏联认为成立统一的临时政府要保证其亲苏是困难的，苏联转而实行使北方在政治、经济上成熟起来，建立不受美国影响的对苏友好政府的政策。苏联红军进入朝鲜后，在各地建立起军事管制机构——警备司令部，共有 113 个。苏联的这些警备司令部，控制朝鲜的地方自治机构——人民委员会，司令部职责扩大了。1946 年 2 月建立了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从苏联回国的金日成取代曹晚植（曹把苏军视为与日本一样的占领者，后任苏联驻朝大使的什特科夫说他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成为领导人。在欧洲已经形成冷战格局的情况下，美苏很难在朝鲜合作下去，1947 年 10 月以后各行其是，1948 年 8 月 15 日南方成立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主政府，1948 年 9 月 9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朝鲜战争是冷战格局的产物，是冷战造成朝鲜分裂的结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和李承晚都提出了“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论”，不过金日成是秘密准备，而李承晚则是公开叫嚣。韩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李承晚不过是在放空炮，虽然他个人的斗志很强盛，主观意愿很强烈，但是客观上不具备物质条件，美国也不同意。而北方则不同，从建国起，金日成就想武力统一朝鲜，并向斯大林提出过这一设想，斯大林起初虽然不同意，但为了增强北朝鲜防御能力，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援助。

## 二、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曾是中苏的共识

1949 年 6 月 25 日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召开成立大会，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认为，为了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参加国家统一、独立和民主发展的斗争，有必要成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此后，朝鲜领导人一方面预防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一方面也在

---

①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Указ. соч. С.94.



寻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之路，并寻求苏联的帮助，为此，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并做出决议，要求苏联驻朝鲜大使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军事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从而把北朝鲜的边界推进到汉城附近的局部战役，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的干涉提供借口。朝鲜的任务是：第一，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武装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力量。<sup>①</sup>尽管金日成等人对此不满，但斯大林反对朝鲜方面武力统一或者发动局部战役的立场并没有变。

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认为中国直接影响金日成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有两个重要理由：一个是所谓毛泽东的“亚洲主义”，另一个是关于中国允许朝鲜军人回国。

列多夫斯基根据1949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号召各国共产党走中国式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解决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战争与革命年代的革命观，表明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反帝斗争的态度，中国当时尚未完成全国解放的任务，根本谈不上直接帮助这些国家从事武装斗争。正如列多夫斯基引证材料所说，中国当时曾反对在中国召开这两个会议。

关于朝鲜军人回国的问题，这是朝鲜人自己提出来的，并不表明中国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在日本侵占朝鲜后，许多朝鲜人迁居到中国、苏联以及美国等国家，日本投降后，许多人返回了祖国，有人去了南朝鲜，有的去了北朝鲜，在苏联的朝鲜人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朝鲜。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金一要求中方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部队归还给朝鲜人民军，毛泽东答应了朝鲜方面的要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中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由于担心南方发起进攻，1949年7月上旬，金日成决定将在中国东北的两个师立即调回

---

<sup>①</sup> АПРФ, ф.3, оп.65, л.776, л.30-32, 转引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

朝鲜：长春师改编为人民军第五师团，配置在罗南，沈阳师改编为人民军第六师团，配置在新义州。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配备了全套轻重武器。关于朝鲜的局势，毛泽东担心的是南朝鲜随时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他劝金日成要做好周密准备，还答应如果出现日本帮助南朝鲜发动进攻的情况，中国也会派军队援助朝鲜。但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进攻时，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sup>①</sup>

此时，斯大林也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1949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您的意见，现在朝鲜军队（暂时）不应该发动进攻。我们也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提出朝鲜人民军向南方进攻不应该被接受，因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的意见是，现在朝鲜同志应该把自己为统一朝鲜而斗争的力量集中在广泛开展游击运动，在南朝鲜建立解放区，同时加强北方人民军上。”<sup>②</sup>

1949年12月29日，聂荣臻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转发了林彪等人12月25日的电报，电报中说：根据最新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有16000名朝鲜人，除了分散在解放军各部队中的之外，还有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计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担任领导职务的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和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战斗经验，有创建武装力量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在我军向南方进军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返回祖国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听从命令并坚决地向南方进军。现在战争接近尾声，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打算让这些骨干回到朝鲜（愿意留下的我们就让他们留下），请中央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研究他们是否可以回到祖国，朝鲜劳动党是否愿意让他们回去。如果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们则把他们集中编成一个师或4-5个正规军团，经过短暂的训练后让他们回国。<sup>③</sup>1950年1月8日，苏联方面让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询问金日成对此事的态度。1月9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会见，“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人民军队中上述数量的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

---

①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9-61。源自沈志华提供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

② 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以下简称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2, л.47-48. 转引自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以下未注明的，均引自此文。

③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9.

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sup>①</sup>

1950年1月2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给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电报，指出：当时在四野的朝鲜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总计有14000名。金日成派了3个代表来接收这些人，他们请求把这些人编成一个师并带走全部装备：12000支步枪，440挺轻机枪、180挺重机枪、120支左轮手枪、132个深水炮弹发射器、72个坦克炮、36个105毫米的迫击炮和弹药。林彪建议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1月25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sup>②</sup>

有不少学者把这看成是中国对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支持，其实，按照中国人的行事原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朝鲜战士帮助了中国人民，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提出回国，中国方面自然不会反对，他们要带走所用装备，中国当然也不能不让带走。中国此时并没有完全结束战事，中国的西南还有残敌，沿海诸岛也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盘踞台湾，中国当时向苏联提出给予海空支援，正在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sup>③</sup>

从以上资料看，中国并没有支持金日成发动解放南朝鲜战争的想法，斯大林此时也反对他的冒险。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朝鲜问题不是双方讨论的议题。

### 三、斯大林改变立场，支持发动朝鲜战争

金日成一直致力于武力统一朝鲜，苏联几乎满足了金日成要求购买武器的一切要求，提供贷款、顾问，但苏联反对金日成马上对南朝鲜开战。但在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改变了对金日成要求武力统一朝鲜的态度，1月30日斯大林就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电报，表示允许金日成到苏联来，准备帮助他。<sup>④</sup>斯大林改变态度可能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有关。苏联一直希望保留与国民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中所获得的对旅顺、大连港和中东铁路的权益，1950年1月26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要求苏联要在1952年归还这些地方，

---

① 转引自沈志华所提供的《朝鲜战争档案》。

②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22.

③ 最新资料可参阅张震：《张震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70.转引自：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2000. С.55.

①1月28日苏联方面基本上同意了这一方案。这让斯大林想长期在远东占有不冻港的希望破灭，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统一的态度不能不与此相关。②促使斯大林改变对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半岛态度变化的原因还有：一是美军从朝鲜撤退。美国军队在1949年底撤出了南朝鲜，只留下了500名顾问（苏联从北朝鲜撤出后，留下了3000名顾问），1949年3月，麦克阿瑟在接见英国记者时表示，美国的防线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1950年1月他重申这一看法。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一次演讲中，讲到美国在亚洲的“防御线”，不包括朝鲜和台湾。这让金日成和斯大林认为美国不会干预，这在他们之间做出进攻南朝鲜的决策时谈到过；二是金日成不断向苏联方面报告说李承晚正在准备进攻北方，三八线附近局势紧张，如果允许他打过去，肯定能胜利；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了，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平衡，局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

1950年2月2日，斯大林再次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电报，要求他转告金日成：秘密前来莫斯科，暂时不要告诉北朝鲜其他同志，也不要告诉中国同志。③1950年3月30日到4月25日，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近一个月，斯大林三次会晤金日成，有关谈话没有在苏联档案中找到，但根据沃尔科戈诺夫的个人档案记载，会谈大致谈了以下一些问题：金日成拟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统一；朝鲜的经济建设问题；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苏联归还朝鲜咸兴港的问题。斯大林自己称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应该积极行动。在共产党的计划中，中国必须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中共已经胜利了，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胜利改变亚洲力量对比，中国可以出兵帮助，美军撤出了中国，不会与中共作战。现在中苏结成了同盟，美国更不会干涉朝，苏联也是核国家，绝对相信美国不会干涉，而北京会支持朝鲜的解放战争。金日成认为，有中苏同盟，美国不会冒险，毛泽东不只一次答应帮助朝鲜，包括军事援助，朝方相信自己的力量。斯大林要求朝在军队数量与质量上超过南方。通过三个阶段解决问题。斯大林提醒金日成，不要指望苏联直接参战，要求金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支持。④斯大林改变了立场，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牵扯进来了。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和朴宪永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他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

---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д.248, л.38-55. 转引自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② 有关档案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斯大林也没有明确说过这一目标，但在二战结束后美苏占领朝鲜时，苏联的外交官们就曾竭力建议政府把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手中。参见沈志华、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第27页。

③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12.转引自：Торкунов А.В. Указ. соч.С.56.

④ Торкунов А.В. Указ. соч. С.58-59.

斯大林说了，“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当晚 23 时 30 分，周恩来就去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得到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说明。5 月 14 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确认了朝鲜领导人的说法，这封电报说：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同意让朝鲜人采取统一朝鲜的行动，但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要等以后重新讨论后再作决定。<sup>①</sup>在中苏结成同盟、斯大林又对毛泽东不是很信任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同意。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同意了金日成对北朝鲜和南朝鲜局势的评价，他告诉朝鲜同志，在朝鲜完成统一后，中朝两国可以签订类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那样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sup>②</sup>实际上，毛泽东认为北朝鲜向南方进攻的问题在莫斯科已经解决了，无需中国直接出面，朝鲜也无此要求，所谓的中国同意只是形式上的。此后，中国并未参与朝鲜战争的准备工作，仍然致力于准备对国民党军队的海战。

苏联人切实帮助金日成进行着战争的准备工作，在金日成访问苏联前夕，斯大林同意按金日成的要求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装备，朝鲜以黄金、白银、钼精矿、铅支付。根据苏联外交官的报告，北朝鲜军队在 6 月 12 日开始集结于 38 线，6 月 23 日完成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和地形侦察，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声称李承晚对之发动了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积极。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 3000 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 45 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之下制定的。苏联政府还在战争初期为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据俄国档案透露，1950 年 7 月 1 日和 6 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据统计，1950 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 8 亿 7 千万卢布。”<sup>③</sup>当时，苏联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干涉，想尽快让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

北方的进攻出乎李承晚政府的预料，12 小时后南方才开始进行有效地抵抗。6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海空军和美国武装力量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援助。同一天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问题，苏联代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没有出席，使美国的意志顺利实现。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后，苏联指示朝鲜军队继续进攻，尽快解放南方，苏联的顾问要换便装，作为《真理报》记者，保证不落入敌手。7 月 11 日英国

---

①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Указ. соч. С.94.

② Там же. С.95.

③ 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新华文摘》，1997 年第 4 期，第 74 页。

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建议让朝鲜军队撤至 38 线，和平解决问题，但斯大林反对，称这是厚颜无耻，不能接受。这个问题只能在有中国和苏联代表参加的安理会解决。对于苏联代表不参加安理会，从而让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毫无阻碍地行事的做法，许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他向苏联驻捷大使表示：“民主阵营不应该离开联合国安理会”。斯大林没有立即回答他，8 月 27 日斯大林回答了这个问题，道出了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真实意图，值得注意。在书面答复中，斯大林写道：

“我们对 6 月 27 日离开安理会和随后事态的发展，看法与哥特瓦尔德不同。我们离开安理会有四个目的：第一，目的是示威性地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sup>①</sup>第二，目的是强调美国政策的愚蠢性，它承认国民党的稻草人在安理会作为中国的代表，而不允许（新）中国的真正代表权；第三，目的是使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由于两个大国代表的缺席而不合法；第四，目的是让美国政府放开手脚，使他们能够利用在安理会中的多数采取新的愚蠢的行动，使社会舆论能够充分看清美国政府的嘴脸。

我想，我们达到了这些目的。

在我们离开安理会后，美国被牵连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的军事威信和道义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暴虐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方面它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清楚，美国现在被从欧洲引到了远东。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

正如您所看到的，苏联参加还是不参加安理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这样看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离开还是参加安理会取决于具体情况。我们能够再一次离开安理会，也能够再次返回，这取决于国际局势。

---

<sup>①</sup> 此时，苏联与中国已经结盟，没必要通过此事来证实。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我们的目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干扰他用安理会的旗帜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陷入侵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达到这一目的。我想，已经很清楚，不用再进一步解释了。”<sup>①</sup>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让美国卷入朝鲜战争、陷入其中并受到削弱，这样可以减轻苏联在欧洲的压力。但是，斯大林也不会让美国人获胜，他一直密切关注朝鲜战争的进展，他认为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然会介入，不能让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苏联有共同利益。

从以上资料分析可以看出，斯大林实际上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如果美国不干预，金日成获胜，那是最理想的结局，苏联可以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支配权，获得其矿藏和良港。如果美国参战，有中国人顶着，不会导致苏美冲突，中美交恶有利于苏联。

#### 四、斯大林积极推动中国出兵朝鲜

斯大林一直积极推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有关情况在沈志华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简单列出几份文献，1950年7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要求中国“集结9个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敌人越过38线时志愿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尽力为这一地区提供空中掩护。”<sup>②</sup>7月8日，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华使馆通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该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sup>③</sup>中国当时虽然跟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没有向朝鲜派驻大使，列多夫斯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口头上宣布帮助朝鲜半岛统一，但事实上想让苏联承担这一任务，中国处于中立的立场，目的是不想跟美国激化矛盾。斯大林清楚这一点，急于推动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军队派到朝鲜去。<sup>④</sup>

此时，英国建议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和英国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胜利，打下去并没有好处，美国不能自己提出和平建议，在策略上让英国人出面，或者印度人出面。但斯大林并不想停战，驳回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和平倡议。7月13日，斯大林再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来电报，声明苏联已经驳回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对印

---

①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62, л.71-72.

②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79.

③ Там же.л.82.

④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Указ. соч. С.99.

度人的要求不予答复，同时敦促中国出兵，“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部署 9 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师——24 架喷气式歼击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计划在两三个月内利用我们的飞行员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培训，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考虑，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请告知您的意见。”<sup>①</sup>斯大林想通过给中国军事帮助促使中国出兵。

1950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回电，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好意，并提出了加强东北空军的一些意见，主要是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并表示派专门人员到莫斯科与苏方具体商谈。<sup>②</sup>但毛泽东并没有提帮助北朝鲜一事。而朝鲜的局势一天天恶化，到 9 月份，朝鲜战场形势发生逆转，美国依靠空中优势，打击朝鲜的军队和平民，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并向平壤进军。北朝鲜军队遭受严重失败。朝鲜人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国领导人，而是不断向莫斯科求援。斯大林神经紧张，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这回是美国人置之不理。斯大林加大了对毛泽东的压力。1950 年 10 月 1 日，他从索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在谈了朝鲜严峻的形势后，斯大林说：“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 38 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 38 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等候您的答复。”<sup>③</sup>10 月 3 日，斯大林收到了罗申同日发出的电报。

“1950 年 10 月 1 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这样做，极有可能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

①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85.

② Там же.л.89.

③ Там же.л.97-98.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sup>①</sup>

10月5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提醒中国领导人说过敌人越过38线，中国就会出兵，而且认为不会引起严重后果。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讨。10月6日，苏联从朝鲜撤回专家。10月6日，毛泽东在与罗申的谈话中表示中国至少出动9个师的兵力入朝，但需要苏联提供装备和运输工具，让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跟斯大林面谈。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同意了您的意见。我已经任命彭德怀任指挥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岗同志担任志愿军的支援和保障工作，他们昨天早晨已经从北京飞往沈阳。中国军队在10月15日前可以出兵到朝鲜，中国决定出兵的事已经告诉了金日成，周恩来和林彪已经动身去苏。<sup>②</sup>

中国出兵必须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援，周恩来和林彪到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是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合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一致得出的结论是：“1、尽管国际条件有利，但中国军队由于目前没有做好准备，不应该跨过朝鲜边境，以免陷入不利境地；2、如果军队已经跨过边界，也不应让他们在沿着中国边界的山区继续前进；3、一部分军队占领朝鲜北部的平壤和咸镜山区组织防御，一部分军队在敌人后方转入游击战；4、应征的朝鲜战士中的优秀分子和指挥员分成小组悄悄地进入满洲，在那里建立朝鲜师；5、平壤和其他北朝鲜较靠南的山区的重要据点立即疏散。”斯大林答应完全满足中国的军备需求。<sup>③</sup>毛泽东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在10月12日回电表示同意，中国军队还没有行动，他已经命令中国军队停止完成先前入朝的计划。<sup>④</sup>

但是，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罗申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宣布：“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一次讨论和研究了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和我的意见，我们的领导们认为，我们应该帮助朝鲜人。”毛泽东同志要求把周恩来留在莫斯科，

---

①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05-106.

② Там же.л.132.

③ Там же.л.134-135.

④ Там же.л. 141.

继续与斯大林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方案。<sup>①</sup>苏方赶紧把毛泽东的这个新决定告诉金日成，让他停止执行向北撤退的命令。

毛泽东决心入朝作战，帮助北朝鲜，主要原因是美国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当然也威胁了苏联的边界安全。中国出兵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无论从战争的起因，还是从其扩大来看，主要是斯大林一手导演的，体现的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

## 五、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一场完全符合苏联利益的战争，苏联是唯一在战争中只获利的国家。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在朝鲜进行一次有限的战争，能使中国人明白其真正的军事利益所在。如果这是斯大林的思路，那这种思路被证明是对的。朝鲜战争使苏联与中国翻脸整整推迟了十年。这并不是说是斯大林策划了这场战争。”<sup>②</sup>朝鲜战争加强了中国和朝鲜对苏联的依赖，加强了中苏同盟。

这场战争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场损失巨大但国家分裂状态没有任何改变的战争。“朝鲜战争是 20 世纪一次典型的悲剧。战争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发起。朝鲜战争杀死了 3.4 万美国人、100 万朝鲜人和 25 万中国人。战争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所有的后果都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战争的进程错误百出。金日成和斯大林低估了美国人的反应。杜鲁门认为这是攻击日本的前奏，是对美国通过联合国维持国际法的公然挑战。”<sup>③</sup>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损失了财产和生命。据 1956 年福布莱特在其关于朝鲜战争书中的统计，美国为了保持南朝鲜这个“自由世界”，损失了 33629 名士兵，军费和给予南朝鲜的援助总计有 56.1 亿美元。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得亦有失，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国人赶过了 38 线，迫使美国人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字，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and 志气。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洗刷了中国的百年耻辱，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东北成为国家建设的工业基地。朝鲜战争也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物质和人员损失，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恶化了中国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的关系。朝鲜战争使美军协防台湾，台湾问题被国际化了，给中国统一带来了大麻烦。中国的周边安全

---

① Там же.л.145.

② [英]保罗·约翰逊著，李建波等译：《现代：从 1919 年到 2000 年的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52 页。

③ 同上，第 552—553 页。

环境严重恶化，美军开始长期驻扎在朝鲜半岛，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协定和联盟条约：如美泰军事协定（1950年10月）；《美菲联防条约》（1951年8月30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1951年9月）；《美日安全条约》（1951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953年9月）；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1955年1月）；柬埔寨同美国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1955年5月）。美国势力合法地延伸到整个亚太、南亚地区。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国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大大恶化了。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运往中国物资的许可证，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951年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增设专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了45个。

---

**【Abstract】** Stalin's attitudes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undergone changes: from being against Kim Il Sung's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force to helping the North Korea to prepare for the w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obviously hoping that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Stalin thus continued urging China to send troops. The Soviet Union's strategic intent was to expand its impact in the Far East and deepen both China and North Korea's dependence on the Soviet Union.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is far-reaching, which not only extended the Cold War from Europe to Asia, strengthened the Sino-Soviet-North Korea alliance relations, but also enhanced the U.S.'s presenc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worse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Key Words】** Stalin, Mao Zedong, Korean War

**【Аннотац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талина к войне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происходили изменения: от не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Ким Ир Сена в вопросе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с помощью силы до помощи КНДР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войне.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Сталин надеялся на вступление Китая в войну,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л Китай отправить свои войск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намерения этого заключались в расширении влия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увеличении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Китая и КНДР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оказались очень тяжелыми —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Европ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ась на Азию, укрепились союз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СССР и КНДР, а также усилилось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США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ухудшилис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Запад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纳吉案件”之谜 ——根据原苏东国家解密档案的分析\*

郭洁\*\*

**【内容提要】**1956年秋匈牙利所发生的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危机，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极其沉痛的一页。而两年后这场危机的主角、匈牙利政府总理纳吉惨遭处决，更为事件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本文主要依据大量前苏联、匈牙利以及其他相关东欧国家的档案，描述并分析“纳吉案件”源起、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以期透过这一历史悬案为深入解读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相互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典型案例和历史视角。

**【关键词】**纳吉·伊姆雷 审判 匈牙利 苏联

**【中图分类号】**K515.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123-(12)

1956年秋匈牙利所发生的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危机，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极其沉痛的一页。而两年后这场危机的主角、匈牙利政府总理纳吉·伊姆雷惨遭处决，更为事件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纳吉遭处决，从表面上看十分突然，但其中却隐藏着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困惑：纳吉何以会被遣送至罗马尼亚？为什么要对纳吉进行审判？审判的前后过程是怎样的？为何在事件结束两年后要纳吉等人处以极刑？很长时间以来，与所谓“纳吉案件”相关的内情鲜为人知。冷战结束后相关档案材料的陆续解密和开放，为解开以上历史谜团提供了钥匙。本文主要依据大量前苏联和匈牙利以及其他相关东欧国家的档案，描述并分析“纳吉案件”源起、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以期深入解读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相互间关系提供

\* 本文在写作与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 郭洁，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一个典型案例和历史视角。

## 一、苏南纠葛与所谓的“纳吉问题”

1956年11月4日凌晨，苏联军队向布达佩斯展开了代号为“旋风”的军事行动。其后不久，纳吉代表匈牙利政府通过电台公开发表了苏联入侵的正式声明后，与其部分政府成员及家人共计47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匈牙利事件结束后，如何处置纳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的决定。

1990年代以来不断解密的档案材料表明，处决纳吉并非苏联领导人的既定目标。事实上，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31日的会议记录，当时莫斯科的想法的是，待以军事手段平息匈牙利事件后，让纳吉进入其正在积极筹划的匈牙利新政府之中。<sup>①</sup> 11月2日和3日，苏联与南斯拉夫两国领导人在南布里俄尼岛举行秘密会晤时，铁托曾允诺劝说纳吉主动辞去总理职务并支持莫斯科欲组建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赫鲁晓夫对此表示赞同，并也相信纳吉“能够做很多事情，帮很大的忙”。<sup>②</sup> 由此可见，至少在当时，苏联并未打算日后对纳吉采取极端措施。4日清晨，当纳吉等人来到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后，南领导人立即派人与纳吉进行了接触。<sup>③</sup> 苏联驻南大使费留宾当日下午发回莫斯科的电报对此事作了汇报，称南总理卡德尔已向其明示，正试图说服纳吉发表一项支持新政府的声明。<sup>④</sup> 晚些时候，纳吉表示愿意发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31日，TsKhSD, F.3, Op.12, D.1006, Ll.15-18ob.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07-310.

②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82页；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6年11月6日，ЦХСД, ф.3, о п.64, д.74, л.2, 5-9; АПРФ, ф.3, о п.64, д.485, л.146-151.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с.608-609.

③ 关于此前纳吉的政治同伴与南斯拉夫就避难事交涉的经过以及11月4日纳吉等人去往南驻匈使馆的情况，铁托在后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11月2日，桑托·佐尔坦和我们在布达佩斯的代表谈了话。在谈话中，桑托表达了他的愿望：由于他们的生命正受到反动集团暴乱分子的威胁，如果可能，他和一些共产党员将离开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楼，到我们的大使馆避难。根据这次谈话内容，我们的代表答复桑托，如果他们行动迅速，我们准备为他们提供庇护。我们估计他们会在星期日，即11月4日作出答复。然而就在4日上午，苏军开始行动，中断了我们的谈话。取而代之的是4日早晨，基于先前的谈话，纳吉和其他15位党政领导人随同家属一起来到我们的大使馆”。参见南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1956年11月8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南关系与匈牙利事件（1955—1957）：俄罗斯档案案英译文复印件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第28-32页。

④ 费留宾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4日，RGANI, F.89, Per.45, D.25, L.2, 转引自 Johanna C. Granville, *The First Domino: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6.

表声明，但声明的内容并不是辞职或承认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在于次日准备好的一份声明中，纳吉这样写道：“在如此关键的形势之下，我觉得有必要向我的祖国再次重申，作为政府领导人，我内心深处一直受着一种共产主义信念与意识的指引——要忠诚于我的人民和国家。40年来，我的行为始终受着这一信念的影响，不管未来会怎样，我都不会动摇进而背弃这一信念。”<sup>①</sup> 纳吉此种“不合作”的态度，顿时令南斯拉夫陷入了被动，同时也大大激怒了苏联领导人。莫斯科立即要求南斯拉夫无条件交出纳吉，但一向奉行独立外交路线的南斯拉夫岂能就这样公然在世人众目睽睽之下屈服于莫斯科的指令？于是，所谓的“纳吉问题”便由此产生。

11月5日下午，即在南斯拉夫以违反国际惯例为由明确回绝了莫斯科的要求后不久，苏联坦克向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开了火，使馆秘书米连科·米洛万诺夫不幸遇难，苏南关系骤然紧张。<sup>②</sup> 8日，铁托致函赫鲁晓夫，再次阐明了南斯拉夫不能交出纳吉的原因，并建议双方就“纳吉问题”寻找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sup>③</sup> 而此时，莫斯科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做任何妥协。次日，苏联领导人通过时任驻匈大使的安德罗波夫转告卡达尔，称“关于纳吉·伊姆雷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的问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关乎匈牙利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必须表现出坚定性和原则性。”<sup>④</sup> 就这样，“纳吉问题”便同复杂难解的苏南关系相互缠绕、纠葛在了一起。

其实，单就如何处置纳吉这一问题来看，苏南双方也是各有打算。就苏联而言，将纳吉牢牢控制在手中，不仅对它在匈牙利“整顿秩序”意义重大，甚至对于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苏联虽然看似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东欧的“非斯大林化”进程，但其底线是不可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和莫斯科的控制。1956年11月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二次出兵，固然并不仅仅是因为纳吉“走得太远”，不过，在如何处置纳吉这个问题上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在苏联看来，确能起到向东欧小兄弟暗示苏联对“非斯大林化”容忍底线的作用。在此背景之下，苏联对“纳吉问题”的态度愈加强硬。就南斯拉夫方面来讲，苏联

---

① 转引自 Jenő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in Jenő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3.

② 费留宾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年11月5日，АПРФ，ф.3，о.п.64，д.485，л.130。Волков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с.597-599。

③ 有关档案见 Волков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с.524-533、582、585、587-588、595-596、608-611、622-625，并可参看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е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1，с.23-25。

④ 苏联外交部致安德罗波夫电，1956年11月9日。沈志华总主编、杨存堂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2-384页。

入侵布达佩斯之前，南方之所以同意“在必要情况下”向纳吉等人提供政治庇护，并非意在保护这些人的安全，其真实目的在于向纳吉施加影响，劝其支持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sup>①</sup>11月初，当铁托在布里俄尼岛向苏联领导人许下这一承诺时，是自信能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对于纳吉此时这种“不谙时势”、“冥顽不化”的表现，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在意外之余，更是深感尴尬与不悦。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向伊斯特里亚党的积极分子发表的演说中，对纳吉政府提出了指责，称其只晓得“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却不愿同反革命作坚决斗争。<sup>②</sup>实际上，南斯拉夫领导人此时虽然口头表示绝不会将这些他已公开表明给予政治庇护的人拱手交出，但其内心却非常不希望因“纳吉问题”而导致同苏、匈两国两党的关系陷入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纳吉去留问题的谈判开始了。谈判形式上是在匈、南两国政府间进行，而在其背后，实则上则是苏、南两国领导人意见的交锋与妥协。

11月17日之前，匈、南双方代表团分别就解决“纳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南斯拉夫的立场是：如果卡达尔政府公开承诺保障纳吉等人的生命安全，南方便同意他们离开南使馆，留居匈牙利；如果卡达尔政府不愿或不能做到这一点，便应当允许他们到南斯拉夫避难。<sup>③</sup>匈牙利谈判代表则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声称，不同意纳吉等人前往南斯拉夫，但如果纳吉公开表态承认匈牙利新政府，这些人可以去罗马尼亚避难。尽管表面看来谈判双方意见相左，但欲求解决“纳吉问题”，苏、匈所开列的条件，即纳吉必须主动辞职并发表声明支持卡达尔政府，对南斯拉夫摆脱尴尬困境其实也是同等重要的。于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指示其驻匈大使索尔达蒂奇，继续设法从纳吉那里获得哪怕是形式上的这样一份声明。<sup>④</sup>然而，无论索尔达蒂奇如何劝说，纳吉始终不肯顺从。从11月17日起，南斯拉夫放低了谈判的门槛，不再提将纳吉引渡至南斯拉夫的问题，只是强调如果卡达尔政府公开声明确保纳吉等人在匈牙利安全不受侵害，便同意让他们离开南斯拉夫使馆。不仅如此，南斯拉夫还主动表示，不反对匈方提出的关于将纳吉遣往罗马尼亚的方案。<sup>⑤</sup>

纳吉坚决不辞职也不愿表示支持卡达尔政府的态度令苏联领导人大为恼火。他们决定尽快使纳吉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然后迫其妥协。11月17日，马林科夫、苏

---

① A. S. Stykalin, "Soviet- Yugoslav Relations and the Case of Imre Nagy," *Cold War History*, Feb., 2005, Vol. 5 Issue 1, p.6.

② 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12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01页。

③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Хрушев, 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2, с.25.

④ 卡德尔致卡达尔政府的信，1956年11月18日，АВПРФ, ф.77, оп.36, п.47а, д.9, л.12-17.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 с.657-661.



斯洛夫、阿里斯托夫联名向苏共中央提出一项建议，要求纳吉等人按照上述要求发表声明并作自我批评，当他们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予以逮捕，然后遣送罗马尼亚。<sup>①</sup>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一方案，同时指示卡达尔政府接受南斯拉夫的条件。21日，卡达尔在致南联邦执委会的信中承诺，匈牙利政府不打算对“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成员”实行报复或镇压。<sup>②</sup>双方达成协议，南斯拉夫同意22日让纳吉等人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回到自己的家中。

11月2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率团抵达布达佩斯，随同前来的有1930年代曾在共产国际与纳吉共事的瓦尔特·罗曼。受罗党派派，罗曼在纳吉离开南斯拉夫使馆前同其进行了单独会晤，意在劝说纳吉接受条件，发表一项支持卡达尔政府以及自愿前往罗马尼亚的声明，后者回答说，他不会自愿离开匈牙利，也不会发表任何支持卡达尔政府的声明。<sup>③</sup>当日下午6时半，纳吉及其同伴和他们的亲属在南斯拉夫两名外交人员的陪同下乘车离开使馆。但车子刚驶出不久即遭苏军装甲车拦截，纳吉等人被苏联军方带走。<sup>④</sup>第二天，按照苏联方面的原定计划，纳吉等人被遣送到罗马尼亚。

“纳吉问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在纳吉被劫持并被送往罗马尼亚后，南斯拉夫向苏、匈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对后者破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抗议”。<sup>⑤</sup>当然，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卡德尔在其回忆录也说：“我们在匈牙利和纳吉问题上与苏联政府的争执比较快地解决了……继续与苏联争吵也没有什么益处。”<sup>⑥</sup>“纳吉问题”得以解决的方式虽不免给人戏剧化的感觉，但不管怎样，这一结果对于苏、南、匈三国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三赢”的结局：纳吉的一举一动重又回到苏联的控制之下，南斯拉夫既走出困局又在国际道义方面没有失分，而匈牙利新政府也终于将纳吉这个“危险人物”暂时驱逐出境了。

---

① 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17日，АПРФ，ф.3，оп.64，д.487，л.79-80。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p.436.

② 卡达尔致南联邦执委会的信，1956年11月21日，АВПРФ，Ф.77，о п.36，п.47а，д.9，л.18-22。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 с.665-668.

③ 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23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21-422页。

④ 详见费留宾关于转交南斯拉夫照会的电报，1956年11月24日，ЦХСД，ф.89，п е р.45，д.56；АПРФ，ф.3，о п.64，д.489，л.124-131。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 с.679-683.

⑤ 费留宾关于转交南斯拉夫照会的电报，1956年11月24日，ЦХСД，ф.89，п е р.45，д.56；АПРФ，ф.3，о п.64，д.489，л.124-131。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 с.679-683.

⑥ 爱华德·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 二、“纳吉案件”的政治背景

1956年11月23日至1957年4月14日，纳吉等人一直被软禁在位于布加勒斯特附近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内。在纳吉去往罗马尼亚后不久，罗共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委派全权代表波德纳拉舍夫继续对纳吉进行劝说，要求其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结果仍旧是无功而返。<sup>①</sup> 1957年1月10日，赫鲁晓夫在写给铁托的信中表示，当前“惟一正确的措施就是在政治上审判纳吉·伊姆雷、洛松奇及其同伙”。<sup>②</sup> 所谓“政治上审判”，即指对纳吉等人展开口诛笔伐，为正在准备中的法庭审判制造舆论。

反观1956年11月初苏联发动“旋风”行动后匈牙利当时的媒体报道，明显可以看出对纳吉及其政府的批判逐步升级的一条清晰脉络。最初，事件刚刚结束时，卡达尔政府先是将纳吉政府的错误归结为“软弱无能”，说它“为反革命势力开辟了道路”。其后不久，还坦承“纳吉·伊姆雷本人和他的政治集团都不愿意自觉地帮助反革命”。<sup>③</sup> 可是从12月开始，对纳吉的评价就急转直下了，出现了“纳吉集团”的说法。12月5日，匈党临时中央召开会议，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对事件作出了明确的定性。决议称：“匈牙利10月23日的武装暴动从根本来说带有什么样的性质，它是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对于这个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一个回答：这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这是反革命。”<sup>④</sup> 这样一来，“纳吉集团”也不再是“不愿意自觉地帮助反革命”，而变成了“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反革命事件的爆发”。决议还说，纳吉早在1956年春为达此目的就大肆破坏党的威信，开始了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猛烈进攻。于是，纳吉也就由“软弱无能”，对反革命“退让”、“妥协”、“纵容”的动摇分子变成了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家。<sup>⑤</sup>

几乎与此同时，匈党通过内务和司法部门组织对纳吉等人提起诉讼的工作也进一步展开。1956年底，匈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对“纳吉案件”展开调查的决议。1957年1月，匈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派中央书记卡拉伊·久洛前往罗马尼亚与“纳吉集团”成员进行接触并展开初步调查。1月29日，卡拉伊向执委会提交了他的调查报告。

---

① 布尔加宁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56年11月27日，АПРФ，ф.3，оп.64，д.488，л.169-171. Волков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с.700-702。

② 赫鲁晓夫致铁托的信，1957年1月10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56页。

③ 分别参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总理亚诺什·卡达尔的广播演说”，《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4日。

④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就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通过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0日。

⑤ 同上。

根据这份报告，纳吉在与卡拉伊的会谈中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依据人民的愿望，所采取的措施也都是正确的，并且坚信，这些措施本来是可以稳定局势的。

① 卡拉伊建议执委会考虑将“纳吉案件”提交法院审理，后者同意了意见并下令司法机构搜集 1956 年 10—11 月间“纳吉集团”活动的相关材料。这是匈党首次公开表示要将纳吉提交审判。2 月 22 日，匈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卡拉伊进一步表示：“第一次我们公开提到他们（即指纳吉及其政府成员——笔者注）时，只说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后来我们又说他们为反革命开辟了道路。然而，仅仅这么看还不正确，我们必须更深更进一步，应该说纳吉·伊姆雷背叛了国家，对此我们必须找出证据使之成立。”② 四天后召开的匈党中央全会根据执委会呈交的报告指出，早在 1955 年夏，纳吉就已开始组织派别活动并以他为核心组成了所谓的“纳吉集团”，并称这个集团“在 10 月 23 日以前担任了反革命的前哨，11 月 4 日转折点以后，又担任了后卫的角色。”③在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匈牙利当前的问题和任务》的决议中，匈党中央做出了“根据这个集团成员的揭发继续进行工作”以及就“叛徒”纳吉展开罪行调查的决定。④

1957 年 3 月 19 日，纳吉给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要求由一个“国际性的党的审查委员会”来调查自己及同伴在匈牙利事件中的政治角色。结果，信被罗马尼亚当局扣留。⑤ 一周后，卡达尔出访苏联，期间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他在回国后向匈党中央所作的情况汇报中说：“会谈讨论了纳吉及其同伴的命运问题，问题由我方提出。同志们（即指苏共领导人——笔者注）同意我们的看法，即应当对纳吉等人实行严厉的惩罚。至于何时对他们采取措施，是现在还是晚些时候？同志们虽然还未能达成一致，但是他们都表示惩罚是必需的。”⑥ 4 月 9 日，应卡达尔提议，匈党中央通过决议，要求对纳吉等人予以逮捕并起诉。5 天后，纳吉正式被捕，并同其他人一起被从罗马尼亚秘密押解回国。6 月，匈牙利内务部根据二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精神对“纳吉集团”的

---

① Alajos Dornbach, *The Secret Trial of Imre Nag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4, p.170; 同可参看匈党中央与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会谈摘要，1957 年 3 月 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1155-01。

② Dornbach, *The Secret Trial of Imre Nagy*, p.170.

③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全文”，《参考资料》1957 年 3 月 2 日（下午版），第 11 页。

④ 波诺马廖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 年 3 月 12 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20 页；Stykalin, “Soviet- Yugoslav Relations and the Case of Imre Nagy,” p.15.

⑤ János M. Rainer, ed., *Imre Nagy: The Leader and Martyr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Budapest: 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Public Foundation, 2006, p.54.

⑥ Dornbach, *The Secret Trial of Imre Nagy*, p.172.

“犯罪行为”展开正式调查。调查持续了两个月，并最终形成了 83 卷调查材料。据说，在审讯过程中纳吉始终拒绝应答，也坚决不在口供记录上签字。6 月 14 日，纳吉提出要求，希望能举行一次听证会，他说：“我认为自己无罪，这些指控都是不成立的。我希望对自己的活动进行陈述。”<sup>①</sup> 8 月 10 日，内务部准备好了一份对纳吉及其同伴的起诉书。据 8 月 26 日苏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负责人安德罗波夫、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以及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伊瓦舒京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当天到访的匈内务部部长比斯库·贝拉向他们通报了匈党政治局对“纳吉集团”案件的“决定”和“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以后对纳吉等人的终审结果与政治局的这些“决定”或“意见”几乎完全一致。

匈党政治局的“决定”和“意见”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纳吉集团”的罪名应突出三个方面，即“用暴力夺取政权”、“策划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谋”和“与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第二，对 11 名“阴谋家领导核心”中的纳吉、洛松奇、多纳特、吉梅什、马勒特、西拉吉和基拉伊要“处以极刑”，其余人依其在侦查和审判期间的表现“考虑采用较为缓和的惩罚措施”；第三，审判采取“非公开”的形式。<sup>②</sup> 匈党中央政治局原定于 9 月便正式开启对“纳吉集团”案件的秘密审判，苏联方面虽原则上同意匈党的上述“决定”和“意见”，但对于预定组织起诉的时间表示反对，认为为时尚早。

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受了苏南关系的影响。如上所述，“纳吉问题”虽然表面看来较为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但对苏南关系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同样，虽然纳吉等人已离开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但他们的命运仍继续牵动着苏南两国领导人的神经。1957 年夏秋，苏联领导人正积极筹划着即将于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 68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会议特别邀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前来参加，苏联领导人希望在各国党的共同努力下，借此次会议把南斯拉夫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另外，同年 11 月，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将召开，南共联盟表示此次会议将重新确定和加强同苏共“友好与合作”的方针。因此，这两次会议对于南斯拉夫是否将重新接受苏联的领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关键时刻启动对纳吉的起诉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苏联认为这必然会招致与南斯拉夫不必要的争吵。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苏联领导人指示匈牙利方面将起诉时间推迟到 1957 年底至 1958 年初，开庭时间定于 1958 年 3 至 4 月间。总之，按苏联领导人的话来说，“以

---

① Rainer, Imre Nagy: *The Leader and Martyr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p.54.

② 安德罗波夫、鲁坚科和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 年 8 月 26 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41-543 页。

何种形式进行这次审判，完全取决于政治形势以及审判本身将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带来的政治好处。”<sup>①</sup>

在相关档案解密之前，学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解，即认为1958年1月28日开始对纳吉展开诉讼程序，是苏联对南斯拉夫在11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拒签《莫斯科宣言》而采取的报复措施。<sup>②</sup>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起诉和审判纳吉是匈牙利领导层积极推动的结果，从1957年开始逐渐成为匈苏两国领导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1957年8月就起诉时间给匈党的指示，与实际开审时间相差无几。因此可以想象，无论南斯拉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是否同意重回社会主义阵营，“纳吉案件”的开审都会按部就班地进行。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如果南斯拉夫在莫斯科的“家庭聚会”中表现得较为合作，那么会后南斯拉夫极有可能“少一点过分地对审判纳吉的事实依据提出问题”，则整个过程将少一些阻碍。<sup>③</sup>既然南斯拉夫拒不“归队”，那么按期开启对纳吉等人的起诉，从形式上看倒也能起到向南斯拉夫显示强硬的客观效果。

### 三、“纳吉案件”的审判及其结局

1958年1月28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匈牙利总检察长塞纳希·格佐签发了“关于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阴谋颠覆国家的人民民主秩序和其他罪行”的起诉书。起诉书指控纳吉，早在“反革命事件”爆发前就组织了一个“由反动知识分子、人民民主国家秩序的敌人”组成的集团，从1955年底开始“向党不断发起进攻”。起诉书进而强调指出，10月23日发生的示威游行就是纳吉等人“暴力夺权”的开始，纳吉上台后积极与国外反动分子、国外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前来帮助保卫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苏联军队进行百般阻挠”。11月4日在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后，他们“仍然紧密联合退却的反动分子向国家政权发起攻击”。最后，起诉书声称，纳吉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主犯，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sup>④</sup>

---

① 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1, с. 20.

② 参看如 Tibor Méray, “The Trial of Imre Nagy,” in Béla K. Király and Jonas Paul, ed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in Retrospect*, Boul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77.

③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8月29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46页。

④ 对纳吉及其同伙的起诉书，1958年1月28日。参看 Dornbach, *The Secret Trial of Imre Nagy*, pp.58-66.

2月5日，对纳吉等人的秘密审判开始了。当日的审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纳吉拒绝承认犯有被指控的那些罪行。第二天的审判刚开庭没多久，审判长就以需收集新的“补充材料”为由匆匆宣布休庭。<sup>①</sup>当然，真实情况并非由于所谓证据不足，而是另有隐情。首先，同样地，还是缘于莫斯科的阻拦。此时的苏联正在积极同西方缓和关系，先是主动提出共同中止核试验、在中欧建立非军事区以及两大军事集团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建议；然后又照会北约各国、中立国奥地利和瑞典以及不结盟国家印度和埃及等国，建议1958年上半年召开各国政府首脑峰会。在此背景下，苏联担心一旦对“纳吉案件”作出判决，西方国家会以此为借口向苏联展开攻击并拒绝其关于召开峰会的提议，使自己陷于被动。<sup>②</sup>除此之外，此时亦正值意大利大选的最后筹备期。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向苏联领导人表示，对纳吉进行审判将很可能给其他党派以“口实”，以此向意共发起舆论攻势，造成意共在议会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sup>③</sup>当然，还有出于对南斯拉夫的考虑。从本意上讲，苏联对南斯拉夫的行为虽有种种不满，但此时并不希望看到两国两党关系因“纳吉案件”而重现危机。无论如何，在苏联决策层看来，审判纳吉需要权衡政治成本，而正确选择审判时机，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可草率。<sup>④</sup>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一来是西方对于苏联的和平倡议无动于衷。从1958年3月到6月，苏联为了促成首脑峰会的召开，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但西方国家在谈判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诚意。为了打破僵局，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宣布单方面裁军11.9万人，同时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实现了全部和部分撤军，可对对方依旧表现得并不以为然。6月11日，在写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赫鲁晓夫再度表达了希望尽快召开首脑会议的愿望，不料却遭到后者的回绝，理由是“时机尚不成熟”。所有这些都令苏联领导人大大为恼火。<sup>⑤</sup>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起“意外事件”也强化了苏联在审判纳吉问题上的决心。1958年3月底，卡达尔对南斯拉夫进行了访问，在与铁托的会谈中再次向南斯拉夫领导人重申匈牙利将遵守诺言，不会对纳吉等人进行迫害。铁托对此表示满意，并在会谈中建议匈牙利“应当学学波兰，别什么都听莫斯科的吩咐”。不料，赫鲁晓夫很快得知此事。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南斯拉夫自己不

---

① 参看匈总检察长提交的矫正申诉书，1989年6月6日。Dornbach, *The Secret Trial of Imre Nagy*, pp.123-124.

② János Radványi, *Hungary and the Superpowers: The 1956 Revolution and Realpolitik*,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2, p.35.

③ Dornbach, *The Secret Trial of Imre Nagy*, p.175.

④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8月29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45页。

⑤ Radványi, *Hungary and the Superpowers*, pp.36-37.

愿重回社会主义阵营倒也罢了，但其挑唆和离间其他东欧国家摆脱苏联领导的行为，无异于为苏南关系缓和画上了终止符。6月3日，赫鲁晓夫在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展开了激烈的攻击，在其所有旧的罪名上又加上了一条：“在布达佩斯反革命事件中，南斯拉夫驻匈大使馆成为向匈牙利人民民主发动攻击的窝点，并为遭到挫败的、叛徒纳吉·伊姆雷—洛松奇集团提供庇护。”<sup>①</sup>

在以上多种原因的促动下，对纳吉的审判很快重启。如前所述，纳吉的命运其实早在一年前就已被“决定”了，剩下的一切则只是悲剧性的细节。

与1949年轰动一时的拉伊克案件不同，“纳吉案件”的审判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审判结束后很长时间内，匈牙利人对审判的具体时间、地点等多有猜测。比如，终审当日（6月15日）恰好是星期天，按照匈牙利的惯例，这天是不会开庭的。所以，很多人因此怀疑纳吉等人早已于此前提被处决。也有人认为日期可能没有错，但审判地点大概在莫斯科或布加勒斯特而非布达佩斯。综合现有文献，对纳吉的审判是在布达佩斯进行的，终审日期也确系1958年6月15日。“纳吉案件”是斯大林去世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首起涉及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审判案，也有学者将其称为“苏联集团国家历史上最后一次血腥审判”。<sup>②</sup> 审判中对被告的最终量刑，按照匈党政治局的表述，是依其“在侦查和审判期间的表现”来决定的。<sup>③</sup> 面对捏造的罪行，凡承认者从宽；反之，则从严。根据这一原则，纳吉、马勒特和吉梅什由于“拒不认罪”被判处死刑。<sup>④</sup> 洛松奇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由于绝食抗议，于1957年12月21日已不幸死于狱中；基拉伊被缺席判处死刑，长期流亡海外；其余几人中，科帕奇被判终身监禁，多纳特、亚诺希、蒂尔迪、瓦沙赫利分别被处以12年、8年、6年和5年徒刑。

然而，纳吉在审判中与其他几个人不同，他一方面对那些捏造的罪名予以公开驳斥，但同时对那些自己做了的事坦承不讳。他承认，在匈牙利是发生了武装起义，事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他本人也的确曾宣布国家中立和退出华约，并同意取消一党制和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在整个审判中，纳吉没有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反诉过任何一个人，按有关当事人的描述：“这一点令审判现场的共

---

① Tibor Méray, “The Trial of Imre Nagy,” in Király and Jónás, ed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in Retrospect*, p.78.

② Charles Gati, *Failed Illusions: Moscow, Washington, Budapest, an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t*,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24-225.

③ 安德罗波夫、鲁坚科和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8月26日。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43页。

④ 在整个案件中被判死刑的还有西拉吉·约瑟夫，由于狱警对其行为无法控制，司法部门于1958年4月24日提前对其进行了单独审判，西拉吉被判处死刑后即遭处决。参见：安德罗波夫就纳吉审判事给苏共中央的信，1957年8月26日，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p.539.

和国法官都深感震动”。根据解密的图片和影音资料显示：站在被告席上的纳吉形容消瘦苍老，手持一本练习簿，不时用铅笔在本子上作着笔记，“他仔细地听着法官的每一句话，就好像自己不是在参加审判而是在参加一次学术讨论。”<sup>①</sup>

1958年6月16日，布达佩斯当地时间午夜12点的广播和次日的报纸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公告称：“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根据他们从前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自然而然地堕落到了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结成联盟，堕落到了背叛人民民主制度、背叛匈牙利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sup>②</sup>

纳吉被处决了。临刑前，他在法庭上作了最后的陈述：“在这种情形下，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终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将免除今天加在我身上的这些沉重的罪名，这些罪名是我现在又不得不背负的，也因而必须为之付出我的生命。我相信在一个更加平和的气氛下，当人们能够更清醒地看待今天、更深切地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终有一日历史将还我以公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严重的、法庭错误的牺牲品，我不请求赦免。”<sup>③</sup>

---

**【Abstract】** The fall of 1956 saw a scary crisis in Hungary, which left an extremely painful impress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Moreover, the tragic execution of Nagy two years later, who was Prime Minister of Hungary and also protagonist of this crisis, added to the tragedy.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fil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ungary and other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laid a basis for the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which will help understand thorough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during the Cold War. Through this historical mystery, it provides us a typical cas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Imre Nagy, Trial, Hungary, the Soviet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Осенью 1956 страшный кризис, произошедший в Венгрии, записал очень болезненную страницу в историю миров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20 веке. А через два года казнь главного героя этого события — венгерского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 Имре Надя — добавила ещё больше трагизма в данное событие.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архивов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енгрии и других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стали осново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сего процесс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и эволюции «Дела Надя»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дальнейшему пониманию нераскрыт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истории 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типичный случай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① István Rév, *Retroactive Justice: Prehistory of Post-Commun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005, p.17; Gati, *Failed Illusions*, pp.224-225.

②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1958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③ Rév, *Retroactive Justice: Prehistory of Post-Communism*, p.18.



△ (上接封3)

- 11 日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首脑同意增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开启吸收新成员国加入该组织的进程，并决定给予吉尔吉斯斯坦人道主义援助。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伊朗在遭国际制裁的情况下是不能加入上合组织的。  
俄总理普京在与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谈后委派副总理谢钦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协调法方为俄建造军舰的合作事宜。
- 12 日 300 多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前，要求俄罗斯派兵入吉。  
俄罗斯第一架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飞机抵达比什凯克，并将受伤者带往莫斯科接受治疗。
- 13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解除联邦武器供应局局长维克多·切尔克索夫 (Viktor Cherkesov) 的职务，并由前俄联邦税务局副局长斯尼科娃 (Nadezhda Sinikova) 接任。  
俄总统办公厅证实，俄已加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队部署，以确保俄在吉工作人员及家属的安全。
- 17 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情感不能用“多少立方米天然气”来衡量。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命令向乌兹别克斯坦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以应对从吉尔吉斯斯坦涌入乌的大批难民。  
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阐述其实现俄罗斯现代化的方案，并保证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多的法律安全支持。  
俄罗斯表示美国和欧盟最近对伊朗的制裁试图僭越联合国安理会职权，是不可接受的。
- 18 日 俄罗斯移民局表示，在俄外国人的一半——约 370 万——在俄境内非法务工。
- 19 日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债务问题谈判无果而终。
- 20 日 俄罗斯总统助理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 (Arkadi Dvorkovich) 宣布，在 6 月 17 至 19 日举行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有超过五十笔总价值约为 80 亿美元的合同被敲定，其中包括法国 GDF-Suez 和 EDF 两家公司参与“北溪”管线项目的协议。  
自 1994 年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 以来，俄代表团首次对北高加索地区人权状况的批评投赞成票。俄代表团称，以往决议中最不能接受的部分已被删除或者作出了修改。
- 21 日 随着白俄罗斯天然气账单的“五日期限”已到，Gazprom 宣布将每日对白供气量减少 15%，而如果账单依旧不能偿付，则将减少 85% 的供气量。双方代表团没能在价格问题上达成任何一致。白方坚称，俄须付天然气过境费用。
- 23 日 俄罗斯对立陶宛供气量减少 30%，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专员欧廷格 (Gunther Oettinger) 致电白俄罗斯政府要求澄清此事。
- 24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访问美国硅谷时表示，如果能推行其改革计划，保持人民对他的支持度，他将不排除竞选连任。
- 25 日 俄罗斯与乌克兰全面恢复军事合作。  
俄美两国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重启经济合作。
- 28 日 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同意德国法院的判决，将付给霍多尔科夫斯基约 4 亿美元。
- 29 日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拒绝就美国对俄间谍指控作出评论。俄外交部表示希望能从美方获知确切情况。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与哈马斯 (Hamas) 的直接接触是正确的，今后也不会停止。
- 30 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开罗建议，恢复与德黑兰的“5+1”对话机制以解决伊朗核问题。  
俄在圣彼得堡投放了其第一个浮动核能装置。

# 俄罗斯大事记

(2010年5—6月)

## 5月

- 1日 大批极左翼反对党和工会成员在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举行五一集会。在莫斯科，示威者要求该市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和莫斯科州州长鲍里斯·格罗莫夫(Boris Gromov)辞职。
- 2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古尔班古雷·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imukhamedov)在上海表示，将加强两国合作，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内的合作。
- 5日 俄罗斯与北约批准了2010年度军事合作计划。
- 7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r Lukashenko)抵达莫斯科进行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一项法令，允许杜马各政党平等地与地方媒体接触。俄罗斯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俄将投入30亿美元于2020年完成新罗西斯克(Novorossiisk)海军基地的建设。
- 8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前夕会见了曾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俄二战老兵。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在俄罗斯庆祝“胜利日”之际于莫斯科举行非正式会议。
- 9日 “胜利日”游行在独联体各国家举行，独联体各国(除格鲁吉亚外)、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仪式。
- 10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抵达大马士革(Damascus)，开始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 11日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ad)在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忆历史上莫斯科曾给予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两国总统签署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双边合作协议。
- 12日 俄罗斯与土耳其总统就一系列合作计划进行了详细讨论，其中包括在土修建核电站项目。双方还就签证问题签署了一项协议。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期望能与戴维·卡梅隆首相(David Cameron)领导下的英国之间的关系出现“新面貌”。
- 14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谈论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为时尚早。俄罗斯政府批准通过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建立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的文件。
- 17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一项旨在纪念已逝世的俄前总理、著名经济学家盖达尔(Yegor Gaidar)的法令，并宣布在高等经济学教育界设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乌克兰、俄罗斯外长签署了两国划界协议，并签署一系列包括空间技术、银行、通信和造船等领域在内的合作协议。
- 18日 俄罗斯派遣一支考察队赴北极划立大陆架边界。俄人权运动活跃分子敦促梅德韦杰夫总统对前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绝食抗议予以回应。
- 19日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对在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过程中使用吉布提(Djibouti)港口的安排作出解释。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2009年北高加索地区有超过500名恐怖分子。他呼吁北高加索地区领导人与该地区非政府组织之间展开合作，创造就业机会，支持成立一个地区性的长老委员会。
- 21日 经过数小时的紧张谈判，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未能就关税同盟的一项法规达成协议。俄罗斯与孟加拉国签署了一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表示，他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伊朗和巴西、土耳其之间原子能交易的明确内容。
- 22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俄与格鲁吉亚反对派之间的接触不是对格内政的干涉，这是双方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纽带，包括东正教信徒之间的联系。
- 23日 韩国知识经济部部长崔灵焕(Choi Kyung-hwan)与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谢尔盖·什马特科

- (Sergei Shmatko) 举行会谈。韩方表示愿意参与升级俄罗斯能源网络项目，该项目所需资金达数十亿美元。
- 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7月1日俄白哈三国关税联盟还不能开始全面运转。
- 25日 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表示俄将会吸取 BP 石油公司的事故教训，重新审查在近海大陆架开采石油所需的技术要求。
-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马赫穆德里萨·萨迦迪 (Mahmud Reza Sajjadi) 对俄支持联合国“根据不可靠的情报”做出的对伊制裁表示震惊。
- 俄罗斯呼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保持克制，避免武装冲突。
- 26日 俄罗斯决定继续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 在联合国讨论“天安号”事件前，俄罗斯呼吁有关方面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朝鲜卷入了此事件。
- 28日 白俄罗斯总理西多尔斯基 (Sergei Sidorsky) 表示，由于无法调和的分歧，白将取消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于关税联盟的谈判。
- 俄罗斯副总理谢钦 (Igor Sechin) 表示，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没有兴趣按照白方的定价购买更多的白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Beltransgaz) 股份。
- 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在没有白俄罗斯的情况下将更容易加入世贸组织。
-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由中央任命地方领导人的体制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 Gazprom 总裁阿列克谢·米勒 (Alexei Miller) 在与乌克兰燃料与能源部部长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讨论天然气业务合并时表示，这或许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29日 黑龙江省公布数据表示其已向俄罗斯租借 426,667 英亩土地用来种植农作物，该数据较去年增加了 42%。

## 6月

- 1日 俄罗斯外交部对以色列袭击开往加沙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表示深切关注，希望以方释放扣留人员。
- 2日 民调显示，59%的乌克兰民众支持与俄罗斯签署“舰队换天然气”协议。
- 4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数项支持民主发展的法案。
- 6日 俄罗斯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 (Sergei Ivanov) 表示，阿富汗毒品问题应被视为全球性威胁。
- 7日 俄罗斯与希腊双方批准了“南溪”管道 (希腊) 合资项目公司章程。该公司将负责“南溪”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和运营。
-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Rosatom) 负责人谢尔盖·基里延科 (Sergei Kirienko) 表示，在国际社会不刺激伊朗的情况下，伊不能拒绝将核废料归还俄。
- 8日 法国总统萨科奇 (Nicolas Sarkozy) 向来访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表示，法向俄罗斯出售军舰是出于政治考虑，法国将会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俄罗斯总参谋长马卡罗夫 (Gen. Nikolai Makarov) 则强调，俄需要购买法国军舰来保卫目前还未设防的千岛群岛 (Kuril Islands)。
- 俄总理普京表示，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基地的未来将由吉自己决定。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只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才能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Nagorny Karabakh) 地区的冲突。
- 俄副总理谢琴在即将结束对土耳其的访问时与土就原子能开发合作和旅游问题达成协议。
-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宣布将与伊朗建立合资公司，共同经营即将于八月开始运转的布什尔 (Bushehr) 核电站。
- 9日 俄罗斯常驻北约 (NATO) 代表德米特里·罗戈津 (Dmitri Rogozin) 表示，作为使用俄运输设施的回报，北约必须加强打击阿富汗毒品贸易的力度。
- 俄罗斯联邦禁毒局局长维克多·伊万诺夫 (Viktor Ivanov) 表示，阿富汗毒品贸易与北高加索地区局势存在密切联系，并希望美国和北约能像对待哥伦比亚可卡因问题一样对待阿富汗毒品问题。
- 10日 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举行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塔什干举行会谈，讨论了在 G20 框架下加强双方合作、寻求在国际事务中更大话语权的问题。
-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伊朗已被邀请参加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但其决定不来参加，则是伊方自己作出的决定。

(下转第 135 页)

#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0年第4期

(总第164期)

##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http://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http://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0.00 元